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六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六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的决议 (1)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的
处理办法的通知 (7)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
- 评战犯求和 毛泽东 (10)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和
释放狱囚问题给西北野战军的指示 (14)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
- 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 彭 真 (16)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
-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23)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 中共中央关于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组织总前委的决定 (30)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工资薪水
问题的指示 (31)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抢购物资的指示 (34)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 军委关于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决定 (35)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38)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 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古迹文物的训令 (42)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 (44)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 军委关于各野战军改按番号顺序排列的指示 (47)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 军委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补充意见和积极做好
攻城准备问题给林彪等的指示 (48)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傅作义公函 (50)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对处理天津广播事业、报纸及登记
国民党员等问题的指示 (53)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55)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
通知 (61)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发布宣传口号问题

- 给天津市委等的指示 (65)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 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 (67)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通过)
- 军委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给林彪、
罗荣桓的指示 (71)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 附一：林彪、罗荣桓对苏静关于接收北平问题的
意见给军委的报告 (72)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 附二：苏静关于接收北平问题给林彪等的报告 (74)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毛泽东 (76)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 (78)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 (80)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 (82)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广泛揭破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 (84)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
口号的指示 (86)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平稳物价的建议 (88)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

- 办法的指示 (90)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
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
内战罪犯的谈话 (94)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毛泽东 (99)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 毛泽东、朱德给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的复电 (102)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 附：李济深等五十六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给毛泽东、朱德的贺电 (103)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
干部的指示 (105)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
-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
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108)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毛泽东 (112)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 (114)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 军委关于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的指示 (116)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计划等
问题的指示 (118)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
无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 (120)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防止轻敌偏向等问题
给邓小平等的指示 (121)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把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
诸事当作大事去做的指示 (122)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平津两市学校教育的指示 (124)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
“全面和平”? 毛泽东 (126)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毛泽东 (130)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 (133)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基本方针的指示 (137)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 中央军委关于对国民党军官处理方针的指示 (139)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毛泽东 (141)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 (148)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滦煤矿管理问题的指示 (151)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
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153)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旧税制的指示 (157)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 (158)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刘少奇 (172)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任弼时 (179)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 (189)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毛泽东 (194)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202)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213)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华社时评)
- 军委关于第四野战军渡江部署给林彪、
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 (216)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
- 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 薄一波 (217)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及后方勤务工作
若干问题的规定 (222)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 (227)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被难情报工作人员问题的指示 (229)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旧职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 (230)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 毛泽东、朱德给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电报 (234)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事宜的决定 (235)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邓小平 (236)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 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 (240)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 毛泽东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 (244)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毛泽东 (245)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应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
参加工作给邓小平等的指示 (248)
(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
- 毛泽东给李宗仁的复电 (250)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 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朱 德 (251)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 军委关于推迟至四月二十二日渡江

- 给总前委的指示 (258)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 军委关于将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的指示 (260)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政治报告 任弼时 (261)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 毛泽东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问题
给周恩来的信 (279)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
- 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280)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 军委关于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
渡江上面给总前委的指示 (290)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
-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 (292)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 朱 德 (303)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毛泽东 (305)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 (307)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毛泽东 朱 德 (325)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解放后的外交问题的指示 (328)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

- 草案的批示 (330)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 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请示报告 (332)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待驻华外交机关人员及
外侨政策的指示 (340)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 军委关于做好接收上海准备工作的指示 (342)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 中央军委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的指示 (344)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我们的私营银钱业政策 (346)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 军委关于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
给林彪等的指示 (349)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
发表的声明 (351)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 中央军委关于高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应加强文电
指示等问题给华东局等的电报 (353)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 (355)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 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 (357)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
-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

- 会师的工作指示的批示 (369)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 附：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
工作指示 (370)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动与今后
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 廖承志 (374)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 中央军委关于城市驻军不许住民房的规定 (380)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 军委关于占领奉化时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等
问题给粟裕等的指示 (383)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 学习毛泽东 周恩来 (385)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
问题给南京市委的指示 (397)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 中央军委对南京市委关于卫戍部队处理外侨
问题守则报告的批示 (399)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
- 附：南京市委关于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
守则的报告 (399)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 军委转发第四野战军关于入城部队必须
遵守的纪律的规定 (403)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 毛泽东、朱德给林遵等的复电 (406)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 军委关于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给粟裕等的指示 (407)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 朱德关于组织劳资双方发展生产问题
给邓子恢的复电 (409)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的决定 (412)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
指示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415)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华东局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 (415)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
- 军委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给总前委等的指示 (419)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经验
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421)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 军委关于预筹对策防备帝国主义武装
干涉的指示 (422)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 祝上海解放 (424)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新华社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
“左”倾错误的指示 (427)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

- 给东北局的指示 (427)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 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财政经济机构 刘少奇 (430)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聘请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
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434)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日贸易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436)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 附：东北局关于对日贸易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437)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赴美的指示 (438)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
-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 陈 云 (440)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 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 刘少奇 (443)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使人民币在新解放区占领阵地
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456)
(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布置抽调三万八千名
干部问题的指示 (459)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 军委关于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
给粟裕等的指示 (462)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463)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 (467)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470)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 中共中央关于与各国通邮通航问题
给上海市委的指示…………… (473)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
- 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
代表名额的规定…………… (474)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 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
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 李维汉 (476)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 周恩来 (482)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 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486)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 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 (487)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的处理
给南京市委的指示…………… (488)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三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
《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两文的指示…………… (491)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 附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 (492)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短评）
- 附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494)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短评）
- 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部署给彭德怀的电报 (497)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 附：彭德怀关于全歼胡、马军的部署
给毛泽东的电报 (499)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 (501)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刘少奇 (514)
（一九四九年六月）
- 军委关于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
湖南问题给林彪、邓子恢等的指示 (519)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
斯大林的报告 (521)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纠纷
问题的指示 (536)
（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
-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 周恩来 (539)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 军委关于我军进占赣南的部署
给华南分局等的指示 (553)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毛泽东 (555)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公报 (第一号) (558)
—— 消灭敌军兵力及缴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公报 (第二号) (563)
—— 解放国土面积、人口、城市及铁路统计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公报 (第三号) (566)
—— 敌我兵力消长及损失比较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 军委关于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
白崇禧部给林彪等的指示 (569)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
- 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 (574)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
- 军委关于对程潜等宣布起义后的方针
给林彪等的指示 (576)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
- 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
与联共(布)中央斯大林会谈情况给中央、
毛泽东的电报 (578)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
-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邓小平 (585)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 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 张闻天 (587)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 毛泽东关于争取卢汉起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595)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 毛泽东关于举行平凉战役及西进作战意见
给彭德怀的电报 (596)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 朱 德 (598)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 军委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行动计划
给林彪等的指示 (604)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 严厉取缔投机活动 保持物价平稳! (606)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
代表会议的指示 (610)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 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党的
代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 (611)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物的规定 (615)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 毛泽东转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经验
总结的批语 (617)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 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及其主要的
经验教训 (617)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程潜等站在我们方面
给华中局的指示 (625)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 毛泽东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627)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给华中局等的指示 (630)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
- 无可奈何的供状
——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632)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新华社社论)
-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 (640)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 别了,司徒雷登 毛泽东 (647)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 毛泽东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报 (653)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654)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 附:太原市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 (655)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等问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656)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董必武 (658)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671)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毛泽东 (673)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 “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679）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 军委关于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较利我军作战
给林彪等的指示……………（682）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律师制度的指示……………（684）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686）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新华社社论）
- 毛泽东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给饶漱石的电报……………（689）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691）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周恩来（693）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 军委关于开好赣州会议及进军华南部署
给叶剑英等的指示……………（706）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 军委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给林彪、
邓子恢的指示……………（708）
（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
- 毛泽东等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文电……………（710）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715）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 毛泽东、朱德复董其武电……………（723）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 (724)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问题的指示 (728)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周恩来 (730)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 董必武 (736)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 旧中国灭亡了, 新中国诞生了! (742)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745)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750)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
的四个决议案 (757)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758)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 (770)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一) 中国青年，在中国人民的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期间及抗日胜利以后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在中国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建设中，都起了伟大的积极的作用；经过了长期的各种斗争的锻炼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已经普遍地提高，涌现出了大批先进的积极分子。因此，仅有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读书会等类形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要求；而党在解放区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因为缺少先进青年有组织有系统的推动，常常流于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党中央即已发出建立先进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提议，并责成各中央局、各分局择地试办；两年以来，在东北、华东、华北、西北（包括晋绥）各解放区，都已在若干地区建立有团的组织。各地区试办青年团的结果证明：凡是根据中央提议的精神所建立起来的青年团，都受到广大青年群众与成年人民群众的爱护，它在领导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土地改革及民主建设和文化事业中表现了极大的作用。事实证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

完全可能的与必要的。根据此种需要，并为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坚决地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先进青年们的群众性的组织，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是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青年的学校。它的任务，就是首先要团结和组织先进青年的积极分子，再经过这种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去团结和教育广大的青年群众，和中国人民一道，为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并在这种实践的奋斗中不断地教育中国的青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应当吸收一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为新民主主义的事业而积极奋斗，愿为劳动人民忠诚服务的男女青年为团员，其年龄一般地应为十五岁至二十五岁。正因为它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应该比较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地吸收各民主阶层中的青年积极分子入团，以扩大自己的群众性，但是它仍然是中国青年群众中的先进积极分子的组织，而不是普通的一般的青年团体。只有很好地组织中国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才能使中国广大的青年群众有一个巩固的核心，在全国青年群众中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否则，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全中国的青年群众。团员成分应以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和一般劳动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和其他阶层出身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基础，同时也应当吸收其他阶层中的进步的觉悟的愿为新民主主义而积极奋斗的青年人参加。团内生活，应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民主的与群众化

的生动活泼的作风，培养团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训练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应当特别注意防止在青年团的工作中和作风上产生狭隘的关门主义、青年先锋主义或宗派主义的倾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系统，党无权直接命令青年团。青年团内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并以不疲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巩固党在青年团中的领导。

（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因此，应在为人民大众与青年服务的基础上创造适合环境特点与青年兴趣的各种方法，团结和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去实现下列各项工作：

第一，当前中国人民的两大战略任务，为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恢复与发展一切解放区的生产事业。青年团必须把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前以及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中心。

第二，青年团应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经常地注意和努力为青年群众的特殊利益与切身需要而服务，并在这种努力中逐步地引导广大青年群众去参加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建设工作，和国际青年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和平运动。

第三，在青年团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地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逐步地学会使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点，去认识社会发展过程，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学习文化、科学、生产与军事知识；学习业务与技能；使每个团员在思想

上、政治上、文化上与工作上，不断地提高自己。一切青年团员应该把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作为自己的光荣责任。青年团并应帮助政府教育机关，去改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第四，领导少年与儿童工作，吸收七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参加儿童团，吸收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少年参加少年先锋队，较小的农村则合组为少年儿童团。青年团应选派最好的干部领导这一工作，并在各级团委之下设立少年儿童部，或少年儿童委员会，作为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的领导机关。

（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建立在青年群众的自愿的和自觉的基础之上，要在群众运动与各种工作中公开地进行建团。因此，应在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中进行经常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在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中树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的认识。在开始建团时，尤须深入宣传与充分酝酿，然后根据本人自愿，经过入团手续正式入团。应当绝对防止在发展团员的工作中采用强迫办法，随便拉人入团的办法和简单地追求团员人数众多等项错误的作法与急性病。在建团工作中，一方面必须保持团在政治上的纯洁性，同时也要防止狭隘性，将一些先进青年拒绝于团的大门之外，妨碍团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各地党的组织必须将现有青年工作干部加以审查，并慎重与迅速地提拔、抽调一批思想正确、联系群众的青年男女党员干部，经过短期训练，使他们能够正确地掌握建团的方针。各级团委负责人应由相当于同级党委委员与下一级党委书记的干部充任。两年来建团的经验证明，掌握中央建团方针，训练和配备足够数量的青年工作干部，乃是建团所必须的基本条件。

建团的步骤，应当是有重点地逐步地向前推进，首先从城市、工厂、学校、部队及人口较集中、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村

镇开始，然后再求普遍的发展。在上述地方，尚无团的组织时，党必须责成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划出一部分年青而优秀的党员兼为团员，作为建团的基础与骨干。区以上得设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在一个工厂、学校、街道或农村中，有五个团员，应即成立团的支部，一个区内有三个支部以上，即应正式成立团的区委，一县或一市，有三个区委以上，即应正式成立团的县或市委的组织，使团的组织与工作能迅速地得到发展，然后召集各地方各省及各解放区的青年团的代表大会，选举各地方各省及各解放区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新解放的城市与地区，因无工作基础，建团时则须较老区半老区有更充分的宣传酝酿与准备工作。

（五）中央决定在一九四九年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并选举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会。目前应即由地方青年团发起建立全国青年团的筹备委员会，筹备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召集。并提议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的联合组织。

为了有计划地训练青年团的干部，除中央已经责成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举办团校外，各中央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和市委并应在各该地区举办团的学校或训练班。为了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广大青年学习，中央决定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中国青年》的定期刊物。

（六）建立全国性的和各地方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下的极重要的工作之一，各地党委必须予以重视。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县委和市委，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关于在

军队中如何建团另行规定通告）接到此项决议以后，应即召开会议，定出具体工作计划，并切实督促执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 对旧保甲人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

林罗，聂彭叶，黄⁽¹⁾，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根据过去晋冀鲁豫在新解放区对伪保甲人员处理的经验及此次济南的经验，我们建议：平津及其他大城市解放后，对保甲人员可采取如下办法：

(一) 少数有重大罪恶行为、人人痛恨的保甲人员，应予逮捕法办。但对一般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须暂行利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之维持。

(二) 由我们委派的市区政府工作人员，分区召集原有的全区保长除罪大恶极者外到区听训，首先指出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机构，必须废除，保长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指派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压榨人民的工具和帮凶，应该受人民的审查，有罪者应受惩处。现在人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宽大为怀，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责令他们在下列几件事上立功自赎：

(甲) 检举潜藏该保的散兵游勇、特务分子；

(乙) 呈报散落该保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以及该保居民私有的枪支弹药（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曾否领有枪照，均包括在内）；

（丙）报告并看管设在该保的一切公共房产、机关、学校、工厂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使之不受破坏。如有破坏及抢劫偷盗情事，应立即尽力设法制止，并报告市区政府；

（丁）注意各户特别是旅馆、客店的来往人员，如发现可疑分子，应立即报告区政府。并严正告诉他们：对上列各项，如有知情不报，甚至身为窝主者，当严予惩处。但栽赃诬告，陷害好人者，亦应受反坐之处分。此外，还须指出他们今后必须低首下心，为人民服务，以求取得人民之宽赦，绝不准许借人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招牌，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否则，一经查觉，再不宽贷。最后，飭令他们依据上述内容联名具结，保证切实遵行。如有狡猾的保长，不愿接受上述命令，借辞推诿脱身者，一概不准。

（三）经过上述手续后，再分区召开群众大会，务求家家户户有人到会，着令保甲人员全体到场站立一旁，去掉他们昔日的威风，当场将第二项全部内容详细复述，将他们所具之联名切结，当场公布，使群众完全了解我们的意图，并号召群众监督他们。如发现他们继续欺压人民，或有其他不法行为，准予随时公开或密函向军管会、警备司令部、市和区的民主政府控告举发，查明属实，定予严惩。

（四）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利用保甲人员，而且是在民主政府的严密控制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暂行利用他们，这绝不是承认他们在民主政权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如济南五区派工作人员下去工作，还要给保长写介绍信，经过保长进行工作，那是错误的。

（五）以上办法，望你们试行，以便取得经验，便于推广。

中央

子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黄敬。

评战犯求和*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

毛泽东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杂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嚣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

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 军事管制和释放狱囚问题 给西北野战军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

西野前委并告各局、各前委：

戊俭关于城市政策总结的报告，已阅悉。甚好。但其中尚有以下两个问题，须向你们说明：

(一) 关于军事管制问题。你们在西府解放各城时所采用之城市工作委员会，从其参加人选和性质、任务说来，实际上就是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管制的基本任务，就是在新解放城市中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逮捕首要战犯，肃清散兵游勇，接收反动统治机构，没收官僚资本，维持社会秩序，扶植人民力量。在新解放区，特别在新解放的较大的城市，必须实行较长时期的军事管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其以后，我们在解放区所实行的军区制度也就是一种军事管制，这在人民战争结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土地改革尚未彻底完成区域，军区制度必需继续存在，而后才能转变为国防军区制。从这一点讲，军管制是需相当长期实行的。黄龙各县解放时，由军队协助县委、县政府进行工作，固无不可，因为都是些小县城，而

* 这个指示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后发出。

在今后，你们新解放的较大城市，如西安等地，则必须实行军事管制。

(二) 关于释放狱囚问题。监狱是反动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必须粉碎的。但粉碎反动统治的司法监狱制度，并不等于释放一切狱囚。你们在西府黄龙的新解放城市实行释放一般狱囚，是可以的，因为那都是些较小的城市；至于今后解放了较大的城市，如西安等地，则不能立即采取对监狱犯人一般释放的方针。否则，势必增加城市及乡村治安工作的困难，并可能招致群众不谅解我们。应该分别对待狱囚，首先派人将狱内的革命政治犯迎接出狱，予以安置处理；待秩序稳定后，再实行大赦，对民事犯和普通刑事犯予以释放；对盗犯、杀人犯则酌情释放或减刑；对汉奸则不应宽赦释放。

此外，你们这一总结，主要还是若干较小城市的经验，尚望注意研究如何把这些经验用于较大城市，并盼将研究结果和新的经验随时电告中央。

中 央
子 鱼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掌握党的基本政策， 做好入城后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

彭 真

今天到场的同志，大多是准备做北平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的，大家进城以后，首要的就是掌握基本方针、基本政策。

进城以后，我们总的任务是推翻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彻底摧毁、肃清反动势力的残余。但必须注意把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机构区别开来。国家机构即指政权机关、军事机关、警察、法院等，对敌人的此种机构，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至于工厂、商店等企业机构，我们应予以接管和改良。

—

具体地讲，进城以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我想应先做下面三项工作：

一、掌握政权。政权是阶级压迫的武器、阶级斗争的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将政权拿在手里，用以保护自己和消灭敌人，否则，不但推行工作不易，甚至受人之欺。如海淀工作团

* 这是彭真对准备进城接管北平市的干部的讲话。

因未首先掌握政权，而受到警察及保甲长之欺，故进城后首先必须善于掌握及使用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搜缴敌人武器，除奸，接收工厂及所有物资。

二、建立民主。民主制度要逐步建立，决不能马上就实行民主普选，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在石家庄时，某纱厂选举代表曾选出国民党来，在东北某学校选举代表，曾选出三青团来，所以在我们刚一进城，情况不明，敌我都难以分清时，不能采取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应首先采取座谈会的形式，比如在工厂中找一些好的工人（人数不要太多，否则容易浪费时间，事倍功半）开座谈会，提出一些问题，互相讨论，彼此了解，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并解决其思想问题。然后再由市府召开全市工人的座谈会。在学校中也是一样，首先召集座谈会，谈谈各种问题。如新北平的建设问题，课程问题等等，然后再由总管机关把各校集合起来开会。在工人、农民不敢讲话的情况下，民主容易被流氓及反革命分子利用。所以进城后不要马上召开代表会，先开座谈会，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大会。现在首先是要把狼打死，肃清敌人就是首要的民主建设。

三、工商业问题。这个问题牵连到一些根本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城呢？农民为什么要这个城呢？北平的粮食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攻下北平，币制问题容易解决，粮食问题比较困难。只往城里送粮食，农民不拥护，但若把城里的工业品送到乡下，农民就高兴了，把城里的知识分子送到乡下为农民服务，农民就痛快了。合作必须彼此互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在于解放生产力，使城市为农民服务，城市农村互相交换物资。在这当中，商业即为彼此交换的媒介，商业搞不好就交换不了，弄得两头糟糕。所以，我们进城以后，除了推翻旧的政

权建立新的政权以外，必须抓工商业。如石景山钢铁工厂、纺织厂等，要组织起来供给他们原料。还有许多手工业者，如不好好组织，他就没有饭吃。所以，必须好好组织，用他们生产的东 西，供给农民使用，这样他们就有饭吃了。大家都有了饭吃，无产阶级的天下就好坐了。不管任何工业品，只要不是吗啡，不害农民，而是农民喜欢的，农民需要的，就供给农民，即使是娱乐品也好。这样，我们才算进了城没有忘记农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由各地运来的几千万斤粮食，怎么才能送到市民的手中呢？排队领取不成，交给保甲长分配更不成。另一问题就是城里工业品如何收集起来送给农民？王麻子刀剪铺的剪子怎样才可以运往冀鲁豫梁山泊的李逵手中？所以必须有国营商店及合作社做好商业工作，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取农民原料给工厂，取城市工业品运往乡下，彼此互通有无。经过合作社调查统计农民的需要，按需要组织生产，可以减少一些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二

北平一个区就有十几万人口，如何开始工作？必须要有重点。我们如能把几件要紧事做好，就差不多了。各区有各区的特点，必须依照具体情况推进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首先是工人工作（近郊为工农工作，但近郊农民与普通农民不同），其次是学生工作（他们比较集中），再次为各种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再下去是贫民工作。一开始须从调查研究着手，大家在从事调查时，不要什么都调查，要把握重心，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依照具体情况确定进行工作的步骤及方法。

下面，再讲几个具体的政策问题。

首先是工人工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不要认为每一个工人都会立刻拥护我们。因为我们长期在农村，回到城市，变生疏了，如久别的亲人一般，心情虽热，但话一时无从谈起。所以，要对工人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说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即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使工人明白国家政权是自己的。对工人千万不要高傲，以胜利者自居，就是对被迫加入国民党的工人，也要亲切和气（但对工贼要区别对待），提高其阶级觉悟，使工人分清敌我友，这样他们才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

工厂分公营及私营两种，公营工厂是公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工厂，其中没有剥削。公营经济必须领导私营经济。公营工厂中应选劳动英雄，它的工作人员应当同我们一样。工人物质生活必须保障，奖励处罚制度也必须建立，好坏分子也必须分清，主要的是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这样就可以解决工厂中的问题。在私营工厂中也应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受资本家的剥削的，并应说明私营工厂与公营工厂之不同。此外，还应说明私营工厂在今天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国计民生。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而保护工商业，并不是为了资本家的私利而保护工商业。还必须说明我们一方面与资本家联合生产，一方面也必须有斗争。资本家必须遵守我们的工厂法，必须服从我们政府的领导。当然工人也要服从工厂纪律。工厂委员会在私营工厂中可以慢点组织，先在一两个工厂做试验。开始时可先开座谈会，也可召开工人大会，广泛地宣传讲演，使工人活跃起来。总之，每个区都必须花相当大的力量做工人工作。

关于学生工作。北平有将近十万的大中学生，必须动员他

们打倒蒋介石。学生中的情形也很复杂，首先应该给他们讲中国往哪里去，世界往哪里去，人民往哪里去，你们往哪里去，历史进化的道路，社会发展的阶段等问题，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其次，我们应尽量发动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工作。大多数学生的阶级意识比较模糊。与工人常在一起，有利于他们确定阶级立场。与农民接近，主要应与贫雇农接近，使他们实际体验贫苦农民的生活。进北平以后，我们要使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预计会在北平造就大批学生干部。

关于农民工作。对农民应该宣传我们的土改政策。北平近郊今年是否分地还未决定，打算先调查一下，提出具体办法以后解决。但必须宣传我们的土改政策，可以对贫雇农说，在你们组织好以后就可以分地。对中农，我们决定采取不侵犯态度，对其土地不动，应该团结他们。对地主不打不杀，对地主的工商业也不侵犯，但对少数保甲长（坏分子）则必须进行斗争。此外，尚有农民的借粮问题，可以从恶霸手中取粮借给贫苦农民，但事先须先好好调查研究。

对贫民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呢？城市贫民是革命集团还是反革命集团呢？原则上他们是革命的。究竟他们是我们的群众？还是国民党的群众呢？他们是我们的群众。但因为这一集团内部极其复杂，所以不能笼统对待。这一集团包括有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成分的人，有的是流氓，有的是小偷，有的是侦探，有的是反动派的狗腿子，也有流亡地主、没落贵族，也有真正劳动而不得一饱的。在这些人当中，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这些人共同之点是穷，但气味又各不相同，有的接近无产阶级，有的接近剥削阶级，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一开始不要先找贫民，而要先找工人、学生、手工业工人等，然后再做贫民工作。

关于保甲长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保甲制度是反动的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保甲长是国民党的爪牙，所以对他们不能提原职原薪。甲长尚为其次，保长则多是国民党工具，多半对人民有罪行。对这些罪人应如何处理？中央有指示：1. 直接指明他们是罪人，但准其将功赎罪。2. 对伪保中所有的特务及反动分子、散兵游勇，须负责登记，并交出保中所有武器、军用品。3. 对保中所有的学校、兵营、名胜古迹、机关等须负责保管，少一块玻璃也得负责。4. 来往过路坏人活动，抢案偷盗案等事件发生，均得由他们负责。一旦发生事件，唯保长是问。这些须立字为证，让各保长互相作连环保，搞得好的，可将功折罪，如果要辞职，我们不准。此外，也不准其阻碍群众运动。开群众大会时，保甲长不准坐，并令其宣布再做错事愿受处罚。甲长可分别情况处理。

关于国民党问题。蒋介石集团的根基是一定要挖的，特务组织一定要摧毁，对国民党、三青团进行登记，分别处理，不要一律对待。北平附近工人中国民党员不少，在这些工人当中，也应该加以区分，有的是相信和拥护国民党而自动加入的，有的是为了饭碗问题带一点主动而参加的，也有的是完全被迫参加的。我们处理的办法是将特务组织彻底摧毁，对国民党及三青团进行登记后，再区别情况，研究处理。必须防止对国民党忽视的态度，不要认为他们已经树倒猢猻散了，要尽量防止此种右倾的态度。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决不搞逼供信，不加肉刑，主要靠调查，这样才能不犯错误。对国民党问题应有步骤地一步一步地处理。

关于原职原薪问题。对企业职工实行原职原薪，学校教职员大体也原职原薪，政府职员非原职原薪。但原职原薪的口号不要宣传。对工人工资问题的处理办法是：1. 在过渡期间顾

不上公平地定工资之高低，故依原职原薪；2. 必须保持技术工人及一般工人的工资比例，反对平均主义的倾向；3. 将来在情况了解后重新调整工人工资，过去靠走门子混得地位及压迫工人的，开除或降级，技术好而工资低的要提升。

关于尊重、团结地下党员的问题。我们这里准备进城的有农民党员，有知识分子党员（包括大部分由蒋管区来的学生同志），大家应该互相学习，以虚心的态度处理问题，不要自以为是，革命工作须一点一点地学习。凡事不要骄傲，一骄傲就要糟。对地下党员要谦虚，尊重他们的意见，彼此好好团结，这样才能做好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彭真文选》刊印。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甲、目前的形势：

(一) 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六十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二百一十个师以上，内有一百七十三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¹⁾家。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可能动员五十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末，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

*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

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三）到南方去作战的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以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南方去作战的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我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将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以上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

胜利。

(四)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五)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六) 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

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说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乙、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

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

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 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 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 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 批准军事计划；5. 决定经济建设方针⁽²⁾；6. 决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项。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马步芳、马鸿逵。

(2)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讲到这项任务时说：经济建设方针，去年九月会议讨论了一下，基本方针是决定了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是对的，与九月会议讨论的精神相符。一方面，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赞成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国营经济在东北占全部经济的百分之四十七，在全国是否平均占百分之十，没有统计。这样的情况，会长期存在，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好好掌握，使它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防止右倾。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说过，不怕资本主义发展，它的这个积极性我们要利用。要容许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合作社必须发展，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但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文化落后，你就没有会计呀，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凡有害的，加以限制；凡无害的，加以利用。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东北和关内的情况也有不同，东北和波兰情况差不多，但也要谨慎。毛泽东在一月八日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中共中央关于以林彪、罗荣桓、 聂荣臻组织总前委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商决。

中 央

子灰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 职工工资薪水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华东局并转济南市委，中原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华东局亥江、亥文，华东财办亥梗，济南市委亥灰电，及中原局戌有亥支亥微亥元等电，及济市电力公司新工资标准草案，均已阅悉。中央对于济、汴、郑等地情况不了解，而且从基本上讲，城市解放不久，草率制定一套新的薪水工资标准是不妥当的，所以不能批准济市电力公司新的工资标准草案及济、汴、郑公教人员薪水标准等。中央认为：

（一）新解放城市中，职工与留用的公教人员的工资薪水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不能草率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而目前的形势又不允许我们召集带全国性的会议来通盘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过去在农村环境中因袭供给制而草率规定的那一套工厂工人工资制度和标准，又不能搬用于城市，因为城市生活水平较高，房租水电等等都要出钱，不能按乡村生活水平来订城市工人的工资。因此，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即按解放前最近三个月内每月所得实际工资的平均数领薪。只有在个别地方，三个月的平均数仍嫌太高，才可稍为削减。只有职工绝大多数公认的个别不合理者，例如某些人本无技术也无管理经验，仅因

人事关系而工资特高者，才需按实际情况加以改变。至于工资以外的各项待遇，则应首先加以区别。对于因战时物价波动而临时采取的补贴办法，非正常制度所有的规定，而在我规定工资计算工人实际所得时又已计算在内者，则不应再额外发给，而应向工人详细解释，把账算给工人听，使工人放弃这种额外要求；但对于某些实行多年的劳动保险制度与奖励制度，例如年关花红、例假、抚恤金等，则不应取消，并按往年实际情况发给。如确有财政困难，则应向职工说明实际情况，动员职工讨论，教育职工，取得工人真正自觉地同意之后，可以暂时部分欠发或加若干改变，但亦绝不能因而过分降低工人生活。

（二）照前条办法实行后，可能发生甲地与乙地之同一行业同等技术的工人，而工资不同，悬殊过大者，可在实行中逐渐加以调整。至于铁路工人，因其本身具有超区域性，如各段工资不同，碍难实行。据华东财办亥梗电称，中原铁路工人工资较之济南铁路工人工资高达二倍半，两路工人在徐州会面，就不好办，这种问题应由华东、中原并加上华北三方面各派专人及铁路工人的代表协商调整之。此会议由华北财办负责召集，并参照东北铁路职工的工资待遇情况，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批准实行。

（三）设在老解放区农村中的工厂，其工资待遇制度与新解放城市中职工的工资待遇制度不同，而且一般是前者较后者为低，如必须加以调整时，则应更多地改变我们过去老解放区的规定，而不要多改变城市工人的工资待遇，使之与设在乡村中的工厂的工人工资看齐。

（四）原来是供给制待遇的一些干部，到新解放的城市工作，也不必急于改行薪水制。凡是供给制待遇的干部，可以集中居住于若干公共宿舍，与薪水制的职员一样按时到机关办

公、下公。但其一切生活供给则以公共宿舍为单位，照旧实行供给制；否则，不是使机关和住宅分不开，就是弄得到处是“小公馆”，对干部教育管理也是不利的。

中 央
子 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禁止 抢购物资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华东财委会、西北财委会、中原财办，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据华东子东子徽两电报告：华北某些公营贸易机关去山东抢购物资，而且利用私商抢购，以致物价暴涨。华北财委会接电后已下令：(1) 暂停收购粮食、生油等类物资。(2) 今后收购物资，只能经由公营商店及合作社收购，不准利用私商。(3) 不准至邻区收购物资，如必须在邻区收购者，应通过邻区财办或贸易公司代为收购。

今后华北任何公营商店如违反以上规定，到山东或西北各地抢购物资，地方党政机关应即禁止。已收购之物资必要时可下令在原地冻结，不准运回，听候调查处理。其他各区至邻区收购物资者亦应同样处理。

中 央
子 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经刘少奇修改后发出。

军委关于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林聂刘谭⁽¹⁾，并转东北铁道纵队，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晋绥分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及彭张赵，邓张，粟，谭，徐周，杨罗，杨李⁽²⁾，及平津两市委：

根据中央会议决定，为争取于本年内迅速修复长江以北的主要铁路，以利我军南进的运输和供应起见，军委即准备成立铁道部，统一全国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并决调滕代远同志任军委铁道部部长。为使这一决定进行得有条理并按时实施，兹规定准备工作如下：

一、滕代远同志应准备于本月底组成军委铁道部，并即以华北政府交通部所管铁道机构为基础加以扩充，于本月二十日后提出组织计划。

二、委托罗荣桓同志与东北局商定，从东北铁道部中抽出一批行政人员和专门人员来军委铁道部担任工作，内中应包括一个可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或总工程师的人，主要人员应于本月底赶来中央。

三、望林罗刘转令铁道纵队停止锦承路的修建，而将该

* 这个决定是周恩来起草的。

纵队的四个支队全部集中关内，首先修复滦河铁桥（先修轻便桥），保证于一月底使北宁路全线通车，直达丰台。该纵队应立即组成一个勘察队，不待天津解放，绕道至天津以南，负责勘察杨柳青至济南府全段工程情况，限于本月内提出修复津济全段计划。华北局应令华北交通部派人至杨柳青与东北铁道纵队派出之勘察队接洽，并引其南下，受其指导。华东局应令华东交通部停止德州、济南段的修建（因关内修建方法太嫌草率，不利行车）。华北、华东双方应保证所有钢轨、枕木及一切器材不得移动，等候东北铁道纵队接收，并应继续收集散失在民间的钢轨、枕木。黄逸峰同志于本项工作布置就绪后，应于本月下旬来中央接洽，并以动身日期在本月二十日前电告。

四、军委预定本月二十五日后召开铁路工作会议，东北、华东、华北、中原及晋绥临汾工委望各派出铁路工作的行政及技术负责人各一，携带各区现有材料，限子有到达。如无变更，即不再通知。会议由滕代远同志主持。

五、东北铁道纵队约三万多人，在其工作地区，当地政府及军区支前后勤机构须负供给责任；如该纵队需要动员民工参加铁路修建，当经由上级政府给以通知，但在紧急情况下，即无上级通知，地方政府亦应接受该纵队的要求，进行动员。

六、东北铁道纵队应准备于该纵队之外，组织前线随军铁道队，每军一小队，吸收铁路行车和大厂修理工人与工程工人参加，准备我军南下后前线铁路被敌破坏，我能随军修理，免碍前进。此项计划，应由黄逸峰同志带来中央。

七、各项执行情形望告。

军 委
子 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林彪、聂荣臻、刘亚楼、谭政。

(2) 指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邓小平、张际春、粟裕、谭震林、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天焕。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关于时局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所有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人民解放区，无一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延安、张家口、淮阴、菏泽、大名、临沂、烟台、承德、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地，均曾被匪军占领。匪军所至，杀戮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

极。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区域，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的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和伪金圆券，破坏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的地位；用各种搜括的方法，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¹⁾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自从日本投降以后，即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防止和停止国内战争，实行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根据此种方针，坚持奋斗，在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首先获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签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但是可惜，所有这些维护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均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尊重。相反地，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不值一顾。国民党反动政府认为人民可欺，认为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随意撕毁，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值一击，认为他们的数百万军队可以横行全国，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他们的援助是无穷无尽的。以此种种，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敢于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为着保卫国家的独立和

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抵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然后又使自己转入反攻，从而收复了解放区的一切失地，并且解放了石家庄、洛阳、济南、郑州、开封、沈阳、徐州、唐山诸大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无比的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都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

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 （1）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保护 古迹文物的训令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我国名胜古迹各地均有，在历史、文化、科学及艺术各方面皆有很大的价值，这些都是人民的文化财产。从前因日寇、蒋⁽¹⁾匪荼毒人民，破坏损毁为数甚多，又在土改期间，因政府照顾欠周，也有部分损坏。兹为珍重人民文化财产计，特作如下之规定：

(一) 凡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之名胜古迹，如：古寺、庙、观、庵、亭、塔、碑坊、行宫等建筑，碑碣、塑像、雕刻、壁画、冢墓、古迹发掘遗址、名人故里之特殊建筑，及其有纪念意义之附属物等，均属于保护之列。

(二) 各级政府之民政部门，应兼办其辖境内名胜古迹之调查及勘查事宜，调查结果随时报告本府。各级政府更当分别情形注意保护。

(三) 关于名胜古迹之修葺，应以保护为原则，目前绝不应翻修或重建，其费用可从地方建设粮内开支。如遇特殊情形需要补助时，可具报本府，认为必要时酌量予以解决。

(四) 凡零散在各地之古迹，当地政府应负保管之责。其能移动者，如碑碣、雕像、铸像之类，必要时可移至名胜场所或古物保存所，以便保护。

(五) 凡有价值之宫、观、寺宇及名胜场所等，禁止军队及其他机关拆毁占用，并应委定专人住守管理，加意保护，看守人之生活费用，应由当地政府规定办法，自行解决。一般无特殊价值之寺院，亦当视为公共财产予以照顾，不可任令毁坏。

上述各项，仰即转飭所属遵照执行，并将保护名胜古迹之重要性向广大群众宣传解释，各县应将辖境内名胜古迹作一调查，限四月底以前转报本府备查。

主 席 董必武
副主席 薄一波
 藍公武
 杨秀峰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六年第四期
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 资本企业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天津市委并告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一) 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无法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时，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

(二) 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这种军事代表的任务应是：

- 甲、保障上级命令的实行；
- 乙、保障生产的进行或恢复；
- 丙、防止破坏或怠工，清查反动分子；
- 丁、防止偷盗贪污及浪费；
- 戊、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与宣传，从职工中挑选干部；
- 己、协助职工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等；
- 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学习管理生产。

军事代表为了达到上述各项任务，应有权力监督企业中的一切活动，了解企业中的一切情形，要适当的人员向自己作报告，并在一切命令及指示上签字。生产的进行如有不好或发生破坏怠工等事，即应查明实情，追究责任，将进行破坏或怠工有据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企业中共共产党的支部及党员，应受军事代表领导，协助军事代表完善地达到上述各项任务。这就是说：军事代表不直接去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来的人员去管理生产，保障生产能照旧进行。这是比较轻而易举的。

(三) 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

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列宁多次说过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做。有些地方的接收人员彻底打乱了原来的企业机构，是错误的，妨害了生产的，不应再犯这种错误。

中 央

子 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军委关于各野战军 改按番号顺序排列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军 委
子 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军委关于同傅作义谈判的 补充意见和积极做好攻城准备问题 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林罗聂⁽¹⁾：

(一) 删日及铣晨各电谅达。关于应付傅方谈判，再补充两点意见：甲、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乙、关于补给，第一期由傅方负责，我方协助。第二期由我方负责，傅方协助。第三期全由我方负责。以上甲乙两项及删日、铣晨所提各项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妥当之处，望电告。

(二) 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三) 望将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失的情况查明电告。

军委

十六日十八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罗荣桓、聂荣臻。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 司令部致傅作义公函*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涿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卢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

* 这个公函是毛泽东起草的。

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示下列诸点：（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开始总攻，至十五日下午三时即解决战斗，贵部十余万人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

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 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对处理天津广播事业、 报纸及登记国民党员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天津市委并林罗聂，华北局，彭叶⁽¹⁾：

子真电悉。除外交问题已另有指示外，其余三项答复如下：

(一) 广播事业，原则上应归国营。目前大城市中私人经营的广播台，虽可允其暂时营业，但必先查明其背景，以免为潜伏的敌人所利用。在调查期间，应停止其营业。天津各私营广播台，闻均有特务机关的背景，望予慎密调查，在获得确实结果后，再考虑是否允予复业。

(二) 天津的益世、大公、新星三种报纸，均已内定不让其继续出版，但采取的方式须稍有区别。新星是李宗仁的报，应即实行封闭，只要证据充足，即应实行没收。益世是天主教的报，常常公开表示反共，应首先以其反共反人民停止其出版，但勿牵涉到宗教问题，然后再搜集证据实行封闭；但不要没收其财产，因该报在国内有相当地位，言论尚非极端反动，其财产有限，不必因此给中外天主教一个反共的借口（北平益世报总编辑郭根系自由主义分子，前为文汇报编辑主任，更须采取慎重步骤）。大公拟从内部革命，加入外力，利用其原有资财、班底，发表宣言，改换名称，组成进步分子的报纸，使天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领导该报此项变

革的人物均为秘密党员（不得外泄），二十一日由此动身托章汉夫同志带领赴津，前往接收，详情由章面告。如大公报这几天尚在出版，我们可暂置不理，亦不表示态度，其内部如有党员和工人来问，可告以暂时维持，防止资财逃散，如已自动停刊，即应派员看管，以待接收，资本关系另订。以上报纸处理情形均应写成新闻，交新华总社审查后公布。此外天津是否尚有政治背景不明的报纸与小报，其情况如何望查告。凡继续出版而不易立即确定对策的报纸，均可采取拖的办法，既不给予合法地位，亦不忙于封闭，而令其报告并从旁调查，待查明后再行决定。

（三）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入城政策草案，尚未经中央审定，望勿依为执行政策的根据。拒绝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应一律逮捕，但他们拒绝登记，必须使他们处于非法地位。政府认为必要时，有权将其逮捕法办，并且必须逮捕一部分拒绝登记的顽固分子，轻者拘留一二日令其登记后释放，情节较重者罚苦工若干天，或科罚金若干，进行反动活动者则判处徒刑。如此处罚少数拒绝登记分子，则可使所有国民党员登记。完全不逮捕不处罚也是不对的，更不要对外宣布对拒绝登记者不逮捕不处罚。又伪省市参议员亦应登记。天津证券交易所同意暂停营业，此事执行情形与经验望告。

中 央
一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 （1）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华北局，彭真、叶剑英。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天津市委，林罗聂⁽¹⁾，华北局，北平市委，并告各局，各分局，各前委：

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一) 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二）具体政策，目前暂行规定下列各项：

（1）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2）外资关系。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但在目前也不要忙于去作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只对于其于人民生活危害最大者，例如金融投机，以及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发出立即禁止的命令。其他如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保险公司，尤其是海运保险公司，更不要忙于去处理。

（3）对外贸易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忙于去建立和恢复一般的贸易关系，尤其不要忙于去订立一般的贸易合同，只在对我有利、而又急需者，可与这些国家进行临时的个别的地方性的进出口贸易。天津一向出口的盐、碱、煤及其他土产，均可准此原则办理。

(4) 海关税收。在我未重订海关税则以前，凡为我所允许的出入口贸易，除特许者外，应照旧章征收关税。海关机构亦应全部接收，派人管理；其中职员，除反动破坏分子外，均可留用。外资在华应纳之税，在未改订税则以前，亦应照旧缴纳，不得停止。塘沽及其他港口，应实施船舶检查，未经许可，不得出入。

(5) 外国传教士。已在我解放地区者，容许其继续居住，执行业务，新来者暂不批准。

(6) 外国人办的学校。已办之私立外国学校，暂许其维持现状，但其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其学校经费，必须报告其来源；其课程，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新请成立者，不予批准。其专为在华外国儿童主办的外国小学校，许其存在，但亦须报告备案。

(7) 外国人办的医院。已办者许其继续，但须受我监督检查。新办者，未得批准，不许开设。

(8) 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信社及外国记者。已出版之外国报纸、刊物，暂置不理，但须令其送全年报刊呈请登记。经过一个时期调查并得中央批准后，一般的不予登记，停止出版。特殊的，或暂不干涉，或转为华人出面主办。外国通信社一律不准发稿，更不得私设收发电台。塔斯社、电通社，应另订合同，由新华社代收代发。外国记者凡未经许可入境，或留在被解放城市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报之权，只予以外国侨民待遇。

(9) 外国人办的文化机关。已办者，经一个时期调查后，视情况并得中央批准，或派员监督，或实行改组，或派人接收。新来接治者，暂置不理。

(10) 外国人办的救济机关。其属于帝国主义政府者，如

经济合作总署等，应不予承认，拒绝接收其援助和救济。其属于国际合作团体者，须视其有无损害我国家主权及我人民团体的独立自主之处，方能决定接收其援助和救济与否。尤其是对于美英等国的团体或个人救济，更须识别其背景，有反动阴谋者拒绝之，有进步作用者欢迎之。对外国救济事务一律表示欢迎的态度，是错误的。

(11) 外国雇员。对一切非政权机关的外国雇员，从顾问到一般技术人员，原则上我们不承认其原有机关的合同，但在需要与并无危险性的职位上，可以容留某些外国雇员，暂时继续其工作。其需解雇者，可酌给若干遣散费。

(12) 外国人入境。在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外国人入境要求，除特许者外，概行停止批准。

(13) 上述各项外国侨民，在我解放区内，必须服从我人民政府法令，不得进行任何阴谋破坏和间谍活动。一经发现，定予严惩，或即驱逐出境。上述各项外国侨民，非经特许，不得携带武器，装制收发电台。原有武器或电台者，应即呈缴当地公安机关（即公安局）封存，待其本人出境时领回。各国外交人员的随身武器，可容许携带，其电台则应交出封存。

(14) 所有外国侨民均应遵照当地公安机关的限期，携带本人相片亲往指定机关（即公安局外国侨民管理科）登记，并呈验护照。如属合法，概予保护。

(1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三) 外事组织，目前可暂行规定如下机构：

(1) 各城市，凡有外国侨民居住的地方，其公安局内应设外国侨民管理科，专管外国侨民的居住、来往与职业的登记、询问和检查及护照之签发。如发现外国侨民中有护照不符、身份不合及违法破坏等行为者，该外国侨民管理科即有权呈准公安局按法惩办，或将其驱逐出境。

(2) 在规定的城市市政府内，应设外国侨民事务处，专管外国侨民所经营的业务（如工厂、企业、银行、公司、商店、学校、医院、教会、团体、报纸、刊物、通信社等）的登记、审查和批复。如其问题性质属于一般的批准立案、核准请求或给予批驳者，小则经市政府行文，大则须经解放区政府行文；如其问题性质属于工厂生产订货、进出口贸易乃至银行借贷或其他专门业务者，则应介绍给各级主管机关接洽，而在内部则均应报告中央或中央局核准。

(3) 在规定的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一外交问题研究组，由市委负责同志一人参加领导，吸收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公安局外国侨民管理科负责同志参加，共同研讨有关外国侨民及外交问题的各种情况，并搜集各项材料，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定期报告，并提出应请示的问题和意见。

(4) 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应于政府内设外国侨民管理事务处，并兼一个市的外国侨民事务处（如东北兼沈阳，华北兼北平，华东、西北、中原可暂不设），以取得经验，指导各地。

(5) 在目前，哈尔滨、沈阳、北平、天津、济南五个市的市政府内应成立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公安局内的外国侨民管理科，其负责人选，须报告中央批准。其他各市，如有外国侨民在百人以上者，应由中央局经调查清楚后报告中央核准成立上

述机构并决定人选。其在百人以下者，只在公安局内设外国侨民管理科，并代管侨民业务。

中 央
子皓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通知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告上海局、香港分局和军委总政治部：

甲、中央决定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在华北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青年工作纲领和通过青年团的章程，选举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会。

(一) 出席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

(1) 在各已经建立起青年团的地区，以省（区党委）为单位，平均以两千个团员选出代表一名，不足两千人但满五百人以上者，亦得选出代表一人。代表必须由选举产生。选举方法由各区自定。

(2) 许多地区仅在开始建团，还没有发展团员或团员人数很少者，规定由党省委（区党委）或相等于省的市青年团筹备委员会选派代表两人至三人，如该省或市由团员选出之代表已达三人以上者，此项代表即不必另行选派。

(3) 各中央局、分局的青委书记，以及党的各省委（区党委）的青委书记（即团筹备会主任）应包括在应选代表的数目内。

(4) 规定青年团的各级筹委会委员，为青年团的各该级代

表大会的当然代表。

（二）青年团的各级代表大会，由青年团的各级筹委会负责召开和准备。

（三）所有出席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统须于四月五日前到达大会所在地，并携带下列材料到会：

（1）农村青年状况（包括青年数字、要求、组织等），建团状况（包括团员数目、分布、经验），工作活动的经验教训。

（2）城市青年状况（各阶层青年的不同的要求和数目），城市建团工作经验。

（3）对大会和团的工作纲领、团章草案的提案和意见。

（4）各级团的与党青委的干部（特别是地委级以上）的详细情况和代表履历。

（5）党的省委（区党委）关于在本省（本区）普遍建团的计划。

乙、中央决定于今年五月四日在华北召开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商讨全国青年的任务，制定全国青年统一组织的章程，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

（一）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为正式代表四百五十名，候补五十名，共五百名，其分配如下：

华北解放区（包括平津）七十名；

东北解放区（包括热河）五十名；

华东解放区（包括华中）四十名；

西北解放区（包括晋绥）三十名；

中原解放区（包括豫皖苏）三十名；

华南游击区十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五十名；

全国性的各种青年团体选派的代表及由全国青年联合会筹

备委员会聘请的青年代表七十名；

华侨及国民党统治区代表一百名；

候补代表五十名（按正式代表百分之十的比例选出）。

（二）代表选出的办法是：

（1）以省（行署）级和相当于省的市为单位，召开该省（或区）青年代表大会，成立或改选各该省的青年联合会，同时选举出席各解放区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之代表。

（2）出席省（行署）和市的青年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应按产业或职业或团体为基础，即是按工厂与工会，学校与学生，各部队各地方的青年团、青联会、学联会、剧团、小学教员会等团体，以会员之多少为比例直接选出代表。同时照顾地区，即是使所属各地区都有代表参加大会。

（3）各县得按本县的实际情况，召开全县青年代表会议，或青年团体联席会议，或采其他简便方式，由各地自定。

（4）各解放区正式的青年代表大会，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之前或以后召开，由各地自定。

（三）特别注意事项：

（1）代表中应有五分之一的女代表。

（2）代表中应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非共产党员。

（3）东北应有内蒙青年代表，华北、西北应有回民青年代表。

（4）应保证有足够数量的青年工人代表。

（5）人民解放军部队的青年代表之产生，由军委总政负责规定数目，经各个野战军选出。

（四）各地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之代表，应携带由所属团体开具的出席证书，以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之审查，并携带下列材料：

(1) 该地青年组织状况（青年团体名称、会员数目、占全体青年的百分比）。

(2) 青年组织、团结、工作的经验教训。

(3) 对大会的提案、意见等。

于四月二十五日以前抵达开会地点。

丙、出席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兼任全国青代会的代表。

丁、全国学生、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青年三个代表大会的筹备会，即将先后成立。各个筹备会成立后，另发正式的通告。你们接到此电后，应加讨论作出决定，根据以上原则精神，立即着手布置工作，并将结果电告。

中 央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发布宣传口号 问题给天津市委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天津市委，并林罗聂⁽¹⁾，华北局，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

天津市委经新华社发来子元电目前宣传标语口号已悉。在我们进入各大城市后，市民对于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及市政府的一言一动，均甚注意；而我们既已取得政权，则我们的任何鼓动口号，即成为行动指令，必须认真负责。如果这些口号不能兑现，或者无关轻重，则人民就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不郑重不负责的党。因此，我们除已发出约法八章及其他准备发出的各项布告外，所有负责机关如市委、市政府、军管会等除中央发布新口号时应予张贴外，均不应张贴一般的口号，或轻易发布什么主张和诺言。至于普通人民团体要张贴标语，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基本政策，则不要去禁止。此外，子元电中的口号有一些是不适当的，例如自（十三）至（十九）都是诺言，这些诺言我们不一定能都做到，或者虽应实行，但无须着重宣传（如保护教堂、寺院、守法外侨等）。又如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应在秩序安定后规定办法布告解散，登记其党、团员，而不要

* 这个指示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修改后发出。

当作口号去宣传。又如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口号亦不合今天共产党市委身份。闻此项口号你们已经广播，同时并广播了若干关于未来建设方针的文告，如果属实，则是极不妥当的行为。你们对处理报纸问题也表现了急躁性与无纪律性，凡此必须力戒。总之，你们在进入大城市时，必须不忙多说话，不忙作各种不成熟的行动，并须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严格执行事前向中央请示事后向中央报告的制度。又我党各级委员会，依党章规定，并无“执行”二字，你们在宣布口号时竟有此二字，望注意改正。

中 央
子 符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 司法机关的建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书记处通过)

北平、天津两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

国民党司法机关为其镇压人民的反革命的国家机构直接组成部分之一。当人民解放城市时，须立即将国民党司法机关全部接管，并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司法机关，以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保护人民利益之任务。

一、接管对象：

北平：河北高等法院及检察处，北平地方法院及检察处，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北平地方法院看守所，第一、第二模范监狱，反省院，其他。

天津：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及检察处，天津地方法院及检察处，监狱，看守所，天津特种刑事法庭，其他。

二、接管组织：

在北平、天津两军管会下各设一司法机关接管小组，由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与人民法院商派得力干部为组长（现已派王斐然同志为北平负责人），其他则于派往平津接收人员中选择一部分人员充任之（有法律知识或司法经验与否并不重要），受平津军管会之领导。军管会应拨相当数量的武装，交给司法机关接管小组，为接收时保护工作进行之用。

三、接管方法：

军管会命令各司法机关原有人员负责保持原状，关于房屋、器具、财产、档案、书籍等项，不得毁坏、搬走、隐藏，一切人犯不得私自发落，听候军管会派人前来接管。军管会司法机关接管小组即派员到各司法机关照下列办法实行接管：

（一）人员之接管与处理：

各司法机关负责人员，如为首要反革命分子或劣迹昭著、为人民痛恨者，应即予看管，听候审理。无反革命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不加速捕。其余检验吏、录事、书记官、法医等技术人员，均可于接管后，听候甄别录用。

（二）档案之接管与处理：

一切档案文书，由原保管人照单检交。接管人照单接管后，即令原管人负责保管，不得损坏遗失。

（三）人犯之接管与处理：

甲、拘押在特种刑事法庭、监狱、反省院及其他处之革命分子，立即欢迎其出狱，并请其推举若干人参加清理案犯及接管工作。

乙、国民党包庇未办之汉奸犯，国民党内部倾轧被押之特务犯，不得释放，听候依法审理。

丙、被国民党勒丁、勒粮、勒款被押的，触犯国民党禁令被押的，犯普通轻微刑事案的，以及为民事而被押的，均应立即查明释放。

丁、重大刑事案犯（如杀人案、强盗案……等）仍宜拘禁，听候审查处理。

（四）房屋、器材、图书、财物等之接管：

甲、房屋：接收后即派人守卫，禁止闲杂人出入。

乙、器具、图书：由原管人造册逐件点交，有搬迁、隐

藏、破坏的应即查究。

丙、财物：

- (1) 属于诉讼人所有之保证金、拍卖金等。
- (2) 属于法院收入之罚金、讼费等。
- (3) 法院或检察官扣押之赃物或证物等。
- (4) 其他财产。

都要法院书记官长分别造册点交，不得隐匿短少。

四、接管后之必要处置：

(一) 立即委任各司法机关负责人（即法院院长、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官长等）。此项人员可于出狱之共产党员或其他革命分子中选用，只要政治坚强有工作能力即可，是否学过法律，无大关系。

(二) 原推事、检察官、书记官长等一律停止原来职务，因这些人在思想上充满了反革命、反人民的法律观念，即封建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阶级以武力强制执行的关于经济制度、社会生活和国家秩序的观念形态，在行为上专门充当镇压革命运动和惩处敲诈劳动人民的直接工具。在打碎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时，这部分人必须去掉（其中非反革命分子和非劣迹昭著分子，如欲参加人民民主国家之司法工作，必须经过思想改造与作风改造方可甄别录用）。同时，执达吏、法警等专门以压迫和敲诈人民为生者，须立即收缴其武装，加以遣散。

(三) 宣布国民党政府一切法律无效，禁止在任何刑事民事案件中，援引任何国民党法律。法院一切审判，均依据军管会公布之法令及人民政府之政策处理。

(四) 对留职录用之司法机关技术人员，应即进行宣传解释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之司法政策与保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买办、军阀、官僚特权

的国民党专政之司法政策的根本区别，并定出与宣布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人员简明守则，以肃清旧司法机关危害劳动人民之积弊和树立新司法机关为人民服务之作风。

（注：北平、天津两市委对于此项建议的执行情形，望于实施后一个月内做出第一次报告，以便取得经验，推广各地。）

中 央
子宥⁽¹⁾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

军委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 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罗：

(甲) 你们二十日十一时半电、十九时电，及转来苏静十九日二十二时电、北平党二十日十三时电均悉。

(乙) 你们应即告苏静转告傅邓⁽¹⁾：(一) 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一〇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四军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二) 一〇一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四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三) 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二十二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间。

(丙) 苏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一) 接收名称可以成立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联合办事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照你们所定。（二）同意你们意见。（三）同意。（四）可同意傅方意见。（五）可同意傅方意见。事实上只要部队出城，我们可以提早整编时间，那时他们亦不会有异议。（六）同意。（七）（八）（九）均同意你们意见。（十）同意。（十一）可同意傅方意见。（十二）邮电照你们意见，报纸照中央意见。（十三）不要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事，要在我们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才能谈得上解散及登记这些反动党派。此条可照傅方提议，以安反侧。（十四）同意。

（丁）你们下达各首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对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意突然突围而出。固安方面，单是华北七纵是不够的，我包围各纵须有很大的警惕性，必须在距敌二十里外构筑防御工事，此点万不可大意。此种敌我杂居办法我军从来没有做过，故须有充分准备，否则难免出乱子。

军 委

二十一日四时

附一：林彪、罗荣桓对苏静关于接收北平问题的意见给军委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军委，并告彭叶⁽²⁾：

兹将苏静十九日二十二时来电转上请阅，并请逐条指示答复。现将我们的意见提供如下，请作参考。

（一）接收机构定名为接交办事处，以七人组成，我方四，

我为主，傅方三，傅为副，我方以叶剑英同志为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三人参加。

(二) 德胜门城外策应，由杨罗⁽³⁾兵团担任；西直门策应，由程彭⁽⁴⁾兵团担任。

(三) 同意。

(四) 平敌出城一星期后的供给补充，解放军后勤统一补给。

(五) 待机。

(六) 同意。

(七) 一切干部在概须经过我们的同意和任命的原则下，同意他们提案上的意见。

(八) 接交办事处系临时性质，接交完毕后，则一切归军管会管理之。在接交期中，则军管会和接交办事处统归前线司令部领导之。

(九) 经办事处移交前线司令部接管，转交军管会处理。

(十) 同意。

(十一) 对伤兵处置方法，同意。对阵亡后事我们无责任。

(十二) 邮电不停，但由我们派军事代表监督检查。对报纸一概暂时停刊。私营者经新的政权登记审查，允许后复刊，国民党公营者，一概移交。

(十三) 宣布解散国民党党、团组织及一切特务机关，并应坦白登记，军统、中统一切档案及电台移交，人员登记坦白，执行听候处理。

(十四) 同意。

林 罗

十一月十一日

附二：苏静关于接收北平问题 给林彪等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林罗聂⁽⁵⁾：（林罗哥十二时转报军委）

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之疑异，需傅适时对部队及机关说明和准备的要点如下：

（一）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办理过渡期间一切军政事宜。

（二）部队开动时，解放军应集中一部于德胜门、西直门附近与守城门部队联系，以防意外。

（三）除留警察及守护仓库部队外，其酌留察绥部队一部，担任临时警戒，我们解放军入城后接替之。但傅本人，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四）开出城之部队自带一星期给养，以后由联合机构负责补给。

（五）部队出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整编。

（六）整编前兵团及其以下部队仍为用原番号，由联合机构负责其管理约束。

（七）部队整编为人民解放军，设置政治组织，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执行命令政策，服从群众纪律等。人事方面依下述原则：（1）能力称职自愿继续者，留任原职。（2）能力优异者可提升。（3）不称职者调整。（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安全，并予返籍之便利。

（八）为避免事权不一，北平军管会纳于前述联合机构。

（九）平市行政、企业、银行、仓库等，原则上暂维现状，

(九) 平市行政、企业、银行、仓库等，原则上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联合机构处理。

(十) 河北省府及其所属暂维原状，或合并，或结束，另商办理。

(十一) 原傅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安抚阵亡等仍由傅总部办理，双方协助。

(十二) 邮电仍保持对外联系。各种报纸继续出刊。

(十三) 中统、军统、情报组织，除别有企图存破坏行为，证据确凿者，依法处理外，一律坦白自新，既往不咎。

(十四) 以上适用于临时过渡期间。有何意见，请示。

苏 静

皓二十二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邓宝珊。
- (2) 指彭真、叶剑英。
- (3) 指杨得志、罗瑞卿。
- (4) 指程子华、彭明治。
- (5) 指聂荣臻。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十九日电称：十九日上午九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提到一月一日南京伪总统蒋介石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哪一个，反对哪一个，好像一月一日和一月十四日国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一样，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实际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议。蒋介石在其一月一日的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过了十九天，同一个政府的一部分机构，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却推翻了这个政府的“总统”的声明，不是“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了。我们要问南

京“行政院”的先生们，究竟是你们的建议为有效呢，还是你们的“总统”的建议为有效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的，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的建议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议。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中共发言人说：南京现在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有一个建议，伪行政院又有一个建议，这叫人们和谁去打交道呢？

中共中央关于 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东北局，并告各地：

子元电悉。同意你们关于招待和欢迎民主人士的布置，发表时，欢迎地点可以不宣布。此外，望注意：

(甲) 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乙) 此间曾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过以下工作：

(1) 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已报告过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

(2) 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过我党新年献词，主席八条文告（他们致东北民主人士两个电报即由此产

生)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我们有负责同志参加。

(3) 他们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谈话,交换意见。

(4) 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

(5) 组织参观。

(6) 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每人赠一册),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新闻)。

(7) 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

(8) 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以上各项工作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

(9) 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

这些经验,供你们参考,可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加以运用。

(丙) 上述方针,应在干部会议上明确地传达与讨论,使大家都能掌握其精神,主动地向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宣传又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另一方面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无纪律无组织状态。

中 央
子 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 方针的补充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天津市委，北平市委，并告林罗聂⁽¹⁾，华北局：

中央子皓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想达。现有两事，须暂时变通办理者，特告如下：

(一) 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武官处中，有电台者，连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看其对外作何报告，并与其本国政府及南京大使馆进行何种接触。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²⁾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令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公安局亦暂不向他们发出登记通知书，而只从旁侦察其行动。等到我们需要向他们表明态度，或封存其电台时，当由中央决定电告，或由你们提议经中央批准后执行。

(二) 对平津两地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观察其究作何种活动和报导，但对外国通讯社，仍应禁止其发稿。外国记者向我机关人员和部队进行访问，仍应拒绝接见和答复；如被偶然遇到并被询以我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时，可答以尚未考虑这项问题。外国记者在北平电报局尚能向

外发报时，如有新闻电稿发南京、上海，我可暂不禁止，让其发出。但我军事代表必须令电报局将其所发电稿于发后按日送阅。在经过一个考察时期后，并经中央批准，再令所有外国记者举行登记审查，到时可考虑其中有否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只以外国侨民待遇。

中 央
子 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 (2) 指蒋介石。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 问题发表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二十五日陕北电)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二十二日报道, 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 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称: 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 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 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 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 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 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而是因为在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 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 原载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話，那末，用談判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使人民少受痛苦，當然是比較好的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的。最近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就是一個實例。但是，南京反動政府是否願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國人民公意的八個條件，現在誰也不知道。現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動政府方面放出了許多虛偽的裝腔作勢的和平空氣，企圖欺騙人民，以達其保存反動勢力，獲得喘息機會，然後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國人民應有清醒的頭腦，決不可被那些偽善的空談所迷惑。談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後才能確定，大約將在北平。彭昭賢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 CC 派的主要幹部之一，人們認為是一個戰爭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這樣的代表。關於戰爭罪犯名單問題，中共發言人稱，我們尚未發表全部戰爭罪犯名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發表的僅僅是第一批名單，發動內戰殘殺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中的主要負責人員決不止四十三個。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澤東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广泛揭破 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沪局，港分局，吴克坚，东北局，华中工委，中原局，华东局，平津两市委，林罗聂，刘陈邓，粟谭，彭张赵⁽¹⁾，华北局，西北局：

美国政府指挥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打击下已起分化，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已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对时局声明，我党发言人又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谈话，望各地迅即将李沈马郭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关于战争罪犯名单，十二月二十五日某权威人士发言中所提的四十三人，仅是第一批，我们现正准备提出一个比较完全的名单（亦非全部）共约一百名左右，日内即发给你们。望你们先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中酝酿，通

过各民主人士，提出较完全的名单。并不限于一百名，只要是人民公认为战犯者，不论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均可以提。并迅速电告我们，以凭决定，是为至要。

中 央
子 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指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

中共中央关于不要在约法八章 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林罗谭⁽¹⁾，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并转所属，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来东野政治部所拟口号十六条收到阅悉。我军人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十六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八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八章内很多重要内容十六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其他几条口号，或则空洞无大意义（例如建设新北平），或则已包括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中（例如召开新政协）。因此，你们只要将林、罗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各点去做宣传就够了，不要另外提出一批口号。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适宜。

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中 央
子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谭政。

中共中央关于平稳物价的建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财委会及财办：

人民银行新币发行，适值平津、淮海两大会战，太原尚未攻下，战争供给空前巨大，货币发行突然增加，以致关内物价剧烈上涨。加以事前准备未周，宣传不够，使我货币供给和物价掌握更感困难。目前各地均苦货币不够，要求大量供给。同时又怕物价剧烈上涨，要求紧缩货币，平稳物价。因之一面感到票面过大，刺激物价上涨，一面又苦印刷力量不够，竟印大票，如此矛盾状态，必须迅谋解决。现在人民票既已发行，不管情况如何，各地必须以全力支持，而战争供给亦须各地共同负担。如因此而引起物价波动，亦须各地分担平稳物价之责，方能渡过一时困难，走向胜利发展。必须教育干部，尤其是财经部门干部，加强整体观念，克服地方主义思想。为此，特向各地提出下列各项建议：

(1) 各地均应负责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支持人民票，平稳物价。现在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平津战役亦将胜利结束，战争胜利，地区扩大，各地应妥慎掌握货币发行，严禁投机抢购，并适当抛出物资，特别是国营工厂的物资，如煤炭、铁、纱布、盐、粮食、纸烟、酒等等，使物价渐趋平稳。否则物价

* 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修改后发出。

再涨，增发货币仍然不能解决困难。

(2) 中央已令东北赶印小票，并正谋利用平津的材料及工厂赶印小票。在此物价波动尚未平息时期，各地希勿多发大票，少发一百元券，不发二百元券，多发十元券及二十元券，即因此而引起若干困难，亦宜暂时忍受。

(3) 货币既已固定比价，一地物价波动，难免不波及邻区，且有些波动因受战争影响，不能完全避免。只能尽力减少其波动的程度，不准再作人为的恐慌而加重波动。对于战争所引起的物价波动，各地必须互相支持，这不但是为支持邻区，而且是支持战争，即因此而受到某些损失，不应过分计算。

以上各点，希即研究执行。

中 央
子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 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市委，总前委，前委：

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

(一) 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陷于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二) 一般的处理办法，首先应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市政府出布告，明白宣布：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地如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或其他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党派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应一并列入）均为反动组织；宣布中国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伪中央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伪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当地如有其他与“中统”、“军统”性质相同的一切残害人民的特务组织亦一并列入），均为反动特务组织。所有这些反动党派、团体及特务机关的组织和机关，应一律解散封闭，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

活动。

(三) 飭令上述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办理登记时，对于特务工作人员及在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组织中的人员，均应加以审查，详细登记，并由专管机关或县市一级的公安局掌握之。

(四) 对于反动党派团体的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于履行登记手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但是必须规定各反动党派团体的最下一层委员会之负责人员，在办理登记时将所属组织内的每个党员、团员或会员全部名单交出，不得有意隐瞒，如发现故意隐瞒者，得加重处分之，交出之名单必须将每人姓名、年龄、籍贯、性别、现在职业及住址载明。受委托之专管机关，对于名单中认为情节可疑或有犯罪嫌疑须特别考察的分子，必须分别加以侦察，并按其犯罪行为轻重分别加以处理。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五) 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和特务组织中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的登记表，须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甲) 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学历、社会经历，以后通讯处；

(乙) 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属的情形；

(丙) 加入反动组织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介绍人、所属组织、所负职务等）；

(丁) 他所知道的反动组织的情况和关系人；

（戊）申明退出各该反动组织并在以后永远不进行反对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如再发现有反革命活动，甘受民主政府的任何处分。此件应由本人签名盖章。

（六）上述人员，履行登记手续时，必须将其所有之下列各项物件及其所了解的反动组织的关系，一一呈缴并报告明白：

（甲）党证、团证、会证、特务证件、徽章、符号及其他一切反动证件；

（乙）秘密文件、宣传品等；

（丙）机关清册、档案和资材；

（丁）武器弹药、无线电通讯器材、密码及其他违禁品等；

（戊）他所知道的反动组织的关系人；

（己）由他所掌管的反动组织的财产、器具及物资。

（七）在登记中，对于反动党派团体中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员以及重要特务工作者，除要他们依法履行登记手续外，仍须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其公民权，并对他们加以管制，责令其依登记机关所规定的日期（每日、每三日或每星期，可视不同的对象分别规定之）向一定的机关报告其本人的行动，以便进行考察。

（八）应该宣布，凡属上述应予依法登记的反动党派团体的人员及特务工作人员，如有拒绝登记或有破坏登记行为，或隐匿与毁坏武器、电台及重要证件、文件、档案，或履行登记手续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均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继续进行反动活动者应一律予以处罚或逮捕外，对于逾期不登记的分子，如果太多，自不要一律逮捕，然而他们既已违反了人民政府与军管会登记的命令，就已使自己处于非法地位，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将其逮捕法办。并且必须逮捕少数拒绝

登记的顽固分子，轻者拘留一二日，令其登记后释放，重者科罚金若干或罚苦工若干天释放，如此即可使其他反动组织内应登记的人员来登记。对拒绝登记的顽固分子，完全不加速捕或处罚，是不对的。

(九) 凡属上述反动党派团体的人员及特务工作人员，如迅速自动投案者，自动缴出武器、电台或重要文件、档案者，真实报告其所知之反动秘密组织及潜伏分子因而破获者，以及对登记清查工作有特殊贡献者，得酌情减免其应得之罪行或给以奖励。

(十) 上列各条，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当地适用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公布实行。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一月二十六日电称：“政府发言人称：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惟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广播中共发言人谈话，一面虽声明愿与政府商谈和平解决，一面则肆意侮谩，语多乖戾。且谓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试问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俟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弭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又据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

* 这个谈话是毛泽东起草的。

露笑容”等情。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一) 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二) 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言人一月二十六日的声明中，获知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方面对于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实在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国势

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我们提出了八条，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不拥护你们的五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张“无条件停战”，“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战争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的。实行这八条，够得上你

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忙上几个月，半年，一年，几年，恐怕还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迪化、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不应当表示不够郑重的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大约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来。南京的先生们，你们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这是要请先生们原谅的。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没有事做。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

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

（四）八条中其他各条双方应行准备的工作，另一次再通知南京。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毛 泽 东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北平的和平解决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国民党中央社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傅作义将军的文告，该文告称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共军已有少部开进市区。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原载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

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周北峰将军成立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了畅谈和欢宴。代表们中的一个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璧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内国民党CC系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

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壁这一类，因而被 CC 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所反对。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毛泽东、朱德给李济深等 五十六人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胜利后，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

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二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附：李济深等五十六位到达解放区的 民主人士给毛泽东、朱德的贺电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先生，并转全体战友均鉴：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二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¹⁾匪，虽若遁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狼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

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
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
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
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
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
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
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
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
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
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
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
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
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
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

二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 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

华东局，刘陈邓，粟谭，中原局，华北局，林罗聂⁽¹⁾，东北局：

（一）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

（二）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

（三）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既然没有大的仗打，则我军可于占领南京后再行休整。如果我们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

的），则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应在占领南京以后举行，这样在国际国内就会产生极好的影响。

（四）因此：（甲）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乙）华北局所担任的一万七千干部，亦应于二月底集中八千人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丙）豫皖苏分局所属及皖西区党委所属干部，应准备分出接收芜湖及皖南地区所需要的干部。豫皖苏分局的其他大部分干部则准备使用于武汉方向。（丁）东北局应准备以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因华东局的干部无接收上海的能力。此项干部目前尚不实行抽调，但须准备抽调，其数目及质量以后商定。（戊）东北局除一部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八千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均应准备随林罗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中原局所担任的干部须于四月底集中，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但目前应让他们在现在岗位上工作，取得经验，不要向他们说抽调的话，引起他们不安心工作。

（五）林罗所部主力应争取于三月中旬完成休整部队、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出动时间另行酌定。

中 央

丑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 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上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到上月三十一日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发言人的答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发言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重新逮捕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准备押送人民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该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逮捕战争罪犯蒋介石等人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发言人声明：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

* 这个声明是毛泽东起草的。

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八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八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

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

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人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为为难之处，那末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末，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复电。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

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你们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而在三月一个整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彭叶并告林聂⁽¹⁾：

九日十六时电悉。

(一) 你们对南京代表团所取态度是适当的。

(二) 他们要求发表的新闻，待交来审阅后再告。

(三) 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

(四) 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

(五) 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²⁾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中 央

十日十四时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
- (2) 指蒋介石。

军委关于对部队 进行地理常识教育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林罗，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徐周⁽¹⁾：

据杨罗耿潘⁽²⁾丑鱼电称，华北第二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重要，读文件已深入一步，普遍感到越学越有好货。特别是在此次时局与任务传达后，情绪很高涨，都说好像打了清血针。同时，并发现干部水平很低，营连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与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望酌量办理为要。

军 委

丑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徐向前、周士第。

(2) 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三月底渡江 作战计划等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

刘陈邓，饶康曾，粟谭，并告林，聂⁽¹⁾：

丑佳电悉。(一) 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二) 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电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三月半为止)部署一切。(三) 你们丑佳电所列八条，除第八条以林罗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七条凡由华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处理。(四)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五) 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六) 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七) 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除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

丑真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曾山，粟裕、谭震林，林彪，聂荣臻。

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任何外国政府 或联合国组织无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

(新华社陕北十三日电) 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仍在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的合作之下活动。本月九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内战。十一日，国民党伪行政院长孙科，即在广州招待外国记者予以附和。宣称“联合国之调处或为获致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上海和南京的反动分子潘公展等人，也在同时予以响应。这种可疑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外交部事先知悉伊瓦特建议的风传。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言人对此发表谈话称：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潘公展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的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一月八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防止轻敌偏向 等问题给邓小平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

小平、陈毅同志并告饶康曾，粟谭⁽¹⁾：

(一) 二月六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

(二) 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二月十八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况，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即可。

(三) 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中 央

丑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饶漱石、康生、曾山，粟裕、谭震林。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把南北 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 当作大事去做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彭叶⁽¹⁾，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

丑文电悉。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京、沪、汉等地的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我们恢复交通、通讯派遣一些特务来平、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津，并互相联络。但平、津方面增加了一些特务，京、沪、汉方面即减少了一些特务，特务总数并不因此增加。而京、沪、汉诸地几个月之后即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此次南京代表团回去对我影响极好。现在上海代表团又来了，将来武汉、长沙亦可能派代表团来。这些代表团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地应付这些代表团。并由总前委及董薄⁽²⁾、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报告我们批准，以便与上海代表及魏文瀚、金山等解决问题。

中 央
删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 指彭真、叶剑英。
- (2) 指董必武、薄一波。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平津两市 学校教育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天津市委，并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

丑灰电悉。

(一) 平津的学校教育是需要加以改革的。你们所提改革天津国立学校的计划，大体上也是好的。但我们怀疑立即进行这种改革的群众基础，即是否绝大多数的学生和教职员都拥护这种合并和改革，而不会引起某种反抗或误会或不谅解，以致给予特务分子以鼓动群众的机会，妨害事业的进行。我们认为你们在群众中的准备工作是不够的，目前你们应积极在学生及教职员群众中进行这种改革的准备工作，并将准备的情况和程度报告中央，以便中央有根据来下决心进行这种改革和合并。如果这种准备不够，缺乏改革的充分的群众基础，则宁愿将改革与合并的时间推迟，以便你们进行准备。望你们即向各国立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说明目前政府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向他们征求意见，如何节省各学校开支及如何合并与改革各学校的组织和教育，而你们自己暂不提出意见，待探知群众中多数的意见后，然后再适当地提出你们意见，经大家讨论，并取得绝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大多数赞成后，再实行改革。

(二) 所有各大学中学的校长教职员，均须从平津各学校原有人员中选择调整，由适当机关加以任命，无法由外面派人去接办。在原有人员中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者及坚决的反动分子，必须撤换，新任命的负责人员亦必须是忠实愿意执行我们的教育方针，并为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所赞成者。教导主任及政治教员，如你们有适当的人，可派遣少数，如无适当人员，则可不派，让学生和教职员自己去组织研究好了。

(三) 你们所提限制私立中学的学费及由政府接办私立学校的意见，是错误的，不可采用。对私立中学，你们可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应该取消的课程而外，不要去加以干涉。应让他们继续办下去。

(四) 关于学生公费制，同意你们所提意见，经过群众讨论，组织评议委员会具体审查决定，通过群众大多数的赞成后，加以改革。

中 央

丑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 空喊“全面和平”？*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中的一篇。

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

“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在这里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

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 变为呼吁战争*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

自从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中的一篇。

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末，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们是学过算术的，请你们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地算一下再作结论吧。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

们可要仔细，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华北局，天津、北平市委，林罗⁽¹⁾并告各中央局、分局：

天津市委丑支电悉。

由于天津及其他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迅速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因此，我们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我们与世界上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未建立这种外交关系以前的对外贸易，自然只是一种临时性质的贸易关系。但这种临时性质的贸易关系，在对我有利及严格保持我国家主权独立并由政府严格管制等原则的条件下，是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的。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决定：

(一) 向华北人民政府提议：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在山东及其他地区是否需要设立对外贸易局，应根据情况在中央批准后设立。

(二) 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在目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害或患处不大的某些贸易，应该在国家管制之下允许私人经营。所有私人经营出口及进口贸易者，除开照章报关纳税外，须事先将出口或进口货物

* 这个决定是刘少奇起草的。

的种类数量等报告对外贸易局，并经对外贸易局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方得进口或出口。在本条以法律形式公布后，所有未经对外贸易局许可之货物，均不得进口或出口，私自出口或进口者，以走私论处。

（三）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该允许那些愿意和新中国进行贸易并愿意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外国的商业机关派遣代表或指定其代理人来和我方接洽，并允许这些代表在指定的地点设立办事处。至于外国政府派来之商务代表，暂时还不应接待。国民党目前统治地区的商业机关向我派遣之代表，亦应加以接洽。

（四）所有由外国商业机关派来之代表，暂时经由地方政府外侨事务处证明介绍，归对外贸易局接洽。在审查这些代表的可靠性之后，对外贸易局即可与这些代表分别讨论双方的货物交换及有关贸易的各项事宜，并了解各国和我进行贸易的范围、种类、数量和条件等，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可能和需要，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分别地订立货物交换的合同。这种合同在签字之前，一律须经中央批准。所有在新中国境内的公共机关及私人机关须从外国购买货物或向外国出卖货物者，均须报告对外贸易局，或由对外贸易局代为接洽，或由对外贸易局介绍他们与外国代表接洽。但一切公私机关与外国商业机关订立之贸易合同，均须经过对外贸易局之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五）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局得向外国派遣商务代表并在外国设立商务机关。新中国的公私商业机关须向外国派遣代表者，须经对外贸易局之允许和推荐，由地方政府签发出国护照。

（六）对外贸易局在了解对外贸易有关的各方面的情况以后，须制定适当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计划，送交中央审查批

准。在这种政策和计划上，应该确定：1. 允许进口，高税进口及禁止进口之货物的项目；2. 允许出口，高税出口及禁止出口之货物的项目；3. 出口和进口货物之临时税率表；4. 根据出口与进口之可能和需要，向国内生产机关和贸易机关提出要求和建议；5. 根据出口进口和外汇的情况及国内经济上的需要，提出出口和进口的计划，并决定和哪些国家的商业机关进行哪些贸易的计划。

(七) 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必须宣布中外船只进口、沿海沿江中外船只停泊及其卸货装货的办法，码头租借使用的办法，海关报关纳税及检查的办法，管理外汇及结汇的办法，以及违反这些办法和走私漏税的处罚办法等。对外贸易局必须立即研究过去的这些办法并准备加以修改或改订，由人民政府宣布。并须立即研究过去出口和进口货物的税率表，准备加以改订后宣布。在人民政府尚未宣布这些办法前，过去的办法可以暂时沿用。

(八) 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和某些通商的外国口岸，建立邮电关系。华北局应即研究过去与外国通邮通电的办法，在可能条件下建立这种邮电关系。对于外国商务人员的入境和出境及在新中国境内有关地区进行业务活动的临时办法，华北人民政府外国侨民事务管理处亦须从速制订和宣布。

(九) 为了进行对外贸易所需之外汇，规定汇率及进行结汇、押汇和买卖外汇等业务，应由国家银行经理。其他银行不得经营外汇及买卖外汇。对外贸易局应即研究过去管理外汇的办法加以修改后，由人民政府宣布新的外汇管理办法。

(十) 进口货物在国内市场上推销时，须遵守人民政府之法令，私人进口之货物，对外贸易局有优先购买之权。对外贸易局对出口商人及任何公私机关在国内市场上收买出口货物

时，应加以密切注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可能的和必要的指导和限制，以便保护与发展国内的生产。

（十一）为了争取出口，发展经济，各地政府必须立即注意提高某些重要物资的生产。例如棉花，大豆，煤，盐，花生，烟叶，蚕丝，猪鬃，皮毛及某些可以出口的手工业品和工业品。各地对外贸易局及内地贸易局、银行、合作社等，必须在春季发放贷款时，用足以刺激这些物资生产的适当的比价，和农民及生产者订购这些物资，以便能够提高这些物资的生产，并便利在收获时的收集，作为自己工业的原料，并争取出口。

（十二）在目前经天津及秦皇岛等海口对国民党目前统治地区的贸易，亦得依照上述各项规定在对外贸易局管理之下进行。

（十三）华北局及天津、北平两市委对于这个指示的意见及执行办法，望即电告。平津两市外事机关应集中注意研究对外贸易有关的各种问题。

中 央
丑 铣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

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 基本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华北局，彭叶，黄黄，并林罗⁽¹⁾，并告东北局：

(一) 丑铨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即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叶、黄黄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你们接洽的情况，望随时电告。

(二) 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问题，可以试谈。

中 央
丑 铤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彭真、叶剑英，黄克诚、黄敬，林彪、罗荣桓。

中央军委关于对国民党军官 处理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叶彭并林罗聂，刘陈邓，彭张赵，陈粟谭，徐周⁽¹⁾，西北局，华东局，中原局，东北局，华北局：

叶九日二十三时电悉。

兹告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

(一) 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但这种人数量并不会多。如其自愿投效，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者，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义，方不致借势欺人，给人民以极坏影响。

(二) 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才，即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亦须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分配工作。

* 这个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三）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

（四）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用社会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五）全国均即将为我解放，遣俘问题须重新考虑。凡可以不遣送者，即照上述方针处理。凡仍应遣送者，待他们到达新地区后，亦照上述方针处理。

中央军委

丑铤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剑英、彭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陈赓、粟裕、谭震林，徐向前、周士第。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 几种答案*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毛 泽 东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付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中的一篇。

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

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的应

当惩办，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勱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了“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这句话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勱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

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

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这些话，和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的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院长仍旧有可爱的地方，这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是“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实际，“全国人”（但不包括战犯及其帮凶）不能接受，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

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 各民主党派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北平、天津市委：

中央关于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

最近几个月来，在济南、沈阳、徐州、开封、北平及合肥等城市，均发生怎样对待各民主党派的问题。中央除对个别城市的这类问题有过指示或批答外，现发出如下的一般指示，作为你们处理问题的根据。

(一) 对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以前，即我党中央发出“五一”口号以前即已成立，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斗争上多少尽了点力的民主党派，亦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致公党等，在被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地方并经过各该党派总部的证明，应一律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加以保护。但这些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在我军到达时，如尚无其总部经过我党中央的正式介绍，则须令其向军管会或人民政府登记，并开列负责人简历，呈报其总部（应经我

* 这个指示经周恩来修改后发出。

中央代转)，经其总部审查承认，并经我党中央通知当地军管会或人民政府后，始能取得正式合法地位，以免被坏分子所利用，甚至假冒。至于成立于去年“五一”以后的任何其他名义的党派组织，在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地区，一律不予承认，并应根据军事管制时期的要求，令其宣布解散，向军管会切实呈报一切。

(二) 各民主党派经过上述手续取得正式合法地位之后，即可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并发展党员或会员。但应诚恳坦率地劝告他们在发展党员或会员时，最好采谨慎态度，因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正千方百计要钻进各党派甚至共产党的组织，以取得掩护，而他们的组织则有容易被这类分子钻入的弱点。同时，希望他们注意清洗可能已经混入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以免损害他们的政治信誉。

(三) 人民解放军布告，人民政府及军管会的法令，不论任何党派成员，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均须绝对遵守，不得违犯。因此不论这些党派地方组织是否已经取得正式合法地位，又不论该各党派中的何种成员，凡有违反上述布告、法令等行为，或甚至利用合法地位以包庇反革命分子或反动武装以及掩护逆产者，或在解放前犯罪有据者，应一律依法处分或治罪，不得享有任何特权。此种处置，共产党员亦不例外。我当地党政负责人应以此劝告各该党派领导机关训令和约束其成员遵守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并协助其实行。

(四) 对个别民主党派掌握的武装，原则上应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加以整编和改造，在实行步骤上，可按具体情况分别缓急，谨慎处理。至对任何假借名义掩护的反动武装，则须坚决加以解散。

(以上四项，由东北局高、李，北平董、叶⁽¹⁾向各民主党

派的领导人说明，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向他们表明：关于长期合作的许多问题，中共中央将在北平与各该总部进一步商量，但目前下面情形有些混乱，希望他们能先采取若干措施，以利合作。如他们对下有所指示，也望通知我们一声，以免彼此分歧，引起误会。）

（五）我地方党领导机关对各民主党派应本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淘汰反动分子的方针，去进行工作。并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与之协商一切重大问题，以争取他们同我党一道前进。他们中的我党党员，不应自动退去，而应依据党的方针和指示在其中积极工作。尚未暴露者应继续避免暴露，必要时并可指派适宜于此项工作的（立场稳、作风好、能起作用的）党员加入进去。他们中确有阶级觉悟而又能起作用的进步分子要求入党时，亦可按照党章吸收。对这些我党同志，须指定专人同他们个别秘密联系，给以指导和教育，并使他们有阅读党内政策文件的机会和条件。你们必须把与中间阶级和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经常注意加以检查、指导，并向中央作报告。遇有本指示未曾提到的新的问题时，应在处理前将情况及处理意见向中央请示，不可冒昧从事。

中 央

丑皓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高岗、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

中共中央关于开滦煤矿 管理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华北局并天津市委及滕代远：

开滦矿务局致毛董⁽¹⁾电，望加注意。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煤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望即乘其请求派遣军事代表之时，立即派遣有能力的代表数人前去，首先了解其生产及经营各方面的情况，学习管理，然后提出管制办法，报告华北局及中央，得批准后付诸实施。在目前对矿局所提三项办法，首先应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此事望与铁道部方面商量解决。在将来运输上如有办法，政府即应把煤的出口和买卖，设法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到自己手中来，以便增加政府经济斗争的武器。那时政府即可从矿局购煤出口及分售给各工厂。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至于暂减产量的办法，则应力求避免，因为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并将使工人内部分裂。如我们批准减产，工人即将反对我们，矿局在此是有一些阴谋的，望你们注意。如存煤实在销不出去，车辆增加又实在无办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法，矿局维持又实在困难时，我们即应和工人职员（可组织开滦煤矿职工代表会）切实商量，要工人职员提出办法维持。那时工人会宁愿暂时欠发一部分工资，而不愿减产的。工人并可能提出其他可实行的办法（如发煤代替工资）来维持。总之，凡是要工人职员有所牺牲的事，必须切实而充分地 and 职工商量，取得绝大多数职工充分谅解后，才能实行，否则我们就要脱离工人群众。关于开滦矿局的全盘情况及你们的办法，望即考虑决定并报告我们。华北政府应切实注意这个问题，并派专人或令工商部去管理这个问题。

中 央

丑 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董必武。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 《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 司法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转政府党组：

(一)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在我们好些司法干部中是错误的，或是模糊的，不仅有些学过旧法律的人，把它奉为神圣，强调它在解放区也能适用；甚至在较负责的政权干部中，也有人认为《六法全书》有些是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只有一部分而不是基本上是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东北印行的《怎样建设司法工作》中所提到的对《六法全书》的各种观点，不过是一部分明显的例证。

(二)法律是统治阶级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法律和国家一样，只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掩盖阶级本质的形式出现。但是在实际上既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有超阶级的法律。《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

因此，国民党全部法律只能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是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在元旦救死求和哀鸣中，还要求保留伪宪法伪法统，也就是要求保留国民党《六法全书》依然继续有效。因此，《六法全书》绝不能是蒋管区与解放区均能适用的法律。

（三）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即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保障其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或它的试图争取的同盟者的某些部分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在基本上不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

（四）我们在抗日时期，在各根据地曾经个别地利用过国民党法律中有利于人民的条款来保护或实现人民的利益，在反动统治下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款来保护与争取群众的利益，并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无疑地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在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或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能够在基本上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法律。

（五）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的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则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作依据。在目前，人民的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同时，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司法工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政权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司法干部的理论知识、政策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水平和工作能力。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从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为人民服务，才能够与我们的新的革命司法干部和衷共济，消除所谓新旧司法干部不团结或旧司法人员炫耀《六法全书》、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

(六) 请你们与司法干部及政府干部讨论我们这些意见，

并将讨论结果电告。

中 央
丑 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旧税制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市委：

叶⁽¹⁾效电悉。同意你们即按伪政府时代之税目税率暂行开征各税，对伪金圆券与人民券折合办法亦同意。但伪政府之税目税率必须改革，收税办法及收税人员和收税机关的组织，亦必须改革，不改革，而长期因袭下去，则是错误的。但这种改革必须是有准备地、逐步地进行。因此，你们一面照旧收税，同时必须努力研究和准备旧税制的改革，而不可忽视这种改革。至于天津市委对于地价税及娱乐、筵席、旅馆等捐，想在研究改革后再征收，则不妥，不如暂时收了，在一个月以后再改。

中 央

丑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指叶剑英。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 泽 东

—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

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

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向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

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

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

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

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

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

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对党

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

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刘 少 奇

毛主席的报告很好，许多同志的发言也很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看到了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也提出了批评，但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

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现在讲讲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城市的接管问题。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虽然仍有些毛病，但已能接收得使人民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 这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北平许多私人企业至今未开工。私人企业不开工，有的是确有困难，但是有些资本家想捣蛋、怠工，企图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增加他们在工人中的资本，这也是事实。因此，我提议，在大城市中，如南京、上海，对于私人企业，凡属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者、捣蛋怠工者，原则上派人去监督，派军事代表去。现在一般地公布监督私人企业的法令是不适宜的。但对派去监督私人企业者，应给他和该企业以详细的指令。在派出之先，还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了解情况（也可找资本家谈），搞清楚问题，有了把握再派去。对军事代表的职权，在指令中应有具体规定，如厂方应对代表做详细的报告，不准隐瞒；要组织工会，教育工人；要防止资本家的怠工破坏。对于工人罢工，党在原则上是无权禁止的。但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才能保障生产。自然，在必要与可能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如原料、销路等问题，也是需要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接收后应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当然有些企业是交不出去的，如上海的纱厂，交给地方是不能正常生产的，但中央政府又尚未成立，也无人接管，所以上海市仍应设法管起来。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应对接管沪、汉等大城市的大企业进行准备。

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

（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

生产。

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关于保障工人生活。人民政府应给工人以可能与必要的优待。例如当物资缺乏时，除保障军队生活外，第一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较高。自然，工人过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驳过了。但因此而疏忽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那更是错误。在极端困难时，工人生活虽苦，而我们的生活更苦，那我们就有理由说服工人，取得他们的谅解，获得他们的支持。陈云同志在沈阳对工人讲，不仅工人烧碎煤，我们也烧碎煤，好煤拿去开火车运军队打仗了。好煤是用来开火车对呢，还是用来烧火对呢？工人知道了这些情形，就没有怨言了。陈云同志这样讲是很对的。

自然，共产党要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而斗争，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给工人阶级以希望，那末工人就会说，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也如此，你们与国民党一样。我们

必须宣传，将来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现在生活苦是为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

目前，有许多农民说，工人生活好，不出差，不出公粮，这不公平。这些话，有其部分理由，但不能完全同意。另一方面，工人也说，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什么？工资未增加，工时未减少，种种情况与过去差不多。这也有部分的理由，但应向未来看。当然不能像对农民一样，允许工人“工者有其厂”，但应注意宣传解释，到将来一有可能，即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工资问题，现在仍未解决，到北平后就要召集全国的专门会议，或先从某一个企业部门研究解决之。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注意。

(2) 关于教育工人问题。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要以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开展广泛的职工教育，开始着重于工人。对于旧的行会组织，应加以改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旧职员，基本上不动。旧政府机构是要打烂的，可以留用的旧职员，一般也要调离原机关（除特殊技术需要者外）。原封不动地保存旧政府机构是不对的。

总起来说，不管是职员、工人，均应加以教育，着重的是政治教育。方式是多办短期训练班，一两个月毕业，三四个月毕业；再就是上大课、夜校等。开始一个时期，上大课是主要的。李立三同志说，沈阳解放以来，住过训练班的职工有三千人，上过大课的有三万人。至于留用的旧职员，当然应受训练。

我们现在许多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多着重于政策。政策是要讲的，但对于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

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俘虏兵经过诉苦运动，一个星期就变了，掉转枪头，英勇杀敌。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这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在对工人进行教育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平津解放后，进行教育的条件是很好的，工人有充分的热情，找我们上大课，虽然下工后很疲劳，上大课还是来。如果进城半年还不搞教育，工人热情就会冷下来。所以要趁热打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像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课程大约就是这四门。

经过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工人，至少是工人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提高觉悟。接着就要搞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原则上党在工人中应大量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组织上有了工会，还有大量党员，那末工人群众就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我们许多负责干部不了解工人，工人也不了解我们，他们急于要了解我们。所以，负责同志进城后就应该和工人见面，向工人讲话，和工人接近，真正互相了解。

（3）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全国总工会应该发一个关于组织工会的决定。全国产业工人有几百万，连手工业工人在内则有

千万。应规定只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才可以加入工会，而不要把小手工业者也搞进来。可以组织几个大企业的全国性的工会，如铁路总工会等。原则上要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

工人代表会的方式很好，凡有三百个职工以上的工厂、机关，均可成立代表会。机关、工厂的代表会合起来，就是市的工人代表会议。

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可在工会成立以前就成立，开始是讨论工人本身的生活问题，逐渐到工厂的生产问题，再到市政等问题。市工人代表会议可作为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一个步骤。市政府的工作计划和意见，均可向市工人代表会议报告、解释宣传，让代表们讨论。工人代表会议搞熟练了，然后搞学生的、街道市民的代表会，搞几个月，搞年把，再发展到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的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厂长的行政命令在工人代表会议上通过，取得同意，而后下达，则容易贯彻得多。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地搞。大革命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推迟，就不利于反官僚主义，不利于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病。现在各地应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

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任 弼 时

—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

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过去，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在农村反封建，发展农村广大生产力，依靠农民，组织军队，包围城市，解放城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城市，就要把官僚资本的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私人资本也允许其有一定的发展。总之是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

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俄国在一九一三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百分之四十二点一，而我们现在还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有什么办法转入社会主义呢？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说来，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城市，努力发展工业，首先是国营工业，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注意农业经济发展的配合。工业上必须照顾农业技术的提高，努力提供水利和农业耕作上所需要的简单机器，将来还要提供拖拉机、康拜因，扶助农业走向集体化。而农业必须生产更大量的粮食和原料，以供给日益增加的工业需要；并以剩余的农产品出口交换机器，维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还必须节约出劳动力以供工业发展之需要。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故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

党的领导机关在这转变过程中，必须加强城市工作，抽调

大批优秀的干部到工业中和工人中去。要教育一切到城市到工业中去工作的党员和干部，认识这项工作的内容和重要性，做好这项工作。同时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是否会有障碍和困难呢？有的。

过去，我们由城市转到乡村也不是容易的，当时对“爬山”、“带花”都不懂，对乡村黑漆一团。现在由乡村转入城市也有不少的障碍和困难。据石家庄市的情况，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不了解城市，不熟悉工业，对管理企业没有经验。其次是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的看法有问题。有的认为工人为敌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我们。有的认为工人不承担战争负担，不出勤务，因此与他们搞不来。特别是发现有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不分析他们大都是被迫的为谋生而出此的，就怀疑工人不可靠，歧视他们，强迫他们登记国民党员的身份，甚至号召“挖蒋根”运动，仿佛工人都是蒋介石之“根”了。于是，这些干部与贫民结合了，因为贫民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与这些干部的相同点较多，容易工作。所以，必须对干部讲清，如何接近工人，否则屁股就自然坐在贫民方面。这些干部还认为搞上层就是搞学生的工作，因此只注意学生工作之蓬勃。这样，与工人有一个时期就是隔阂的。

石家庄直到去年十月以后，在华北局和石家庄市委严重提出依靠工人阶级、生产长一寸的口号之后，才有了转变，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方面；才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以廉价之米粮供给工人；才组织了工会，发展了党员，数量由一二百增加到一千多。为了加强工人的工作，市委组织了工厂工作委员

会，直接领导工厂工人支部。在敌人进攻时，组织工人搬运机器和我们一起疏散；及至打退敌人进攻后，搬回机器，发动工人突击进行安装。他们非常积极，三天之内就完成了铁路大厂的机器安装任务。为了补偿疏散中的损失，发动了增产竞赛运动，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工人打道钉，原来每人每天完成定额二百五十个，竞赛运动中最高达到一千二百个，后来规定定额为六百个。这个厂原来计划两个月补上疏散造成的损失，结果一个半月就完成了，还超过计划价值四十二万斤小米。应当承认，石家庄的工作在去年十月以后，是有转变的。现在那里的大兴纱厂有了新气象；炼焦厂的一位老工程师也承认工人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因此，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城市生产就可以很快地发展，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是并不难的；在发展生产中，照顾工人的生活福利，也就有了保障。

二

我们有了城市，要发展工业，把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的比重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十，资金从哪里来呢？

第一，靠工业利润。这就是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提高技术，节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交给国家去发展工业。石家庄铁路大厂的工人，打道钉的由每天的二百五十个提高到六百个，这在资金积累上是有很大意义的。故必须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一部分改善待遇，一部分用于积累。多余的产品如煤、盐等出口换取机器。

第二，靠农业增产。农民增加粮食和原料生产，一方面直

接供给工业的需要，同时由国家组织大量农产品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从今天的整个情况来看，积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因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毕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生产是大量的。如出口一百万吨粮食，即值九千万美元。日本侵占东北后，自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的五年间，平均每年从东北输出六百六十多万吨粮食，以此来建设鞍山、本溪、小丰满等等。现在我们努力增产（现产粮较战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二），如能在两三年内做到增产一千万吨粮（包括一切农作物在内），只要出口五百万吨，则可获得四五万万美元。

棉花，解放区去年产六万万斤，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全国每年需要输入外棉二万万四千多万斤，如能做到自给，既解决了工业原料问题，又能节约外汇。今年华北地区计划植棉一千四百万亩，相当于战前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今后应争取恢复并扩大棉田面积。华北要计划做到植棉二千万亩，这就可供给天津、东北甚至上海的需要。目前在一定时期内还需从美国输入棉花，但必须争取摆脱这种依赖。此外，如桐油、花生等农作物，也都必须有计划地扩大生产。

农业要增产，就需要改良水利。如山西省代县有一个村，原来每亩地只产四斗粮，后来修了一条水渠，解决了一千亩地的灌溉，结果每亩产一石粮，由此证明水利之重要。

所以，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强调发展工业时，决不能忘记农业，相反的，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积累资金，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等等，则必须努力加快发展农业。加快发展农业，也就是为着发展工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初期，农业上积累资金的意义要更大些。

第三，靠税收。靠各种税收，如财产税、营业税、利得税

等等。不仅对工商业应当收税，就是对工人职员，一切有收入的职业者，也将准备要收税。我们固然要反对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绝不能有任何施“仁政”而一概免税的错误思想。为了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把这看成是中国人人都有的责任。

有些城市，我们进去以后很久不收税。除开兴办大的工业工程外，许多城市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的。长期不收税，以乡村养活城市是错误的。石家庄市的经验，去年财政收入九万石，支出五万石，余下四万石，证明城市财政还有结余。因为要保护工商业，就到处迁就他们，大量投资给私营工商业而不向私营工商业者收税，这是右倾，同样是错误的；只是在收税时要有限度，要使其能生存并有一定利润为原则。

还可以主办各种专卖事业如酒、食盐、烟等，获得利润，收专业税，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

海关和对外贸易，是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及利益的，海关的关税和外贸收入，是国家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

农民要交农业税，这种税在数量上不能少于现在，在比例上要从增产上求得减少，绝对数将来还可能增加。

第四，举办内外债。这也是取得工业发展资金的一个来源，但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的，内债可以在适当时期举办。内外债都是需要偿还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

第五，提倡节约。在战争结束后，军队大部分复员了，脱离生产由公家养活的人员应当精简，不能如国民党那样多，他们有一千二百万人的话，我们最好争取在八百万。

从节约观点上来看，战争结束后，要全部实行薪金制，而且薪水不能比国民党时的高。

我们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十年之后，我们才能喘过气来，才能有将来真正丰衣足食的基础。

上面所说的五个方面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三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也应当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党员人数曾到过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国共分裂后，大批党员遭敌人杀害，只剩下一万人左右。以后我们就转入农村，在农村搞土地革命，到一九三四年长征前，党员发展到三十万人。长征中损失很大，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党员数降为四万人。抗日战争后，我党又有了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党员人数增加到一百二十一万人。现在，全国已有党员三百多万人，其中女党员约占百分之十五，青年党员约占百分之二十四。

从党员的成分上看，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百分之十到十五。东北的党员中，工人多一些，也不过占百分之九点六。

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性等偏向。现在，我们的各级领导骨干中，大革命时期加入党的约有五百人，土地革命时期

加入党的约有一两万人，抗战时期入党的几十万人。现在，团以上及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概有一万零五百人。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他们率领和教育群众，取得革命胜利。今后还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靠农民党员建设工业那是困难的，要建设工业必须吸收大量工人党员。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和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

中国约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他们受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资本长期的直接的压迫，他们文化政治水平高，团结性纪律性强。我们要依靠他们，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党内工作的干部。

我们计划，经过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一百万党员；在非产业工人的劳动者中，如受雇佣、受剥削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中，也要争取吸收一百万人进党来；还要吸收二三十万雇农入党；并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

以后在农村中发展党员，一般以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为限度（新区农村党员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有些地方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是没有必要的。但空白村必须补上。

这样，五年以后，党员总数将达八百万左右，工人成分的党员（包括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在内）要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太快，拉伕是不好的，但关门主义，速度太慢，对工作也是有损失的。我们要依靠工人，发动工人，

就必须注意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吸收时仍应经过严格审查，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发展工作。过去那种不积极发展工人入党，也包含有一种对工人不正确认识的作怪。

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不管城市和农村支部，都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老解放区的有些农村，党员比例过大，受的教育较差，起的作用反而不及以前。平山县洪子店的支部书记说，“数多而质好则好，数多而质不好则不如少好”。过去一个时期，在农村常常采用一揽子会的活动方式（好处是解决问题快，不好处是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放松了党的组织生活，取消了党员的教育制度，是很大的损失。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前，党的支部生活比较健全，那时有千字课本、党员须知，按时召开支部及小组会，对于党员提高认识、遵守纪律、服从决议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大概是在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之后，又加上一揽子会的方式，党的基层组织很少活动了，连那些行之有效的党内教育也被取消了。入党仪式也取消了，而入党仪式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的宣传机关仍应编印党员课本，党的组织生活应当恢复和健全，各地尚习惯的一揽子会的方式应加改变。

党的支部及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当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各地在整党工作中应联系这些内容，认真加以整顿。

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要只忙于登记干部、

转发介绍信，而对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很少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毛泽东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总结的第二部分。

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

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

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毛 泽 东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¹⁾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

*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共十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即本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里是总结的第三、四、五、六、九部分。

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所以，不要做这种定义。斯大林做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季诺维也夫等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时候在俄国，有马克思、列宁的影响，还有季诺维也夫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所以要那样提。马、恩、列、斯在中国的威信很高，中国不发生这种问题。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

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²⁾，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直到苏联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斯大林还是这样谈问题，因为苏联在国内虽然胜利了，但国外来的干涉问题并未消除，现在仍然如此。估计形势，是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后取胜了才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

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但同时我们不应当骄傲，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的，而革命战争的胜利仅是很短的历程，还只是事情的开始。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及十二月会议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

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³⁾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以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

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说：一个月可以。）这中间搬往北平的时间不算进去。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不过，这种中央全会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讨论问题，较之一两千人的大会解决问题更好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即陈绍禹。

(2) 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3) 即张闻天。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认为自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并通过如下的决议。

(一)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反动军队，让其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

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吴化文、曾泽生式的人民解放军。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和他们做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和他们做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和这些人们做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

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以便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及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

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的工作、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建立工会、农会及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发动民众，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反对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反对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个别地区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将这看作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我们已经进行了广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

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表现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及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因为它们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锻炼了它们，使它们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二，中国尚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尚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

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他们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守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及发展。国内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都是要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

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第五，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中央、省、县、区、乡的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也就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完全地解决中国独

立自主的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经济上完全独立了，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制度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的政治上的控制权即

随之被打倒，其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地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

（八）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均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及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业已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他反动的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

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权有责，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给以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之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均应培养一批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爆发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

来捧场。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华社时评)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去年十二月间，当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在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的时候，美国的合众社就传出了美国准备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该通讯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记者且已传出美国不久就要把台湾经济“合并”于日本经济的消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曾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军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并正酝酿将所谓台湾“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首先是打算准许廖文毅以所谓台人代表的资格出席远东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麦克阿瑟且已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吞并台湾。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

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台湾省伪主席陈诚在蒋匪“引退”后且曾表示，在必要时将宣布台湾“独立”，就是说，将使台湾在实际上合并于美国殖民帝国主义。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湾人民了。就在从前，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也曾举行过几十次武装反抗。而自从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以后，台湾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更和美国间谍廖文毅和美国的走狗要把台湾省从中国分立出去并合并于美国的叫喊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曾进行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奴役统治的伟大英勇斗争。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湾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撤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以前台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

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根据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军委关于第四野战军渡江部署 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

林罗刘：

(一) 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二) 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內，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发计划报告我们。(三) 关于行进路上粮草的准备及供应，你们应即与华北局及中原局协商确定，以免迟误。

军 委

三月十七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

薄 一 波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我们已经解放并将继续解放许多大城市。这对于我们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其复杂的新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的工作是先乡村后城市。这是因为，在乡村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存在和发展的缘故。毛主席规定下了这条正确的路线，因而在苏维埃运动期间，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了革命根据地，组织了强大的人民革命的队伍，获得了今天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当现在大城市从反革命的堡垒变为革命的堡垒，永远属于人民的时候，过去的做法就需要改变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指示我们：必须一反二十年来的先乡村后城市的做法，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做法。如果我们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那就不可能使农村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而人民革命政权就不会巩固，中国人民就还不可能做到彻底翻身。

怎样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样才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

* 本文原载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成生产的城市。

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的城市。有些虽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是经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剥削方式取得的。一方面，它们以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受帝国主义剥削。一方面，它们又以低价搜刮乡村的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剥削农民。因此，造成了乡村和城市的敌对状态。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应当合理调整工人的工资和增加福利条件，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某些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以提高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才能够以充足而又便宜的工业品供给乡村，以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才能改善城市的经济地位，从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再受其剥削；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对于我们，无疑地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决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上是少数，而在质量上则很坚强，并且大部集中在城市，只要紧紧地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主观条件是具备了。其次，现代化的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虽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但大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围，其中最重要的、最大规模的又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本家所垄断，我们把它没收过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财

产，只要不分散、不破坏，不在经营上犯无纪律无计划的错误，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客观基础也是存在着的。再次，在城市中，私人资本所经营的现代化工业虽然是脆弱的，但也还存着相当数量。只要我们坚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引导它们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成为一种有力的因素。还要看到，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生产不仅在乡村大量存在着，而且在城市，特别是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城市（如北平）也相当存在着。这些手工业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给予它们以适当的扶植，并把它们经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以至供销的合作等方式逐步地组织起来，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大有作用的。

可以相信，无论从主观条件或客观基础上看，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都是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抓紧这一中心环节，进行这一重要工作，以及在进行这个工作中是否能遵循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致发生大的偏向。在我们不断地严厉地批判和纠正了消灭私人工商业的错误之后，今天在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中，可能或已经发生的主要偏向是：

一、不懂得或者不善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同致力于建设城市从而建设国家的艰巨事业。有的不依靠工人阶级，而依靠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哪能依靠他们建设城市呢？这是一种右的偏向。殊不知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如果不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则革命力量便会变得脆弱，不仅不能完成建设城市、建设国家的任务，而且连人民民主专政的自身也将不能巩固。另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脚把资产阶级踢

开，不和他们团结合作，则是一种“左”的偏向。这会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同样对于建设城市、建设国家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害的。

二、只重视私营企业，而轻视公营企业；无原则地、无限度地、无区别地扶植一切私营工商业，而对投机操纵的、野蛮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不加以必要的限制。当然，在今天是需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这一政策，我们已经确定下来了，不能动摇。因此，给予它以过大的不适当的限制，致使不能发展，甚至趋于消灭，也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成分，要使其他一切经济成分均向着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故对于私营工商业中的投机操纵的、野蛮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必须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各方面，加以恰如其分的必要的适当的限制，引导其发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防止其发生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三、只知鼓励生产，而在供销上没有计划，没有办法，致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供给和需要发生矛盾，生产品推销不出去，不能不陷生产于停滞的状态中，且给投机商人以操纵剥削的机会。为了避免这种弊害，必须一方面尽可能地、比较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发展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纽带，也是沟通乡村和城市的桥梁。它以公道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乡村，而又以公道的价格收购农产品供给城市。这不仅可使乡村避免投机商人的中间剥削，而且可鼓励农民生产，发展乡村经济。

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担负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但由于我们长期脱离城

市，对城市的情况和工作极其生疏，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必须虚心学习，努力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
《薄一波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及 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

各局，各分局，各前委，平津两市委，华中工委：

一、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渡期中，由于中国地方广大，经济落后，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近代工业生产仅占百分之十左右，又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战区与非战区，新区与老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心环节是人民解放军不久即会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但尚须有两年至三年时间，才能占领全中国。因此，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成为必要。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对于新区的领导机关，应该给予较大的机动权。

二、我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前进，其供给负担大致区分为：东北、中原合力供给东北野战军；西北全力及华北的主要部分供给西北野战军及华北各兵团；华东全力供给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不足时，经过中央从华北、东北调剂。在各区分担发生困难或需要协助时，报告中央，由中央设法调剂，或协助其解

* 这个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的。

决困难。

三、中央掌握除东北以外的人民银行货币发行权。东北的货币发行计划须经中央批准。东北以外各解放区得发行小额的人民银行票，或发行地方货币，作为人民银行票的辅币，其发行计划亦须经中央批准。

四、中央暂以华北人民银行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行，各地方银行兼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但各地方银行仍归各解放区自己领导，进行原来业务。

五、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央、中、交、农四行和合作金库及其一切产业，经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后，原则上应交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接管，暂时得委托我各地军管会代管。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政府银行及官僚资本银行，均归我各地方银行接管。

六、各解放区的财政收支概算，均须送交中央审核，但对新区初期不作严格要求，老区则应逐步走上正规制度。老区财政制度完全建立后，县以下的地方收支，应由各解放区根据中央财政政策自行审核。

七、各老区的关税、盐税、统税，应有步骤地分别由中央统一管理。老区应划分中央税与省税，并从华北开始试办。各老区的农业税则及其他税目、税率，应报告中央，以便于必要时进行调整。新区税收，应由各解放区根据中央规定方针，自行实施，待秩序安定后，再送中央审核。

八、对外贸易应由中央有重点地先在华北实施统一管理。目前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贸易，亦属此类性质。各解放区尚在管理对外贸易时，应将其对外贸易计划及较大的合同报告中央，并须使制度与税率等逐渐走向一致。

九、解放区内各区间的贸易，一般地暂由各区自行协商解

决。但重要的或大批的贸易协定，必须呈报中央备案。各解放区如向邻区采购大批物资，必须通过当地贸易机关。若干重要物资如粮食、煤炭、棉花、盐、木材及重要金属矿物等，中央有权实行调剂。

十、工业方面，中央准备先从华北接管几宗大的国营企业开始；一般的国营企业，仍暂归各解放区地方经营，其生产计划，应报告中央。

十一、交通事业方面，各解放区首先必须保证中央批准的铁路修复计划的全部实施。各区铁路总局或铁路管理局，除在行政业务上受军委铁道部直接管辖及在经费上实行统筹分担外，在政治上，及在铁道部已划定在本区范围内的业务计划上，仍应受各有关的解放区党委会的领导及政府的指导，保证铁道的畅通。

十二、邮政、电信、航空、海运在原则上应由中央统一管理，但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分别逐步解决。某些机构，特别在新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暂交地方管理。公路不论国道省道，目前均应归地方管理，并须保证畅通。

十三、兵工及通信、卫生器材的生产计划，一般地应由各老区领导机关提出，军委核准，再归各老区负责实施。在目前形势下，去年十二月军工、后勤、卫生会议所规定的各项生产计划，从今年第二季起，应予削减若干，由各中央局、军区审核后报告军委批准。各种生产成品，应由军委划定范围，或规定种类数目，责成各区依照计划或命令，供给前线或地方需要。

十四、新区的兵工、军需及交通、卫生器材的生产机关，经各地军管会接收后，应交由各有关军区后勤部门接管，报告军委，并提出生产计划。

十五、汽油、机油以分区自行供应和交换为原则，但东北

除供给东北野战军外，如有余量，应交中央调剂。华东除交换外，西北除生产外，如尚不足，可由中央设法补助。

十六、各野战军在新区及城市缴获的军用物资，于接收后，除必须补充其本身者外，应将其重要部分报告军委，以便调剂。

十七、为保证实施上述各项业务，中央及地方必须迅速解决下述各项组织问题：

1. 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

2. 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委员会或办事处，除华北外，均仍照旧执行其原来业务，并依上述各项规定与中央实行分权分工。中央一切命令，必须经过各区财委会。

3. 军委后方勤务部应成为后方勤务的司令机关，一切业务除少数外，均经过各大军区的后勤机关及兵工生产部门负责实施。

4. 各解放区与全局有关的财政经济及后方勤务的工作计划，统应依照上述各项规定，或送中央军委批准，或向中央军委报告备案。中央军委的一切计划，亦应于最后决定前，先行征求各区中央局、军区、各野战军，或各区政府财经部门的同意，然后公布实施。

5. 各解放区政府的财经部门，及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后勤部门，有责任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卫生机关，供给各项报告和材料。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卫生机关，亦得向各区有关部门发给在中央批准的计划范围内的各项指示。如遇有争

执，或指示行不通时，得经过各区中央局、军区或野战军直接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解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前委，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太原总前委：

一、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拨充军食，当地如有地方公产收入之存粮亦可尽先借用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征借的粮草，将来再另订办法拨还或预交公粮；届时亦可宣布大地主、大富农所借出之粮食，即作为征发之军粮，或只顶还其一部。

二、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地主征借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富农行借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佃富农征借百分之二十，中农征借百分之十到十五，贫农一般不借，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可少借一点。马草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附加。在群众尚未发动的新区，这一规定之全部实行，固属尚难保证，但这种原则规定还是必要的，目的是避免不分贫富平均摊派，或对地主、富农行借过多，打击过重。

三、南下的部队，可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领导下，由随军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负责筹粮。当地

保甲长及差务处之类的组织，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合以民主评议，进行征借。粮秣工作队则一面监督他们，一面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我们的借粮政策（当然也要宣传其他各种政策），检查保甲长或差务处对借粮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核对其账目，责成他们在当地群众中公布之，防止他们贪污中饱。无保甲长或差务处可资利用者，则由工作队直接办理征借。

四、在新区，应坚持财粮制度，爱护人民的财富，反对浪费，严禁以粮食换各种物品。粮秣由工作队按规定发给各伙食单位。不经过粮秣工作队，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粮草。为此，最好以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印制统一的借粮证，由粮秣工作队统一填用。粮秣工作队有供给部队粮秣之责，也有检查粮秣开支之权。各伙食单位要向粮秣工作队报销。工作队也应有粮秣收支的详细账目，各政治部及部队首长随时检查。

五、征借粮秣时，一面要保证部队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顾到当地的负担能力，并注意了解有无部队征借过及征借了多少，据此才能决定征借的数量。同时要尽可能地分散征借，不要只顾一时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众一次出粮太多，引起反感，并影响后来部队无粮可借。

六、部队进入城市，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军粮，如缴获不敷而又无粮接济，可经过商会向粮商暂时借用或订购短期的粮食，再由商会负责筹款折价偿还。

中 央
寅 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被难情报工作 人员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社会部：

我各地秘密情报工作人员，多年来在敌人血腥统治下，为了革命事业，曾有若干同志或同情者已英勇牺牲，或尚在敌人监狱，现值各大城市已告解放或即将解放之际，特规定对被难情报工作人员处理办法如下：

(一) 对已殉难同志或同情者，应搜集其英烈事迹呈报中社部并对其家属予以抚恤，其家属在解放区者，应由各该社会部负责证明，通知地方党政，给予烈属待遇。

(二) 对被捕蒙难同志或同情者，在该城未解放前，应多方调查其下落，设法营救，对其家属予以救济。在该城解放后，应即派人清查，予以慰问，关心其生活，照顾其家庭，并在工作上和学习上予以适当安置。

(三) 以上责成各前委、分局、中央局所属社会部指定专人执行，并将情形电告我们。

中 央
寅 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经周恩来修改后发出。

中共中央关于对旧职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市委：

寅江关于处理旧职员电悉。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 对于企业机关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地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设法清除那些坚决的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倚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显明地降低，则应适当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这种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应如此处理。只有如此处理后，才能使企业内部安定团结，进行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这种改革。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此外，一般职员亦有许多旧思想和旧作风须要改造。但在进行上述改革之前，必须准备好充分的群众条件，必须先让群众中宣传，提高群众觉悟，组织群众的审查和评议，取得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但又要避免群众中的报复和私人挟嫌等，不使这种改革走入歧途或过分。这是你们现在就必须立即准备和着手来作的，在作法中又应有适当的步骤，不可冒昧从事。又，企业中的旧职员一般都应受训（政治训练），训练班可由本企业开办，亦可由企业高级机关或由市政府开办，把那些应该洗刷的人员首先调离本企业，到训练班受训，然后根据训练后的情形或者开除或者分派另外工作。其余一般受训职员则仍回本企业工作。以上是初步改造企业中旧职员必须进行的若干步骤。

（二）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则须要采取另外的改造办法，也可以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因为除掉少数市政上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我们一般地不倚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倚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不打乱是错误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地集中训练，有些年老或资格太高，不能进普通训练班者，则组织特别训练班。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学或华大、军大，但对这些人的训练班须由华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别创办，不宜进华大、军大或人民大学。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张几个城市对调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县去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显著者及其他无能的不

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在我们的企业中是实行薪水制，但在我们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除警察须特定待遇标准外，则还不能实行薪水制，还必须实行供给制若干时。故对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司法、军事、警察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只能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即实行供给制。对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工作人的标准，是不妥的。但在实行供给制后，对他们的家属确实困难者，原则上按我们家属标准待遇，给以津贴；家有积蓄，不要津贴者，则可不给或少给津贴。但有特殊技术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者，则须给以高薪，继续任用。你们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过去和现在照原薪发给一月或二月薪水，是可以作的，但向他们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错误的。对于旧政府机关的职员的处理，须要与企业机关的职员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你们寅江来电所提办法没有这种区别，是不妥的。估计依照上述办法来处理旧政府机关的职员是会有反抗和不满的，你们应该预有准备，并须使自己所采取的步骤力求适当，但对这种反抗和不满，不应害怕，而必须坚持这样去作。又，估计依照上述作法，会有一大批旧职员不愿在我们政府机关工作，但除开十分不愿工作不愿受训者外，我们应采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员的态度，决不可轻率地把他们开除赶走了事，而应细心地和他们讨论如何改造思想作风为人民服务及解决他们家庭困难的办法，以便能争取大批旧职员为我们政府工作。

上述两类办法，望你们加以考虑。如有困难或新的意见，望即电告。如认为可行，望即根据以上原则拟定具体办法，由华北政府及市政府实施。并同意由徐冰、刘仁、戎子和组织专

门委员会来处理。

中 央
寅 养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毛泽东、朱德给重庆号巡洋舰 起义官兵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 举行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邓 小 平

甲、蒋⁽¹⁾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十八个军四十九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六个军二十三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四个到五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 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 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

* 这个纲要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的，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四月三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

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 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 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 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 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 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 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 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四个兵团的主力

甚至全力于京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一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

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四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 中国妇女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各个时期，都曾有过重大贡献，今后必须更加努力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起，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肃清国民党反动势力，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妇女获得解放。

(二)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因之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日益加重。解放区的妇女应继续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发挥高度的才能与智慧，努力参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建设事业，其中心环节，是恢复与发展解放区内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妇女只有积极参加生产，才能提高并巩固妇女的地位，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的生活，更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解除封建束缚。

(三) 半年来已有很多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被解放了，还将有更多的城市相继被解放，重要工业多集中在城市及其附近，开始了以城市为中心，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因此，城市妇女工作的重要性比过去大为增加。当前的妇女工作，要在不忽视乡村妇女工作的条件下，以城市妇女运动为工作的重心。城市妇女运动应以女工为基础，团结其他劳动妇女，争取知识妇女、自由职业妇女及其他各阶层妇女，为肃清敌人，建

设人民的新城市而努力。在这里，首先重要的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原则下，尽量组织劳动妇女参加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工作。因此，新解放城市中的劳动妇女，应该积极响应复工复业的号召，使公私企业迅速恢复。对在业女工应加强其教育，使之提高觉悟，建立新的劳动态度，发扬生产积极性，加强生产效能。应当根据具体条件，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种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合作社。应当适应工业生产的需要，吸收工人家属和能劳动的妇女参加生产，尽可能组织大批家庭妇女参加劳动，使许多过去不事生产的妇女，转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树立以劳动为光荣的观念。建议政府的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给这种劳动妇女以充分的帮助，适当地解决她们的生产原料和生产品的供销困难，以利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四) 在有了初步工作基础的城市中，应围绕在生产事业的周围，逐渐解除束缚妇女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和迫切的特殊的困难，改善妇女生活，提倡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举办托儿所、妇婴卫生及助产训练班等。发动和组织一切劳动的民主的妇女大众，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运用民主权利，废除封建压迫，参加国家政权各方面的工作，以提高并保障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五) 城市和乡村的妇女知识分子，应当努力与劳动妇女结合，与生产事业结合，提高科学知识与技术能力，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女学生应当努力学习，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才。对工农妇女应给以更多的求学机会，培养劳动者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职业妇女应努力学习，精通业务，善尽其职，以自己工作的表现来开辟与巩固妇女参加各种社会职

业的道路。要吸收知识和劳动妇女分别参加各种训练班、学习会、研究所，培养大批优秀的女教师、女职员、女经济工作者、助产士、医生、保育工作者等，为新社会的建设事业而服务。要克服知识妇女轻视劳动的旧思想，须重视与工农结合的必要，组织女干部深入工厂和农村，为广大劳动妇女及儿童服务，以达到沟通并促进城乡文化的发展。

（六）在解放区的农村中，我们同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该决定着重指出了老解放区妇女，应以积极参加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组织妇女参加生产过程中，要善于同反对束缚妇女的封建残余的斗争相结合，提高妇女政治文化水平，动员她们积极参加民主建政，推进妇婴卫生，使农村妇女获得更进一步的解放。新解放区在初期的反恶霸、反土匪的斗争及以后的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的斗争中，均必须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并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这一决定的方针，应当成为各解放区妇女团体在农村中工作的方针，并努力贯彻执行。

（七）现在尚在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下受压迫的妇女，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迫切的要求解放。这里妇女工作者的任务，应当指出妇女痛苦的根源，使她们认清解放的道路，并善于运用各种方式，团结自己，和人民一道，为着改善自己的生活，为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残余反动势力，为着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前进而进行适当的斗争。

（八）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和妇女运动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它是全中国各阶层各界民主妇女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必须以城乡劳动妇女为基础，密切地联系和团结全国各阶层的民主妇女大众，忠诚地贯彻执

行本届大会的决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而奋斗。大会认为：解放区城乡的地方性妇女组织，应以妇女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这种妇女代表会议，是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主要基础组织。

（九）三年来中国民主妇女运动与国际民主妇女运动的联系是有进步的，这对于反对世界法西斯残余、拥护国际和平民主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今后必须更进一步地加强与国际民主妇女运动，特别是亚洲各国民主妇女运动的联系，以粉碎帝国主义制造新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毛泽东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傅作义将军：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毛 泽 东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

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性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应注意吸收 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 给邓小平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日)

邓饶陈⁽¹⁾：

(一) 长江水势一个月内(四月上旬至五月上旬)是否会有很大的变动, 请即查告。

(二) 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 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 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 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 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 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 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 请你们考虑, 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 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 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如果允许他们参加工作, 采取何种方式为宜, 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会之类是否适宜, 请考虑答复。

(三) 不但上海如此, 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四) 黄炎培给陈毅同志的电报⁽²⁾应给以回答。

中 央

卯 虞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饶漱石、陈毅。

(2) 指黄炎培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给陈毅的电报，其中说：“弟今已抵平，特向兄遥致敬意，握手欢迎，为期不远，珍重珍重。”

毛泽东给李宗仁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¹⁾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即张治中。

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 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朱 德

一、国内形势

现在国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你们肃清了东北的全部敌人，配合了第一、二、三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作战，解放了北平、天津。敌人的主力已被我先后消灭。现在敌人所余下的仅是残余的军事力量了，总共约二百万人左右，其中战斗部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而且派系庞杂，各自为政，已无强大的抵抗力量，战斗意志极为低落。因此国民党政府要找我们和谈，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负隅顽抗。我们不要被敌人欺骗，我们要积极准备迅速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

今后解决敌人的办法，大体上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天津方式——对不投降而顽抗的敌人坚决消灭。全军要随时准备采取此种方式解决敌人。

第二种，北平方式——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改编为人民解

* 这是朱德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报告的提纲。

放军，这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种，绥远方式——在边远地区及无关重要地区，可以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以待日后改编。

和谈如果破裂，我军将有二百万以上大军渡江南下作战，你们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负有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我军南下作战，有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条件。

（一）有利的条件：

1. 我兵力强大，士气旺盛；敌人力量弱小，且士气沮丧，又不团结。

2. 解放区已伸延到长江边，有二万万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持我军。

3. 江南广大群众渴望我们去解放他们，只要我们在政策上不犯错误，群众是拥护我们的，而且他们有过大革命及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

4. 有江南游击部队的配合（现在江南共有五万余游击部队）。

（二）不利的条件：

1. 我军因要深入敌区，远离后方，运输供应比以前要困难得多。

2. 南方多山、河、水田、湖泊，北方部队一般缺乏在此种地形上作战的经验。

3. 我军绝大部分是北方人，要去南方作战，不大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而且容易患疟疾、中暑、脚气、疥疮等疾病。此外还会产生留恋家乡、保命偏安的情绪。

4. 我军因不断胜利，部队中可能有部分人存在骄气，轻视敌人，可是敌人虽弱，还是要作最后挣扎的。

以上这些，必须在干部和战士中作深入的动员解释，不要

只强调有利的一面而不讲不利的一面。只有公开地、详尽地说明各种有利和不利条件，使全军自觉地积极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才能完成中央军委所给予你们的任务。

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政策与纪律问题。

1. 执行党规定的政策。

（1）土改政策。这是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我们是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但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先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减租减息，等我军站稳脚跟，群众觉悟提高，有了组织，再来彻底分地。至于对地富，也要同农民一样分给他们一份土地。

（2）城市工商业政策。今后渡江先占领城市，再占乡村。过去在执行城市工商业政策中，犯过不少错误，后来予以纠正，最近有很大进步。全中国很快就要解放，城市都要归我们管理，所以不应打烂，不要破坏，这样建设就会快一些。今后占领一个城市，一定要先把城市的工商业好好保护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占领城市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和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步战胜这些敌人。

（3）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要扩大反美反蒋⁽¹⁾的统一战线，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反动死硬派，但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立场。中央已有规定，除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外，其他资本家的财产一律不没收，并允许他们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工商业。这样，统一战线就扩大了。

(4) 争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这是很重要的。

(5) 社会政策。不许乱打乱杀。我们实行土改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不是从肉体上去消灭地主分子。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分子也要按法律手续惩办，不要乱打乱杀。这在新解放区尤其重要。

2. 严格遵守纪律。

要正确地执行政策，就要严格遵守纪律，要靠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第一，群众纪律。在执行这一纪律方面有很多好的例子，出现了不少的模范班、模范连、模范团或师，他们不侵犯群众利益，做到“三不走”、“四不进”、进出宣传，实行“房院包工制”，并发展到访贫问苦、军民联合诉苦等。第二，经济纪律。不抢战利品，一切缴获归公，不搜俘虏腰包。第三，指挥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在执行纪律中，还有不少缺点，特别是在遵守群众纪律、缴获归公等问题上缺点较多；另外也有不听命令、擅自撤退的。今后应该克服这种现象。

政策、纪律执行得好，胜利就来得快。我们要会打仗，又要会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才能获得全国的胜利。

3. 如何保证政策、纪律的执行？

(1) 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策和纪律教育。应当讲明为什么要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提高阶级觉悟，发动群众自觉执行和遵守，相互督促。

(2) 各级干部起模范作用，并严格管理、检查。过去不少干部破坏政策、纪律，有的甚至带头破坏政策、纪律，那怎么

谈得到严加管理、检查呢？

(3) 认真追究责任，赏罚严明。今后对违反政策、纪律的问题，必须认真追究，给予批评或处分；对执行政策、纪律好的同志或单位，必须表扬或奖励。

(二) 工作队问题。

人民解放军是个战斗队，又是个工作队。为什么它又是个工作队呢？

当然，在现在和将来一定历史时期内（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期内），人民解放军无疑是个战斗队。但今后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及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多了，随着战斗的逐渐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要增加了。

我们要解放的地区还很大，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三，干部不够用，当前虽然准备了五万三千人，可是还远远不够分配。所以必须准备将二百万以上南下的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开展了，你们南下的任务就能完成。二百万以上的野战军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同志们要教育部属不仅要做一个好的战斗队员，而且还要做一个好的工作队员。要教育全体南下的同志，除完成战斗任务外，还要好好学做工作队的工作，如学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工作等。

(三) 军事民主问题。

1. 军事民主是实现领导的重要方法。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

2. 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应该继续

发扬光大。

3. 现在各部队在练兵中，在战前、战后普遍地召开“诸葛亮会”、“想办法会”、“评伤亡会”、“评技术会”，特别是实行新式整军以来，广泛地开展了“查整”、“诉苦”、“评比”等群众性的活动，使得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现在，官兵关系比以前好，指挥员认为兵好带了，战士认为干部作风比以前好了，同时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也大大地改善了。这种军事民主必须继续大加发扬，并将已有的丰富经验总结起来，以便更好地运用和推广。

（四）学习问题。

学习应由两方面进行。

一是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这种学习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就是在战场上、工作中学会本领的。这是很实际的、很好的学习，但必须提高。大家要把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起来，提高一步，使之条理化。

二是理论学习，这种学习和实际中学习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干部在理论学习方面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注意或没有理论学习，那末我们的行动就会变成盲目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列宁的名言。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论就会迷失方向。由此可见，不学习理论是很危险的。今后大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给予的光荣任务。

最后，我希望同志们将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丰富的战争经验收集和整理起来，作为我军今后的新的教程，愿大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军委关于推迟至四月二十二日 渡江给总前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¹⁾：

灰未电悉。

(一) 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 按照总前委灰未电，阳历五月初开始大水，则由卯删至五月初，尚有半个月至二十天未发大水。我军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五日十四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 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十八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 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时间（即十七日至二十一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十八日至二十一日未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四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军 委

十一日五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军委关于将攻击太原时间推迟 至二十二日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

徐周罗，并告彭⁽¹⁾：

(一)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 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军 委

十一日十八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彭德怀。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任 弼 时

一 目前形势与任务

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要用最后的努力来实现这一全国胜利，同时又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个建设的首要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以巩固中国的独立与统一。

代表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集团——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时期，就想借日本法西斯的力量来达到它削弱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目的。它对反共是积极努力的，而对抗日则是消极的，借抗日之名以积蓄力量来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这与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意图是相吻合的。但是，国民党借日本的力量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希望并未能实现，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之下，成了中国人民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

（没有它，中国早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自己。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终于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陆海空军兵力总共有四百三十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一百二十八万人，既没有空军海军，大炮也为数极少。国民党满以为依据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各种帮助，一定可以获致胜利，并曾预计在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内定可消灭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虽占劣势，但是执行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因而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解放军，与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努力相结合，经过一年艰苦的防御战斗之后，在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即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就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反动军队则由进攻转为防御。这是一个带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解放军除大部收复了在第一年所失去的土地、城池之外，并且把战争引到长江以北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从缴获中培养了自己的炮兵，建设了自己的工兵，因而也就能攻克一批中等城市，如石家庄、四平、洛阳、潍县、开封等，解放军的战斗力和军威大为提高了。

到了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不可比拟的，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到现在为止，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共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四百九十五万人。现在的国民党反革命军队已经由四百三十万人降到只有一百一十万战斗部队及数十万后勤机关部队，这些残余的战斗部队中许多是经过一次或一次以上消灭后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既很薄弱，而且散布在迪化到台湾这一非常宽广的区域之内。人民解放军则于同时期内由一百二十八万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以上，其装备则毫

不亚于美国装备的国民党的最优良的陆军。

与军事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的地域与人口也扩大与增加了。据三月初统计，现在解放区的面积有二百六十万一千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整个东北和几乎是整个长江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都已被解放。解放区的人口已达二万万以上。在包括一万万人口以上的地区之内，已经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在这种地区内，过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获得了土地，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说是已经被消灭了。在广阔的解放区之内，有相当的轻重工业、铁路运输的基础，有极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源，如煤、铁、粮食、棉花、盐、石油、木材等。分布在这一广大的解放区内及三百多万军队中，有三百多万共产党员。在解放区内，有数以千万计的有组织的工人、妇女、青年及民兵。解放区内工业农业正开始恢复，金融物价也比较国民党区域为稳定。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大为增加，人民胜利的信心非常坚强，解放军的士气甚为高涨。

人民力量的胜利发展，亦即国民党力量的失败与缩小。国民党随着在军事上的失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日益土崩瓦解起来。发行不久的金圆券，已经降到伪法币的地位。美国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人民面前，遭到从来未有过的孤立。一切过去还动摇着的中间力量，现在已经更加靠近于人民方面。总而言之，人民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对比，在最近一年之内是起着对人民方面绝对有利的变化。经过辽沈、淮海与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在基本上被解放军所打垮。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援助，也不能改变国民党灭亡的命运了。

最后肃清国民党存留的反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使革命在全中国获得彻底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目前应当继续努力不可

松懈的工作。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下列方式：一种是继续以战争的方式，就是所谓天津方式，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全部歼灭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人民解放军是完全有把握做得到的。全中国以至于全世界的人们，连国民党反动派在内，都会相信这一点。另一种是按照毛主席在一月十四日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就是所谓北平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没有如天津方式那样干脆痛快，那样能迅速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但是可以避免破坏和人力的消耗。^①

对于这两种解决中国残余反动势力的办法，我们欢迎第二种，但同时必须准备第一种，而且只有痛击一切反抗和平解决的部分，才更易于争取用和平方式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要努力使南京政府迅速交出自己的权力，以便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实现中国的完全解放与统一。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见，我们离在全中国胜利的时期已经不远了。这种胜利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对世界民主与反民主力量的比重上，会产生有重大意义的变化。然而我们要认识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指示的深远的意义，要懂得在军事上完全打败国民党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完全摧毁国民党一切反动统治机构，这是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这还不等于中国就已经最后地达到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毛主席着重指出说：“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完全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

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根据毛主席的估计，“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百分之十左右的工业，因为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影响，相当部分已被破坏。我们要使中国在经济上达到完全独立，则不独要努力争取被破坏的工业能够在三年五年内恢复，而且要有计划地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由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比重，使中国有相当强大的机器制造业，生产大量发展工矿交通业所需要的机器和车船；而且要达到中国自己的工业能够生产国防上需要的大炮、坦克以及飞机等。到了那时，才可以说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达到独立的地位，而且在国防上也具有足够力量来保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疆。只有工业发展起来，生产技术随着提高，生产成本日渐减低，能出产极大数量的成品，才有可能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自己和生活水平，才更能巩固工农间的联盟，真正发挥城市领导乡村的作用，才是替将来转向社会主义打下了强固的经济基础。

在恢复和发展工业，努力使中国达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首先使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获得迅速发展的一切条件。为此，我们必须把可能积累的资本，多多地投入国营企业里去。我们必须改造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官僚资本手里接收过来的企业，保存一切合理可用的东西，去掉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创立新的适用的东西，使企业管理、劳动组织等更加合理化。教育改造旧有技术干部，只要他们能改变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民主政府欢迎的。更为重要的，我们要从熟练工人，特别是青

年工人中有计划地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干部；没有大批的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优秀的可靠的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各种工程师、技师等，那就不要设想能够把中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在恢复和发展工业中，对于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人企业，应当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党的这个政策，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完全必要的。私人资本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不使它走出国民经济需要的轨道以外，但惧怕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加以不适当的限制，也是不对的。

由于战争迅速胜利发展，不仅使过去被敌人分割的解放区打成为一片，而且有了一批大的和大批中等的城市，还有大批城市很快就要解放。在这些城市中及其周围，集中有许多工商业和学校，各个城市之间，有铁路和航运联络着。这种形势，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农村移到城市的新方针。过去由于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盘据，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削弱封建（减租减息）直到消灭封建（分配土地）的斗争，组织军队，用农村来包围城市，然后去夺取城市的政策，事实上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存在过的只搞城市忽视农村的观点，事实上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现在新的形势提出了新时期的任务和工作重心。过去以农村为重心的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来领导乡村的新时期。我们向长江以南进军时，也会是先到城市，然后向农村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组织、领导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一道去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我们要把城市的文化教育工作恢复、改革和建立起来，使大批学校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培养大批有用的人才。城市工

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一切其他工作都应当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并为它而服务。如果我们进到城市，不去依靠工人阶级，不去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为其中心的工作，而去依靠贫民或其他阶级，忙于其他的比较不关重要的活动，那一定会要使全盘工作受损失。

我们说，工作重心现在应该由农村移到城市，应该抽调一定力量来加强城市工作，但如果因此而丢掉乡村，把乡村工作力量都移到城市里来，那也是错误的，也是必须防止和要反对的。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住在农村，他们中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是为着要发展工业，也必须使农村能够供给大量的原料，如棉花、大豆、花生、烟叶、麻等；须要农村供给城市大量的粮食。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数量上既然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这就说明在今天我们还要依靠农民大量生产粮食和原料。解放区农村的封建势力已被肃清或正在肃清中，农业生产力有发展的充分余地。我们要努力去领导农民提高农业技术，改良水利、种子、肥料等，来大大提高农产品的生产量。在农村中，要去组织大量的农民认为需要的生产的、消费的、供销的合作社。我们要大大提高农业产量，还因为我们要利用它来与外国交换为着恢复和发展工业必需的机器。此外，我们还要在农村中努力做提高农民文化的工作。上述这一连串在农村工作，须要获得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指导和帮助，须要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和努力，才有可能把它做得好。

如上所述，我们虽然接近于全国的胜利——这也还要不骄不躁地认真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完成——然而要使中国达到完全的独立自主，则还需我们极为重大而艰苦的努力。一切以为革命快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

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要知道建设比破坏要艰难多少倍。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只有这样，再努力十年到十五年，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是最终地巩固起来了，那时我们有可能和人民一道，过着更加充裕更加文明的生活。

我们的前面还有如此艰巨的任务，而旧社会交给我们的遗产又是如此贫乏与落后。虽然如此，我们绝不能因此发生任何的悲观。在具有如此勇敢、如此勤劳的四万万几千万人民力量的基础之上，有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领导，加上苏联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我们有根据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比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会要更为迅速的。

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线日益强大。苏联及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经济，都已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日益改善，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力量。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民主阵线则日益困难起来。战后称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虽在努力用造成新的战争恐怖的方法，争取尽量推迟其国内经济危机之到来，然而危机的征象已在出现。美国援助蒋介石在中国进行的反共战争遭受失败。中国革命胜利将要完全冲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锁链，东南亚几万万人在中国革命影响下，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美国在欧洲推行

的“马歇尔计划”，把西欧的经济引到了绝路，使受援助的国家对美国的附属性越来越大，因此也遭受各该国人民的越来越大的反对。美国本国因经济大危机的迫近，某些企业开始减缩，工人生活日趋降低，失业恐慌随着增长，人民民主力量也逐渐加强。最近，美英又在用“北大西洋公约”，将来还企图要有什么太平洋公约等办法，来加紧准备战争，加强美国对于受“惠”国的控制，以求逃脱危机。然而全世界人民连美国人民在内，是不愿战争到来的。只要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民主力量保持充分的警惕与努力，战争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即使帝国主义者真的挑动了战争，世界人民民主力量也有把握战胜并消灭帝国主义势力。这一切都说明今天的国际环境，是极有利于我们中国革命斗争的顺利发展的。一切过高地去估计帝国主义这个敌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全世界人民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二 加强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

中国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着自己很光荣的历史。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八年抗日战争、抗战以后的民主爱国运动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青年都曾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三十年来的近代革命史，证明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同志曾在一九二六年说：“在中国，青年问题现在是有头等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的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一切这些力量，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进展。”毛主席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

会上的讲演中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这些论断，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青年其所以能起这种作用的原因，也正如斯大林所分析：“我们应当知道，没有哪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是如此的深刻和迫切，也没有哪一个感觉需要与这压迫作斗争是如此尖锐和沉痛，如像中国的青年一样”。

我们现在接近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但要求我们作最后的努力；我们面前又放着建设新中国的极为严重的历史任务，没有全体人民的动员与努力，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动员人民力量的时候，必须着重动员青年的力量，充分发挥广大青年的积极作用。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当前总的工作方针，一方面使青年积极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军的最后进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各地；另一方面使广大青年积极努力参加各方面的建设工作，特别努力参加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高农业生产。为着加强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特在今年一月一日通过决议，建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群众的积极分子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中央发布这一决议，是经过很慎重的考虑的。为了取得建立青年团的经验，从一九四六年十月起，就已开始在各地试办，这些试办的经验，证明青年团的组织是必要的。我们相信，这一决议各地共产党的党委必定会坚决执行。

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更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抗日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青年救国会——包括几乎全体青年的那种青年组织，虽在抗日运动初期，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抗战后期就不能满足青年群众的需要

了。现在如果没有比较坚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那么就不易团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现青年的意志和行动，青年运动就势必陷于涣散无力的境地。

同时，在目前全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之下，也很迫切地要求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包括一切进步青年的积极分子的组织。这一组织的社会基础，应当比过去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为广泛。它虽应以工农青年及革命知识分子为主要基础，但又须能够团结全国各阶层中的进步青年，并把其中最好的分子吸收到团内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应当有系统地进行生动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使每个团员具有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这种规律而去奋斗。有这种觉悟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必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府在最后解决敌人，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的得力助手。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时，那么，那里的青年运动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是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及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

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自己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应该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必须深刻认识到加强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是党在目前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下的极重要工作之一。在加强对青年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整个青年一代，其工作阵地，显然不应当限于青年学生的狭小范围内，相反，是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开展工农劳动青年中的工作上，而且主要地是要依靠工农劳动青年群众。在已经掌握了大城市的今天，正当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现时，需要特别加强青年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并要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学徒中发展团员，要求每个重大企业或每条铁路上，每个矿山中，都有青年团的组织，使青年团组织中青年工人成分的比重增加。在不放松农村青年工作的原则下，把青年工作的主要阵地放到城市各企业的青工工作中去。

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青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作为遵守劳动纪律、节省生产原料的模范者。在学习技术和手艺中，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要能起先锋带头作用。青年工人团员应成为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工厂中的青年团，除接受党的支部领导之外，必须和职工会保持正确关系。在组织上，青年团和职工会都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但是青年团在青年工人中应进行工作，使青年工人自觉自动地遵守和响应各公营企业工厂或职工会的各项规定和号召；而职工会在确定有关青年工作的问题时，应当征询和尊重青年团的意见。同级职工会的青工部部长或副部长，最好是由青年团的工

作人员来担任。

在农村中，青年团应当继续有重点地去发展团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中农中的优秀青年入团。新富农及农村知识分子中的进步觉悟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入团。但必须保障团的领导成分主要是放在雇农、贫农出身的青年身上。在实行过土地改革地区的农村青年团员，应成为增加农业（包括副业）生产的积极分子，领导广大青年农民与成年农民一道变工合作，进行深耕细作，改良水利，多种粮食，多产棉花和其他为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农产品，并且积极参加农村中的合作社运动。在新解放区，则应按照共产党新区工作的方针进行青年工作，准备由减租进到分配土地，同时要使生产低落。

在军队中建团是一个极重要的工作，其方针与步骤，可按照朱⁽²⁾总司令在开幕时的致词中所指示的执行。

中国学生运动有很光荣的历史传统。学生青年容易接收进步思想，他们又有知识，希望他们在学习中注意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有用人才，因此今后还要加强学生中的工作。在各大学、中学和专门学校中，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建立团的组织，开展团的工作。学生中的青年团员，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特别努力学习于建设新社会有益的科学，同时应该积极参加学生会的各种工作，依靠自己优良的学业和模范的实际行动，去取得同学们的信任，使学校中团的组织真正成为团聚优秀学生，而且为一般学生所拥护的组织。

为着发展工业和农业，政府将要开办大批培养工业和农业以及医药卫生方面的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城市和农村中的青年团，有任务要供给大批优秀团员和青年工人、农民及革命学生

知识分子，进到这些学校和训练班里学习，以便训练出大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人才——工业、农业的专门家、工程师、技师及能管理工厂、农场的干部等。

青年团要在各种不同职业、不同工作部门的青年群众中进行工作，其总的目标，在于团结和教育青年一代，在于领导青年学习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各种理论与实际。因此，学习问题是所有一切不同职业、不同部门的青年团的共同的中心活动。学习的含义有两方面：一方面，学习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种具体工作上的实际运用。这就是说，学习要和本身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工厂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厂中的熟练的模范工人；在农村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农村中的有知识的模范农民；在部队中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文化的模范战士或战斗英雄；在学校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学校中有思想的模范学生；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青年团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本工作岗位上的模范工作者。总结起来说，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青年团的工作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偏向的。为着今后青年团工作及青年运动能够顺利地发展，对于青年运动中几个历史上

的偏向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恰当的看法，以免许多同志不能勇敢放手地去建立青年团的组织，而障碍青年运动的发展。对于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和青年救国会时期的青年工作，应当估计为在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成绩的。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从一九二〇年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负责编辑的《中国青年》周刊，在中国学生知识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在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即现在的青年党）作思想斗争中起过重大作用。在各种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和北伐战争中，以及在广东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中，青年团员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但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的偏向。后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这种偏向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之下曾有过某种程度上的发展。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中，青年团在分配土地、查田运动、建立政权、组织少年先锋队 and 儿童团、动员青年参军、发展教育，以及在军队中，仍然是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战以后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在坚持敌后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上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及各解放区青年救国会的活动，大量青年学生、青年工人的下乡工作，也都是轰轰烈烈地发展着，有过优良的成绩。以后有些地方的青年组

织，因不善于使青年运动与整个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相结合，过分地强调了青年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一种单独去搞青年自己一套的闹独立性的偏向，这是错误的，但是这种偏向为时不久就受到了纠正。

这就是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时代（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和青年救国会时代（抗日时期）大略的实际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或是抗日时期的青年组织，都是做了很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如果不估计到这点，那是不对的。我们承认在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及青年救国会时期的青年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先锋主义”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我们吸取这些教训，并防止在今后的青年运动中重犯这类错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且片面地夸大过去青年运动中产生过的错误偏向，因而否定过去青年运动的重大成就，那就必然会做出不合乎历史事实的错误结论，且将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再没有建立任何青年团的必要了，似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没有什么好处。这类思想如不加以澄清，则将成为创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重大障碍。

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教育、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分子，并提高一部分较为落后的分子，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参加解放军和支援战争，参加工业、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力量。目前的重要问题，根本不是惧怕青年先锋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问题，因为青年团还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手一些，让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大胆地去进行建团的工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多加以指导和帮助。在现在中国共产党有着这样强大而普遍的

组织，有着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自己的领袖；而青年运动本身也有了丰富的经验，有了犯“先锋主义”、“闹独立性”（应称为青年主义倾向更为恰当，以免与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独立性相混淆）偏向的历史教训，应当是比较不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的。自然，对这些历史上的错误偏向，应当时常警惕，当它出现的时候，则须适当地加以纠正，使青年运动走向正确的轨道。但绝不应当因为怕重复错误，就连青年团的组织也不去建立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要犯错误。同时，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先锋主义是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去代替党的领导，这种偏向我们应当反对。对于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的偏向（青年主义偏向），也应加以清楚的区别。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组织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我们必需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建立对于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青年运动按照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需要正确地迅速地前进。

当此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快要在全中国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建立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这件事是十分的关心和重视，全中国的青年们也都在集中注视这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的经过与结果。我们相信在这次大会以后，全国青年运动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青年积极性也会因此而更为提高，使我们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斗争，特别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长期建设事业中，会获得从青年方面所来的更大力量的帮助。这是中国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成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在任弼时的报告中，此处还有如下一段话：“除开这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于不再参加反动军队来进攻解放军，保持中立，或则站在解放军方面来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可以保持其军队到一定时期再按民主原则来改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消灭最反动的军队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指的是绥远方式，由于当时对绥远方式的政策还不宜公开，因此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这段话未公布。

（2）指朱德。

毛泽东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 应注意的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三日)

恩来同志：

(一)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他们提出任何异议，不论是内容上的或文字上的，均不要允许修改，只把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以便考虑。

(二) 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¹⁾，不要张群)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

(三) 吴铁城到南京，蒋⁽²⁾党对谈判的控制加紧，他们派回南京传达要点的代表，对于向死硬派保守机密一点，必须充分注意。

(四)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³⁾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

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⁴⁾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此点请十分注意。

（五）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但请他们保守秘密，不得下达。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早

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⁵⁾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

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 一 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各送还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 二 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 《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 三 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 四 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

(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

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至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 五 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

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 六 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 七 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

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 八 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条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才，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条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

管，准备交代。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

南京国民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 日于北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
- (2) 指蒋介石。
- (3) 指何应钦、白崇禧。
- (4) 指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 (5) 这个最后修正案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由中共代表团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

军委关于立脚点应放在谈判 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给总前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¹⁾：

(一) 总前委删辰电⁽²⁾悉。

(二) 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 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酉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 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五) 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酉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军 委
十六日八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2）指总前委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辰时给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谭震林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意见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四月二十日行动，对江北岸和江中敌据点，凡能一夜夺取者，则一夜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用二三天时间夺取。今后军事行动，以在开动后能持续进行为更有利。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周 恩 来

各位朋友：

今天特别请诸位来此聚会。我们虽然来了二十多天，但因为忙，未及分头拜访和请教，很感不安。昨天我们请了住在北京、六国二饭店的朋友来谈，今天又请了各大学的教授及外面的朋友，向大家请教。

要谈的问题很多，今天只能把最近的和平谈判问题向诸位报告一下。这样的报告，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我相信是与以前不同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在一九四六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像陈嘉庚、张翼若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广大人民还不了解蒋介石的和平骗局。今天情况变了。今天可以说，如果诸位赞成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的话，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这个变化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人民解

* 这是周恩来对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的报告。

放军奋战的结果。关于民主运动，诸位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今天只把军事的胜利说一下。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他当时在武装力量上的确占着优势。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二百四十八个旅。这些都是在抗战中未受损失的，因为他实行的是消极抗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开始，他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中，却完全变了。头两年，战争平稳发展，我们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万人，第三年起就起了突变，七个月（截至今年一月）就消灭敌军二百多万人。造成这个突变的是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现在蒋介石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如学校、后勤等在内，只有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则只有一百多万人，其中不少是受过歼灭而又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更弱。所以，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个战争是失败了，他的反革命企图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则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

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三评运动中，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推荐下级指挥员，推荐得对的就批准，而且多数是批准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士兵们很了解，指挥员必须是能勇敢作战的，并且必须有智慧，单单勇敢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态度。所以士兵们的推荐多数是对的。这是评干部。其次是评党员。公开党员，让群众来批评党员，使党真正受群众监督。第三是评战功。谁有功，群众知道得最清楚，群众来评，自然可以评得最确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民主扩大了，纪律加强了，指挥员们说现在的部队可好带了，士兵们说指挥员的态度变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淮海战役中，敌人的工事星罗棋布，但一夜之后，情形变了，我们的工事包围了他们的工事。士兵们设法钻过敌人的工事，破坏它，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事。打仗还要靠炸药，但这些物质的死的东西要靠活人来使用。没有士兵的勇敢和智慧，炸药也就没有用处。我们的士兵又勇敢又有智慧，没有炸不了的堡垒。即便是水泥工事做得好，一斤炸药不行，就用五斤、十斤、一百斤、二百斤，终归可以炸毁的。矿山石头都可以炸开，何况工事？敌人称这为“土飞机”。这种“土飞机”需要靠下面，单靠上面是不行的。王耀武曾问我们，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他们那里就打败仗，毛主席天

天坐在陕北，却处处打胜仗？这是因为人民觉悟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所以，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失败了。

这样一来，南京反动政府在一月一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议。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让李宗仁代替他，这就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派私人代表团来平，最后我们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场上敌我的伤亡和人民群众的损失都很大。例如淮海战场上几百个村落全都毁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救济。这样的损伤自然是以就此终止为最好。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我们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也看到了敌人的分化。我们要争取主和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美国帮助蒋介石打了三年内战，现在也承认失败了，所以他要制造某种和平局面，派代理人钻进人民国家内部来活动。这也助长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意愿。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大肆搜刮，刮得上海资产

阶级也受不住了，他们要求和平。除此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公教人员也是一个和平因素，金圆券实在弄得他们活不下去了。由于以上的各种因素，才有这次和平谈判。在谈了十多天后，我们已经将一个最后的和平方案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他们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接收。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南京代表团说，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争论是兄弟之争，我们给了他们严正的批评。这不能叫做兄弟之争。难道孙中山与袁世凯之争是兄弟之争吗？不，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近二十年来与国民党之争也是如此。不过，南京代表团和我们之间在为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础上的争论，还可以算是兄弟之争。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决不能混淆是非。我们之所以坚持要用人民解放军去接收，因为这是关系革命到底不到底的问题。辛亥革命后，督军等等还是一概仍旧，只是换了一面旗。大革命时，北伐军到长江下游后，连国民党都说，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样，革命就变了质。张治中说起“前车之鉴”，那么，这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今天也是只换一面旗，让各色反动派依然压迫人民，照样滥发金圆券，则人民的痛苦如故，人民就要骂我们。这不是对人民负责

的做法。不推翻旧的，就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人民解放军不去，政权的性质就不能变更，反动军队就不能改编，生产就搞不起来。但接收也不简单，需要时间和人才，我们要有组织地接收。接收将是先城市而后乡村。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人士大家来做。等到渡了江，北京、六国二饭店恐怕不免就要“人去楼空”。我们兢兢业业，怕搞不好，但我们不能放弃责任。将来在联合政府中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有些地方一时还接收不了。苏、浙、皖、鄂、陕、陇东将最先接收，其他地方只好缓一下。南京代表团总希望我们慢一点渡江。当我把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他们时，他们问我有没有渡江的条款，我说没有，他们顿觉惊喜交集。但我说，虽没有“渡江”，却有“接收”。其实，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条件，许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何况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南京和溪口还没有完全割断，即所谓“藕断丝连”。他们说要等我们去割，我们则要他们先从政治上割断，军事上可以由我们来割。南京代表团不能反对我们过江，因为既然承认我们去接收，当然就必须承认我们渡江。但他们总希望慢一点。至于广州、溪口则希望划江而治。我们指明，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他们获得喘息机会。这一点，南京代表团无法反驳。

关于改编，即改编军队。不如此就不能根绝内战因素。但又不能急躁，条件要宽大。我们的改编条件，甚至比南京代表团所提出的还要宽大。例如，他们曾主张裁兵复员，我们则主张一律集中整训。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尤其强调。初看起来，这好像是违背民意，所以对这一点就不能不多加解释。国民党军队二百多万人，一听到裁兵，就会发生动摇，各作打算，于是不免要造成骚乱，到处危害人民。我们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

态度。所以我们提出在第一阶段中，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并且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每人每日四斤半小米）。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我们不会像从前国民党对待八路军那样，对他们有所歧视。这样，应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之处了。如果还要闹，就严正制止。经过集中整训，士兵有了觉悟，军官得到学习，就可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我们不能急躁，集中后要分别对待，等待觉悟。觉悟有快有慢，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会转变过来的。当然，也会有捣乱的。

有了政权的接收和军队的改编，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四、八两条。

关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南京代表团争得厉害。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未将战犯名单列上去，“元凶”、“首恶”等字眼也都勾去，而且说，“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有人问，对蒋介石怎么办？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

关于二、三两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没有多大争论。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的。

关于五、六两条，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我们对没收官僚资本作了解释，即没收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取得的官僚资本，凡是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就不没收了。若有私人股份，经查明并非官僚资本转移的，一律承认。不如此，就会牵涉太广，影响生产的进行。

关于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谨

慎的。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也正在失败。美帝国主义固然还是强大的，但他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与美帝也交过手，文仗武仗都打过。文仗和马歇尔打了一年，最后他还是失败而去。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些，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除，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虽然当时只有五十多个人，其中李大钊同志英勇壮烈，血洒北平。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一切腐朽的东西，尽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

节地去处理问题。这和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处，那时反对封建很坚决，提出打倒孔夫子、对封建家庭斗争的口号。但今天看来，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引用。我们的父母来了，也还得照顾照顾。对封建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对帝国主义也要如此。

在军事上，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的。我们叫他们退出去，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军若不退出，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美国若是大规模出兵，我们也不怕。中国是吓不倒的。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美军若真敢侵略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大城市，我们就用乡村包围城市，叫他们什么军需品（包括大便纸和冰淇淋）都必须从美国运来，还要背上大城市这样的包袱，负责供养。美国人生活程度高，他们是不愿打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也闹过出兵干涉，结果还不是“自动撤退”？就因为吃不了苦。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难道还怕美国兵？

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不过我们不挑衅。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以总领事的资格递来一封信，我们就退回去，说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后来他用铁路职员的名义写信来，我们就让他登记。其实，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

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帝国主义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但此中问题很复杂，不能遽然解决。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

关于第八条，再补充一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允许南京政府还存在一个时期。起先我们想用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它，南京代表团觉得不好，我们取消了这个主张，而使二者平列。若南京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并且履行了，则我们保证负责向政协筹备会提出让他们参加新政协。当然，通得过与否，那是另一问题。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南京代表团以为我们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点。第一，他

们见我们快要当家了，以为我们很怕破坏，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面对滔滔长江，他们以为我们一定很怕牺牲。所以，他们老是讲价钱。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坏，战争也不见得就把一切都打碎，总有打不碎的，或者我们去得快些，他们来不及破坏。我们不过是争取愈少破坏愈好罢了。所以，这是吓不了人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劳动几年之后，也可以变为农民。过去因为环境不同，我们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统一的环境，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干。非共产党人也照样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我们长期在农村，对城市已经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朱 德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

*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

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浦口的国民党军，于二十二日撤至南京，二十三日一同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乱窜。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飭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员等同叩梗酉。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 少 奇

我来到天津，听一些同志谈了谈天津的情况，还没有谈完，也到有的地方看了一下。总起来讲，你们对天津了解的比我多一些，不过，并不是很够了，依我看还是不够，还须继续了解。

天津有很多困难问题。同志们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怎么办？我的办法也很少，还是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我今天不能提出肯定的意见。今天谈的话，只当作一种引言，好像作文章的引言一样，把大家的意见引出，叫大家注意一些问题，以便最后解决。我今天讲话的性质先确定是引言性的。

天津接收工作已好几个月了，早已结束了。同志们很辛苦，一般都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毛病虽有，但不很多。中央对同志们的接收工作是满意的。接收工作早就过去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谓管好，就是要把天津可能与必须改造的加以改造，并加以发展。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

* 这是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天津进步了，管好了，改造好了，以后就更容易管了。现在接收好了，但没有管好，还没有加以改造。至于发展还是将来的任务。

管好天津、改造天津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就是必须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注意是“劳动群众”，如手工业劳动群众等，而不是“贫民”），争取知识分子（注意“依靠”、“团结”、“争取”，这些文字要看清楚），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注意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并且尽可能多的那些民族资本家，“自由”是加了形容了，“争取”呢？就是要多多地争取可能和我们合作的这些人），站在我们方面，不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不是站在国民党方面，不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不跑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方面去。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干什么？就是要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以便一步步地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也是管好天津市工作的总路线。

我们办党要编队伍，进行革命也要编队伍。革命队伍是什么人组成的？就是依靠工人，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我们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

阵线。

我们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扩大我们的队伍，即在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事业。天津工作的任务是管理、改造、发展天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执行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上面说的两点上发生了模糊，发生了动摇，发生了错误，就是对总路线的模糊、动摇、错误。

在这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所以今天天津市的资本家，不但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象，相反是团结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

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如果当成斗争对象，也是犯错误，同样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不是什么小错误。

那么对于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是否要进行斗争？共产党、工人、其他劳动人民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没有斗争的，特别是过去资本家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工人是恨他们的。解放后，工人要求斗争他们出出气，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些斗争，适当进行一些也好。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我们是矛盾的，在政治思想上跟我们是否有矛盾有斗争呢？也是有的。在适当时候，在可能的情形下，与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斗争不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只联合不斗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斗争不联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那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今天把重点放在联合上，将来重点是否会变更呢？那也是可能的。重点是联合，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前几天我和东亚毛织厂经理宋棐卿先生说，再过多少年，你办了八个厂，而大势所趋走入了社会主义，那时跟你商量，再给你八个厂，共十六个厂交你办，你能管理工厂，薪水给你增加，你干不干？他说，要能那样，哪有不干的！

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是又斗争又联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但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在什么地方联合？我想主要是在经济上联合，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我们帮助他，共同买原料，共同推销。工人同资本家在劳资问题上总会有很多斗争的，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会有更多的争论。所以，在哪些方面跟他有更多的合作，哪些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少些。要弄清楚。

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天津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了！如果这点不指出来，就会使他们犯错误。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问题也有加以解释的必要。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这就打错了，同时又有的把敌人放过了。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打了，犯错误了。

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你们解放天津，一次战役三十一小时，就把拿枪的敌人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则三十一天，甚至三十一

年也不一定能消灭完。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天津人口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要团结起来，敌人很少。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如何做呢？毛泽东主席要我们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意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他们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这些人听了觉得很合胃口，说：“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毛主席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是毛主席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照顾的四面八方的关系，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关系。照顾到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所以也叫做全面关系，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毛主席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毛主席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产业界的

地位摆在哪里呢？”他们说，我们的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并且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主席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上海商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说在报纸上宣传资本家别超过宣传工人，没有说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宣传。所以在宣传上要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但也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

今后天津市的工作如何做？要看你们自己的思想认识够不够。我们同志的认识是有一些毛病的。为了今后把天津管好，把关系搞好，使生产得到发展，我们要进行以下工作：

一、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这一工作天津做不好，整个华北也是做不好的。前些日子，上海的船到了天津，老百姓认为对外贸易要开始了，街谈巷议，眉开眼笑，而我们好多外地来的干部，对这个问题多不了解。

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凡不必需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为了把进出口管好，国家要管制对外贸易，对它加以统制。过去因受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统制，今天必须统制。不这样，帝国主义势力仍旧会侵入。但今天管制应放宽些，不要统制太严，统制死了，不要因统制而妨害正当进出口贸易。海关的税收率应配合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应妨害它发展，所以要由国家管制。国家与私人的出口都算作输出。允许

私人出口进口东西，国家统销的出口货，有些也可以公私合办，但统销的名义不取消。不需要进口的，中国能制造的东西，不许进口。不应进口的进口了，就妨害我们的生产。天津有的资本家讲，有二十几种货物不应进口的却进口了，这样一来有很多家工厂就得关门，这就妨碍了天津的生产。

对外贸易的管理、统制、税收、海关等工作，都应加以改善。应当由工会、公安局等设立海员俱乐部，招待中外海员工人，照顾他们，跟他们谈话，卖给他们东西（如卖给他们手工业品不是很好吗？还可赚钱），送他们上船。曾经有一个海员给我们写信，说他买不到东西，很不满意。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但外国的海员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应当加以好好招待。把外国工人看成帝国主义分子，又把阵线搞乱了。

我们的人能够组织对外贸易、了解对外贸易的太少了。搞进出口贸易，可以组织对外贸委员会，要吸收资本家参加，他们比我们熟悉。对外贸易应公私兼顾，如进口的原料，公私双方都买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和资本家商量，和国营工厂、私营工厂商量，共同把对外贸易搞好。外汇也要管好。有一个人对我说：“外汇牌价太低妨害出口。”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多商量，多研究，我们自己不懂，又不研究，那是搞不好的。特别是那些资本家的话不可不听，当然也不可尽听。

二、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又要与资本家商人合作。今天正好乡村区党委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回去要把城乡关系搞好。听说有的乡间贸易公司，看见去了商人，便当成敌人，把他挤走。我们贸易公司不能把他们看成敌

人。天津有一个外国人经营的蛋厂停产了，我们外事处的同志和他们商量，要他们开工。他们说：“我们正想开工，但你们得供给一百五十万个鸡蛋。”我们的贸易公司无法供给，外事处要他们自己下乡去收购。但是他们一到乡下，就有人说：“帝国主义分子来了，赶走他。”结果蛋厂开不了，工人被遣散，这是一笔大损失。如果这个厂子开了，工人可以做工，农民可以卖蛋，税收也可以增加，这是一笔好生意。

税收也有问题。听说到乡下买棉花抽税，运进城又抽税，卖出又抽税，制成纱又抽税，由棉变成布，中间不知要抽多少税。还说：“反正公家抽的是公家的税，多抽点不要紧。”像这样又怎么能货畅其流，发展生产呢？当然有些税是必须抽的，但不应过多。

贸易公司、商人、工厂应合作，天津应组织农产品收购委员会，运输、价钱、税收等问题应共同商量。对中小商人要给些利益。农民到天津来卖东西，也常有走不进来的，抽税也很多。

为了做生意，邮政电讯应畅通。现在我们跟上海电讯能通，而与我们解放区的城市石家庄、沈阳、张家口反而不通电话。其实这是很容易通话的。电讯通了，对公私商人做买卖都方便。

还应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各机关买东西也可组织机关合作社统一供给。推销城市工业品也可组织百货商场、推销所等，公私商品都可以在这里推销。

为了把城乡关系搞好，需要我们政府的贸易公司领导，跟资本家商量，共同努力，使华北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样就活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从而刺激了生产，东西也多起来了。

城乡关系问题，城乡干部都应好好讨论。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乡村都有利，对外贸易也能做好，不致于海外来船后，空船回去。特别像猪鬃、皮毛、骨头、鸡毛等，都是农村出产的，这些东西能出口，对人民利益很大，对农村发展副业利益很大。

沟通城乡关系，问题很多，如资本问题、收集问题等，都要想想。

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过去不找资本家，这种态度是不妥的。要与资本家商量，哪些事公家可以办，哪些私人可以办；商量如何做生意，如何向他们订货，供给原料等，这样公私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工业生产不比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比较单纯，工业生产则很复杂，很多方面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好好地生产。成品推销市场，原料来源供给，要跟私人工厂商量，必须公私兼顾。如棉花，他们缺少，也应分一点给他们。在市场上，私人销一点，公家也销一点。价格也应彼此商量一下。所以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两利的方法。原料、市场适当分配，不要使一方独占，价格不要各自任意提高或降低，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使公营工厂和私营工厂配合发展。但有些调皮的资本家，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列宁说，有文明的资本家和野蛮的资本家，我们要打击野蛮的资本家。只要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主动跟他们合作。山东临清贸易局用故意跌价的办法，打击外地来做生意的资本家，企图独占市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

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要跟他们竞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们合作。

所以公私兼顾必须贯彻，贯彻到买棉花中去，贯彻到买花生中去……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当然合作的条件是要加以缜密考虑的，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不要使私人没有利益了。

四、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天津解放后，工人向厂方提出了许多要求，资方已答应了，但有的要求增加工资过高，资本家担负不起，或只能临时担负，长久不了。同时因工人待遇过高，使工业品价格提高，农民吃亏。

有一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如强迫资本家雇工人，或把临时工都改为长期工等。有些是应该改可能改的，有些是不可能改的，如不应改为长期工、不可能改为长期工的，硬要改为长期工。这些要求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另外工厂工人有些行动是不合理的，如不遵守厂规，不听管理人员指挥，上下班随便，破坏劳动纪律，资方又不敢管。还有工人在生产时间开会，搞许多游艺节目，耽误生产，这些行动都对生产不利，所以说是合理的。

这些要求在工人方面是有其原因的，不能单纯责备工人。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随意解雇工人，有很多不合理的措施。那时是资方一利而不是劳资两利。这就是今天工人产生劳方一利的历史原因，但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做是不好的。目前工人中间，劳资中间，这一偏向如果不迅速加以批评纠正，就会成为系统的错误，陷入“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过去犯过很多这类错误，今天又产生了，应该很快纠正。批评时态度要好，要进行说服教育。但一定要肯定这是不对的，不仅对工人不利，对农民也不利。现在已经产生了

“左”倾偏向，如继续发展下去就更有害了：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所以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应该规定一个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由军管会规定并宣布执行。

(一) 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职员解放前的生活水准，不得降低（有些工厂虽然说是原职原薪但实际上降低了）。有特殊困难必须降低生活水准的，也一定要经过工会与工人同意。

(二) 目前是军事时期，经济困难，提高工人生活水准暂时还不可能，但将来一定能提高，共产党也一定帮助提高。今天不可能提高，有的还要暂时忍耐痛苦，应向工人说明，请他们原谅。将来按照生产发展情况可以逐渐提高。目前一部分工厂，由于过去工资太低，现在可以也可能调整的，可作适当调整。但这也不是没有限制的，现在有增加好几次的，使资本家惶恐不安。所以现在应该规定增加工资的最高额，是不是最高不得超过实际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最低是不增加。实际工资包括伙食住房等。至于规定最低工资，劳大决议曾有过规定，但我们中国还不曾实行过，是否行得通还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不规定，只维持原来工资不动，太低的有可能增加时才增加。今天如果把工资规定得过高，很多工人会失业。如有特殊困难须增加，由总工会提出政府批准也可以增加。

(三) 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如有确实困难不能复工或不得不停业、停工、裁减工人时，必须经政府批准。

(四) 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产的需要，可以雇佣或辞退工人，但一切都必须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在雇佣或辞退工人时，必须依照生产需要的最高原则。如为政治上的理由开除工人，

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工会不得强迫厂方雇请或辞退工人。资本家的雇辞工人权是他的生死问题，但这也是工人的生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劳资双方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在斗争。如何使这矛盾缓和一下，工会应注意此事。要把失了业的熟练工人、技术工人、老工人、正式工人进行登记，并由政府劳动局设立职业介绍所，规定雇请工人时只准到职业介绍所去雇请。还可商讨由政府拿一笔款，资本家拿一笔款，作为失业救济基金，以便对个别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加以救济。这虽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可以办的。

（五）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服从指挥。对旧厂规，经资本家修改，工人讨论，工会同意，政府批准实行后，大家就得遵守。工人不得不听指挥。

（六）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准占用工作时间。而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

（七）每个工厂需要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生活费用由工会负担。工会经费今后应独立起来，要造预算，政府充分供给，使工会有钱进行各种活动。脱离生产的工会工作人员的薪金，照原来工厂薪金发给。

将来工会应筹备自己的经费，工人交纳会费（占薪金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时可以不要政府津贴了。现在这项预算不要轻易改，必须予以保障。私营工厂工会的经费也由政府给。

（八）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

决。要分析是不是正当的要求，哪些可能办到，哪些不可能办到，正当的可能办到的要求，代表工人去交涉，否则说服工人不要提出。困难就在于分清何为正当不正当，何为可能不可能。

这样由总工会来解决，才能增强工会的威信，工会的作用也会提高，否则工会就没有威信，即使有也是官办的威信了。党、军代表等各方都要大力培养工会的威信。有些厂长、军代表、贸易机关负责人，怕工会威信高，说：“工会威信高了，我就不好做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工厂工会威信越高，厂长越好当，工厂工作更好做，党才有发展，工厂行政才有推进。反之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工会是桥梁，没有它，政府与工人就建立不起联系。如果劳资双方纠纷不能商量解决，则由劳动局解决，工会可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资本家也可以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由政府劳动局调解和仲裁。天津资本家对于这类问题正呼吁无门，我们可以开这样一个门。

我想关于劳资问题，军管会颁布一些规定是必要的。

宣布这个规定，工资过高的工厂的工人可能会不太高兴。所以今后我们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正像黄敬市长讲的：“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现在工人在政治上是翻身了，但在经济上整个来讲，工人今天还不可能翻身，生活稍微改善一下是可能的，很大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经济上获得大的收获是不容易的，因为今天的工人还没有获得更大的解放，还受资本家剥削，不到社会主义是不能在经济上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的。就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还要艰苦奋斗一个时期，生活才能有较大的改善。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有些老实的资本家想多办一些工厂，但怕剥削得多，罪恶大。如启新洋灰厂经理说：我办了第三个厂，就不想办第四个厂，怕第四个厂子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有些资本家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为利益分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看过，越看越害怕。

我问他们，你说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都是剥削；分红分得多也好，分得少也好，还不是把剥削来的钱揣在腰包里？

有的资本家说：“生产发展后股息就大了。”他们提议要限制股息，主张过多的股息归国家。我想这恐怕是资本家在试探我们，看我们准不准许他们赚钱。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资本主义在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生气。马克思在一百年

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资产阶级后来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就腐化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我们也要限制它，不能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烧掉成品，或把产品扔在海里。我对资本家说：“你们又不丢，又不烧，那只好走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的，不然就会生产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地准备走上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慢慢准备，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

今天工人阶级还得受资本家剥削。那么农民呢？农民翻身可以消灭封建制度，分得土地，但工人还不能得到工厂。工人翻身与农民翻身不同，如照农民那样翻法，就翻坏了。工人翻身这口号是不能空洞宣传的，容易与农民翻身连在一起，如不加以区分，那就坏了。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个利润分配问题，今后可以加税，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又变为国家财产，国家又“剥削”了资本家，很好呵！

关于劳资问题，要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对于工人过高的要求，要进行说服教育，说服不了，要报告上级，由市长去说服。我们共产党必须向工人郑重表明态度，说明利害，不然到工厂关了门，工人失业吃了亏，他们该说了：“你们为什么不早讲！”所以应该早讲。

除劳资政策以外，还要告诉工人注意提高生产，否则改善工人生活是不可能的。工厂负责人必须将工厂业务向工会与工人作报告，不外是原料、制造、销售三件事，缺一不可。进行

生产，必须有原料，原料要好一点，便宜一点，生产时还要节省一点。产品质量要好，产量要高，原料、机器要节省。销售就需要有市场。原料、制造、销售这一过程，都应使工人了解，要计划原料，保证制造，并能销售。要把这些情况经常告诉工人，和工人特别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量。公营工厂这样做，同时也要说服资本家老实地向工人作报告。没有原料与销售计划，只有制造计划，不算完全的生产计划。必须把全副工作计划向工人报告，把有利条件和困难在哪里，都告诉工人，困难由大家克服，如军队一样，只有把情况说明，才能打胜仗。这样才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生产才能搞好。在厂内实行生产民主，有利于发挥工人的积极性。

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但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倒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

国营企业中现在在搞民主改革，工厂中有些冗员要裁减，有些机构不合理要改造。工厂也要实行精兵简政，特别是上层机构庞大，应该减缩。要团结职员工人，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雇佣劳动者，是脑力劳动，工人大多是体力劳动。一般职员应包括在工人阶级以内（他们不同于经理等压迫工人的职员）。鼓动工人来反对职员原则上是不对的。过去职员对工人不好，是由于国民党利用职员控制工人，制造裂痕。今天我们要消灭职员工人间的裂痕，方法是向职员讲明白，让有错误的职员进行自我批评，认错道歉，使工人谅解他们过去的错误，一般的既往不咎，有大问题的要宽大处理，但这些事要快些处理。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职员如认为让工人批评了就不能再管工人了，这是不对的。这问题明

天再讲，今天不多讲了。

公营工厂中的职员工人关系问题和私营工厂中的劳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很快解决，解决以后，还应把经济机构组织好。

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为了搞好这些关系，首先公家与公家的关系要搞好。现在不只是公营私营彼此不相往来，就是公营各部门也有这种情况，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互相封锁，上面只看到有人来要东西，而没有人来报告我这里有什么东西，这样如何能把经济组织起来。工业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把各自管理的企业、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国，是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今后必须规定各企业、部门的请示报告制度，不准打埋伏。军管会也要严格一些，不但要管资本家，而且要管共产党员。今后还得实行类似派经济专员的制度，经济专员可以代表中央调动一切。公家与公家配合好，再与对外贸易配合好，再与乡村配合好，再与私人资本家配合好，这样四面八方就照顾到了。军管会不仅是管理军事管理政治的，而且是管理经济的，军管会在这方面要负起责来，要召集经济会议，各经济组织的代表要互相报告情况，互相了解情况，互通有无。可以组织经济委员会，还可以与资本家商人在一起组织进出口贸易委员会、原料采购委员会等，研究政策，统一领导。这些机构、组织，我还未想好，为了发展生产，管好天津，这些工作是要做的。

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依靠群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把我们的队伍组织好。工人阶级是不是可靠呢？一般讲是可靠的。马克思讲，共产党唯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实现

革命的领导权，唯一的依靠是工人阶级。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不去教育工人，不向工人进行说服工作，那么工人就可能不撑你的腰。为了使工人阶级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力量，我们必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工人阶级有了认识，有了觉悟，就有了力量，工会有了威信，我们党又掌握了工会的领导，工人阶级就可靠了。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工人阶级离开党很久了，国民党在其中有一定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工人工作进行得不好，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切实进行组织工作。除开工人阶级以外，在学生、小资产阶级、农民独立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中，我们都要进行组织工作。这是管好天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组织各委员会，发展生产。所以目前天津的工作，工人群众工作是一环，经济管理工作是一环。今天工厂里党的力量不太多，不要把大力量放在党务工作方面去。要把最好的足够的干部放在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会工作的机关。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 朱 德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 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

*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起草的。

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

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解放后的 外交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总前委，刘邓张李，粟谭张⁽¹⁾：

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问题，特作如下指示：

(一) 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进行登记。

(二) 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发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贻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绝不承认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三) 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其使用一个至两个汽车。

(四) 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 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 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出外。

(七) 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 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²⁾、刘晓南下。

中 央
卯 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张震。

(2) 即饶漱石。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的批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

(一) 卯江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中央同意，望即发布。

(二) 根据平、津经验，军管会能很好地接收城市及工厂和资财，但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和工厂。故军管会在接收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的机关管理和经营。例如将市政工业及其他若干工商业交市政府管理经营，其他工商业则组织若干公司来负责经营，否则很难开工营业，即使勉强开工，亦难长期维持。

(三) 根据平、津经验，新解放的城市照旧收税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但旧的收税人员，因在群众中种下很大的恶感，群众不信任。故由旧人员去收税，普遍遭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后来委任我军人员任税收局长，并由我军人员带领旧人员去收税，发给我人民政府税收局的收条，人民才踊跃交税。这一经验，望记取。

(四) 城市解放后，许多房客不交房租，房东亦不敢收房租，因此人心长期不安。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对此不应缄默，长期不表示态度，应正式宣布除官僚资本之房屋应予没收外，

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房客应继续交纳房租，租金多少应由房客与房东议定。有纠纷者应由政府或人民法院调解仲裁解决之。

(五) 城市解放后，常有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有些工人、店员，在老板恐慌情绪下，分了店铺和作坊。我们有些区委和支部，亦任意处理劳资纠纷。因此，在城市中常造成若干劳资斗争中的无政府状态，破坏我们的政策。故在城市解放后，应重新发表新华社的“二七”社论及其他若干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并须规定每个城市的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须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军管会及党的市委则须派得力人去指导总工会及劳动局的工作，使其能有效率地解决一切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要求问题。同时并须告诫各支部和区委及其他机关，不要不经请示任意处理劳资问题。

(六) 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大多有大批冗员及官僚制度，例如工厂中的警卫科、厂警等，工人、职员十分不满，要求迅速改革。而这些人员和机构，也可以迅速改革。故在确定工厂管理关系后，应即发动工人迅速改革这些制度，以利生产。

中 央
卯 有

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 草案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中央：

下列指示草案请审查修改，以便下达。

华 东 局

卯江

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我军渡江南进，江南各城市即将解放，特根据中央各种指示的原则，与各地接管城市的经验，拟定下列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

一、对新收复的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市最高权力机关，凡人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军管会的基本任务为：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肃清反动武装的残余势力，恢复并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建立革命政权，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的执行，与有秩序地进行各种接管工作，协助工人

职员，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在上述基本任务大体完成，城市秩序安定，一切市政机关建立并经过上级之批准以后，始得取消军管制。

二、在军管会领导下，可委任市长，并成立市政府。凡我党我军既定之各项政策，应以市政府名义公布；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则可以军管会的命令行之。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其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各按系统整套接收。在军管会下要有足够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纪律良好的、有相当城市知识的专门警备部队和公安武装，以便看守工厂、仓库、机关、公共建筑物和巡逻街道，防止特务破坏，与市民偷窃（同时各接收系统亦应各自配备看管工厂、仓库之专门部队）。各部接收工作人员应随同部队迅速入城，并事先准备好工作需要的运输工具与食粮之供给。对城市人民的粮食与煤炭的供给，亦须预作必要的准备。军管会入城后，应首先注意恢复电力供给（使一切市政工业能够继续工作），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使商人敢于开市做生意），迅速恢复交通秩序（可利用旧有警察徒手站岗、维持交通），迅速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注意防火消防工作与城市卫生工作。对一切接管之工厂，应按原职原薪立即复工，这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的基本环节。我们对一切新收复的城市，必须做到接收得好和管理得好，并必须“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二中全会决议）

三、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特别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因此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一切接管机关从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干部直到勤杂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一切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下列入城守则：

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佩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分子。

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

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统一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

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速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

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

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

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外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办法。严禁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

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市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和练习射击，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

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共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

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

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四、我军进入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当我军进入江南初期，必须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及对各城市进行系统的接管工作，而尚不能有系统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因此我们在接管江南各城市时，应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以便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并必须实行以下各项政策：

第一，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必须一律接管。我们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时，应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同时必须严格的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机构。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一方面可以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如果仅有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的接收，而无自下而上工人、职员的审查和检举相配合，是接收不好的。对于接管来的企业的原有人员（包括厂长、局长、监工、工程师及其他职员），除个别破坏分子必须逮捕处分外，应一律留用，并令其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生产，而不应干涉或代替其职务。如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或原有负责人劣迹昭著，非撤换不可者，亦应从本企业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可委第二或第三级负责人代理）。对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变或废除。对旧的实际工资标准或等级及其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亦应暂时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须要加以改良者，旧人员中有须要加以调整者，均需在情况了解后再作必要与适当的处理。

第二，对私人经营的企业（如工厂、公司、商店、仓库、货栈等等）及一切民族工商业的财产，应一律保护不受侵犯。私人工商业中如有股东不明或部分股东确为重要战犯或为官僚资本者，应一律暂缓处理，但先行登记加以监督，防止转移资金货物。对私营企业应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一方面要教育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工人失业，另一方面要严重警惕资本家故意消

极怠工或借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及其他待遇。如劳资间有纠纷时，可由军管会召集双方调解或仲裁之。必须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富消灭封建的办法错误的应用到城市，同时对故意消极怠工的资本家应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罚。

第三，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应由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具体办法应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处理之。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须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可以分别录用。江南各大城市解放后，对保甲人员可暂时利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持。其办法可按照中央关于暂时利用旧保甲长的通知具体处理。

第四，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要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应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其余暂时照旧。例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采取继续工作。

第五，应建立各界代表会，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会议机关。各界代表会的组织和职责，应遵照中央关于成立各界代表会的指示原则进行。

第六，我军进入江南应确定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票为本币。对伪币金圆券应采取排挤方针，辅之以限额收兑。人民票与金圆券的比值及限额收兑的具体办法，应视当时情况规定之。

第七，我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应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以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但一般标语口号必须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始可张贴。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应一律没收接管。对个人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也可以没收接管。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可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应全部接收。对大城市广播电台及广播人员的政策，应遵照中央指示的原则办理。

第八，对国民党监狱在押人犯，须经过审查分别处理。对革命分子应立即欢迎其出狱。对重大刑事案犯，如盗匪犯、杀人犯等仍宜拘禁，听候处理。对国民党的司法机关的接管，应照中央关于接管平津司法机关指示原则办理。

第九，对新收复城市的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该一律暂时照旧征收。除少数苛捐杂税（如防共捐、戡乱税等）应立即停止征收外，对一般旧有税收税率及税则，应待调查研究后再行改革。在我税收干部缺乏条件下，除对个别为人民所痛恨的旧税务人员应加处分外，对一般旧税务人员亦可暂时利用，以便逐渐训练改造或待将来再行调换。

第十，必须组织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并在此委员会下设立公共房产管理处，统一管理与分配城市中一切公共房屋，不

许任何例外。一切公共房屋连同房屋中的家具、设备、衣被，草木等在内，不论有无机关或个人居住和已否分配，一律归房产管理委员会接收和保管，并进行登记，造具清册，成为国家财产。对各城市公共房屋的具体处理办法，应遵照中央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决定的规定。对私人房屋暂采一律照旧缴纳房租的办法，以后房租亦应暂由房客与房东协议规定之。

第十一，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家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般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教堂及一般外侨亦应采取保护方针，如外侨有犯罪行为，应依法处理，但除现行犯外，必须先报华东军区，重要者则必须转呈中央批准，始得逮捕与执行。对外人所办文化教育机关及其他事业的处理，均须遵照中央外交工作指示原则执行，且必须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

四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待驻华 外交机关人员及外侨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总前委，刘邓张李，粟谭，并告林罗刘谭⁽¹⁾：

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南京美大使馆施行室内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请求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为违犯纪律行为，速予查究。野战军以下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在战场上，由于外国军队、军舰、空军及手持武器的外国人参加战斗行动，我们应该实行自卫，但同时必须报告野战军前委转报中央请求指示。在城乡卫戍警戒上，如遇有外国侨民抵抗我军途中检查甚或手持武器企图行凶者，容许我军不经报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告批准，先行制止或逮捕。在紧急情况下，容许我执法军人实行自卫中南京现为各国大、公使馆驻在地区，我卫戍部队必须特别注意，望刘、邓、陈、饶⁽²⁾立即注意此事，亲自掌握外交问题的处理，并督促陈士榘、袁仲贤加强对南京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严防敌特和外国间谍之挑衅。南京以外之各大城市，亦须照此办理。

中央 军委

卯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2) 指陈赓、饶漱石。

军委关于做好接收上海 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总前委，粟张，并告刘张李⁽¹⁾：

(一) 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卒进去，陷于被动。(二) 美国驻上海军舰为避免引起纠纷，有于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长江口外之传说，是否如此待证。(三) 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四) 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五) 准备情形，望筹划电告。(六) 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军 委

二十七日六时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 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中央军委关于稳住汤恩伯及 外交对策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总前委，粟张，并告刘张李⁽¹⁾：

(一) 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

(二) 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美国只留下一艘载有医疗设备的军舰（医舰）在上海。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只留下驱逐舰黑天鹅号在上海（该舰被打伤，有伤兵留沪就医）。法国原有一艘军舰在上海，是否退出不明。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

(三)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此事请邓、饶、陈⁽²⁾、刘加以注意。

(四) 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关于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

(五) 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

中央军委

俭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2) 指邓小平、饶漱石、陈毅。

我们的私营银钱业政策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私营银钱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可能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经过其正当的存放款、汇兑和其他正当业务，起着调剂社会资金和扶助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应当受到保护和被允许存在与发展的。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超出正当的业务范围，利用存款投机囤积，则又不仅不能起调剂社会资金和扶助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反而会助长物价波动，妨碍正当工商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是有害的。为此我们对私营银钱业就必须严加管理，促使并限制其只能向有益于国民生计的方面发展，取缔其一切非法投机的行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并有利于广大人民；只有这样，才符合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对私营银钱业的基本政策。昨天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则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化。

生产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所以从事于货币信用受授的银钱业，是从属于生产，并应为生产服务的。如果脱离了生产的需要，就必然走上投机、冒险的道路。十余年来反动的国民党在经济上所做的事情，概括言之，就是便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因而阻碍生产发展，使大部分的民族资本脱离生产，转向投机事业。一般银行、银

号、钱庄亦脱离其调剂社会金融，以扶助工业界生产的正当业务，而从事于金融投机，以及其他投机事业。特别在战争的情况下，许多私营银钱业吸收了社会闲散资金，从事囤积居奇，勒取非法利润。而四大家族控制下的所谓“国家银行”，则不但不与这些投机行为作斗争，而是专门领导投机，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以充实四大家族的私囊。所以在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最近十余年来，私人行庄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这种银钱业的畸形发展，并不表示国民经济的繁荣，相反的是国民经济衰落，以至临近破产的表现。私营银钱业，不管它们自己进行投机活动或者供给资金帮助商人进行投机，它们的活动都是对生产事业有害的。我们对于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私营银钱业这个丑恶面，必须彻底肃清，必须把私营银钱业端正的放在发展生产的正确基础上。《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办法》第四、五、六等条在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条在资金方面的规定，及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条在资金运用及存款准备金方面之规定，正是根据这种精神。这在稳定金融、发展生产、保障存款人权利上说，都是十分应该和必要的。即在私营银钱业本身说，这些规定也是十分应该和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可能使私营银钱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作用，不如此就不能防止私营银钱业走投机冒险的道路，不如此就会影响市场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私营银钱业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华北已全部解放。我们华北区今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我们国民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只有把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统统发展起来，才有希望在相当时期内，提高我们的生产水平，使我们的国家逐渐的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如果私营银钱业遵守法令，经营

正当业务，为工农商业生产所需要，它是可以存在的和发展的。但是如果私营银钱业还想因袭反动的国民党时代的坏作风，不在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建设中做一部分有益的事情，只想看机会钻空子捞一把，那么它就会自绝前途。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能容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的。我们的国营经济，尤其是国家银行，为了人民利益，是一定要坚决和一切非法投机行为做斗争的。中国人民要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来发展生产，巩固自己的胜利。中国人民喜爱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业；憎恶一切投机倒把，损公利私的行为。谁顺应这种愿望就能存在，否则就会被淘汰。

根据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刊印。

军委关于应准备早日接收 汉口汉阳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林罗，刘张李，萧陈⁽¹⁾，并告中原局：

(一) 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过早。在此意图下，如果滠口铁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滠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二) 浠广不在划定范围之内，该处敌军应予消灭，不使决堤灌水。(三) 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²⁾张李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李仍得指挥萧陈。（四）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

军 委

卯俭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指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萧劲光、陈伯钧。
- （2）指邓小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

* 这个声明是毛泽东起草的。

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央军委关于高级领导机关 对下级应加强文电指示等问题 给华东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¹⁾，并告各局、各委：

(一) 艳酉电悉。处置甚好。

(二) 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三) 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

(四) 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项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现在鉴于南京方面闹出的乱子，如果你们还不采取打电报、发通令的方法，立即告诉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那就在上海，在杭州，在苏州，在镇江，在无锡，在芜湖，以及在其他地方，又要重复出乱子。这种出乱子的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下面，而是在领导方面，事前告诫处理得不适当，或者没有去告诫和处理。过去你们对于山东及苏北的城市政策和工业政策，长期不发电报，不发通令，以致下面无所适从，各干各的，受了损失，也是一项教训。

中央军委

卯三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两大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其他各野战军地方军及南方各游击部队全体同志们，全国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们：

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合一切黑暗势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血腥的统治，业已二十二年。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起而反抗者，先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不意人民解放军渡江三日，南京反革命中心即告覆亡，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诸名城，相继光复，国民党军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五十一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八军、第九十九军全部、第二十

一军大部、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六军各一部，被我聚歼于长江以南，常熟、苏州、长兴、广德、泾县、彭泽之线以北地区，并占领上述地区各县。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刊印。

在天津市工商业家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

刘 少 奇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好。总起来说，不外是这么几个问题：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我这次不能多谈，以后黄敬市长可以多谈。

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现在整个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很清楚的了。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做到，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到，也可以做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虽然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还不能完全独立，还有许多原料零件等等，需要依靠外国，但是因为钥匙在手，只要有十几年时间，国内经济就可以逐渐独立。其次，封建势力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军事发展下，也可以解决。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是指工业农业。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要有分配。因此，商业，进出口贸易，内地贸易，运输业等，都要和生产配合。

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将来还可以组织一部分合作社经济。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前次我和几位先生谈话，谈到怎样使公私营企业结合起来的问题。有位先生说，你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的忙。这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 and 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上次谈话，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这也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么？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遍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上回李烛尘先生谈到他去山东临清销盐，说临清贸易公司降低盐价挤他。我已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做，并且要李先生再去。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我们的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顾到国家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便不会照顾你。又有人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已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不然，中国就要变成帝国主义，到国际上去抢市场，一抢就要打仗。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政策便是失败的。不变成工业国不得了，一变成那样的工业国更不得了。这些事情还远得很，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有计划地避免，这一点政府可以做。比如办多少纱厂以后，不要了，可以限制国家和私人再办。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像李烛尘先生所提的，临清贸易公司应提高盐价，这就是要限制贸易自由，限制临清国营贸易公司有减低盐价的自由。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又比如税收问题，你们提议将税率由百分之三减少到百分之一一点五，是说税收限制了你们发展，因此你们提议要把税收限制一下，这也是相互的。在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可以由对外贸易处与有关方面商量，想办法解决。统销如果妨碍出口，可以修改。修改方法不一定是取消已颁布的统销法令。你们经营出口，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政府商量获得适当解决。

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恢复工业需要一大批资金，光是公营厂房修补一下，就需要十五亿人民券。但是贷款仍需要办，应该统一筹划，公私兼顾，大家分一点。要全部够用，我想是不可能的。加发票子，如果不致影响生产，可以发。贷款的章程可以具体研究一下，如临时贷几批，立即生产见效，就应立即做。

税收问题。天津税收现仍用旧税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石家庄解放后半年多不收税，反而引起工商业家恐慌，以为要清算他们，不但不感谢，而且还不放心。所以在天津解放前，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天津一解放就照国民党的办法收税（苛捐杂税除外），收几个月后再慢慢改。收的结果不坏，出我意外。据你们说税收得多了。你们既然可以照数交给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同样交我们呢？你们拥护人民政府么！我们以后可以在财政上公开，采取老实态度，收多了告诉你们，有困难要求你们解决。同样，你们也应该采取老实态度，调皮捣蛋，尔虞我诈，大家反对。过去在国民党下面，老实吃不开，现在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采取老实态度才吃得开。国民党收税时贪污很厉害，你们用的是两本账，所以实际收得少。这次税收得多，我们有一半功劳，因为我们不贪污；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账变为一本账。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

税收多了，要做点事。要把工厂玻璃安起来，用两个月的盈余来开支就够了。其次，还有很多事业要办，如医院等的

建设。

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但大家应该负责任地提意见，要公私兼顾。职工所得税也得和他们商量。

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天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过了长江，有二百一十战士同时在前线作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兵力。但是在全世界我们的兵的费用还是最便宜的（美国兵每人每年要用一万七千元美金，而我们的兵一年仅用一百多不到二百白洋）。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负担多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时期是不会很长的。大家咬紧牙关，过一年或者两年，炮弹不打了，兵不养这么多了，有的兵参加生产事业了，情况就会改变，现在需要你们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还要增加一些，当然，如果多到妨碍生产的程度则应当减少点。处在今天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胜利了。公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今天工业的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

你们有些困难，像原料不足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

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比如你们想到山东，河南去收买牛皮，政府给予帮助，完全没有困难，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就希望你们提意见，和我们合作。上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很好。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但是目前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还不宜于建立。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如税收、原料、贷款等等，看需要来设立；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一切问题和意见，可以向这个委员会集中。

对外通邮电的问题，可以商量。和外国通邮电，只要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经过外商与外国建立关系，这是临时办法，不是永久的。和帝国主义来往，只要不丧失主权，不致束缚我们的手脚是可以的，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好处就做（他也愿意，两利）。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诸位可以不谈。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今天帝国主义来找我们，这口气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说，不要忘记民族立场，但是有好生意还是照做。

商标假冒，是不好的。

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是临时的）。是不是要限制股息呢？李烛尘先生主张要限制，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我觉得顶好现在不加限制，股息的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私人房产问题。听说现在有的房主不修房子，怕分。我们

的方针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必须没收外，其他一律不没收，而且保证私人产权，鼓励出租。政府不号召搞减租运动，而号召交租。房租由双方议定，有纠纷时再由政府调解。有钱可投资于房产。至于地皮问题是另一件事，现在不作宣布，恐怕将来要归国有。地皮是国有，房产是私有。将来要盖房子、盖工厂，可以向国家领地皮，不必花钱买，只由国家收一点地皮税、房产税。好的地段多收点，差的少收点。房子垮了，地皮仍归国有。不过将来建筑房子要有规格，不能随便盖。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劳资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规律，不是谁可以制造的。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的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

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哪一条路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国内外人民都在反对它。生产过剩就要到外国去抢市场，就要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走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非打不行！好像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

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作斗争，你们很难办，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的，如要求工资增加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是两个阶级在斗争，现在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地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起来。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

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同意后，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花头是不行的，如某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和工会、政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结果使工人对你们印象很不好。这样做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是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

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如果工人工资过高，你们自己可以提出来

李烛尘先生提到办合作工厂问题，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你们有权，但必须是为了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是挟嫌借故裁撤工人，只留下你的亲戚朋友，而他在生产中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就要斗你。听说私营工厂也有官僚化，也需要和公营工厂一样整顿一下。工厂办得好，才能说服工人，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与工人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

工人起来了，话说得不好听是有的，于是你们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自然，工人不守厂规是不对的，我们已告诉他们要遵守，你们也可以按厂规处罚。同时，你们又需要在劳资两利和尊重工人人格的原则下，修改一下旧厂规，交给工会和工人讨论，他们同意后交政府批准。如果有的条文工人不同意，双方无法妥协，就交总工会、政府加以判断。条文成立以后，双方都要遵守。

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工人对厂长职员轻视他们不满意。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常自高自大，耍架子，凭架子吓人。现在，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和工人一样。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高低，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在美国工厂里职员和工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这很好，这就是放下架子。高人一等的等级思

想是贵族思想、封建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就是人格平等。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在汽车上，我就听汽车伙指挥”。又像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堂的表现，便都是尊重工人人格。这样做，可以使劳资关系更好一些，矛盾、斗争更少些。我们的军队里官与兵分不出来，大家共甘苦。我们在这里的上下干部之间为什么不闹事呢？也是因为能共甘苦。

以前的社会风气，是有身份、有架子的人才能吃得开，这是社会罪恶。如果说剥削是罪恶，也怪不了哪一个人。过去你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一方面又剥削了别人，这是剥削社会的罪恶。我们现在要改的是社会制度，并不是对哪一个人有仇恨，说放下架子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 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 会师的工作指示的批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华东局，并告中原局，林罗⁽¹⁾：

你们“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草案，已阅悉。写的很好，我们完全同意。并认为要特别注意教育野战军的与随军南下的干部，认识到游击区的党与游击部队的缺点，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长期在敌后作战，得不到中央经常具体的领导，中央的许多文件也很少看到，学习的机会也少等等。这样来看问题是合乎事实的，也能使游击区的党与游击部队的干部更愉快地自觉地检讨其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也就能使野战军的与随军南下的干部对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少作求全的责备，这样就有助于双方的团结。这是一个外来与本地的关系问题，也是野战军和南下干部如何与当地群众结合的问题，从接触的一开始，特别是外来干部就必须自觉地深刻注意这一点。

中 央
辰支

附：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 会师的工作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现在南方苏、浙、皖、闽、赣、闽东等省，均散布有我党领导的游击区和小部队，或系苏维埃时期留殖下来的，如浙南、闽西等地，或系抗战期间留殖下来的，如皖南、浙东、苏南等地。我军渡江后，即开始与各游击区汇合，双方会师，是在南方广大人民多年渴望与瞩目之下进行的，是关系我党我军与南方老苏区老游击区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是关系我党我军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目前我们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情况尚不完全了解，特预先指出下列各点，以引起各游击区各部队和南下干部的关注，在思想上工作上有所准备，以便会师时造成有力的团结，去完成解放南方各省的任务。

（一）首先是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的南下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应认识南方各游击区各小部队，他们在多年游击战争中所创造的地方，所获得的成就，是最可宝贵的。例如：保持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保持党的组织和干部，保持了精干的游击武装，与当地人民在斗争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有力的配合了北方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些方面均值得南下同志的重视和虚心学习的。特别他们在长期奋斗中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斗争联系，对于执行我党解放南方各省的任务，可起重大的骨干作用。此一点，要有深刻的认识。我军初到南方，情形不熟悉，必须懂得充分利用我党在南方各游击区这一有利条件，在

各游击区影响所及的地方，必须经过他们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应该以我们在北方遇事尊重地方党，重视本地干部的整风态度去对待他们，去造成双方的团结。切戒自高自大，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不经过游击队的党去直接处理与当地有关的问题。我们南方游击区的党和部队，在数量上可能很少，形式上可能极不完备，地区也不宽广，供应部队的的能力可能很小，他们多年与上级党隔断，对我党现行政策不能完全明了，在敌长期封锁与“清剿”之中，必然要产生各种缺点。我们南下的同志和主力部队，应该以虚心体贴的态度，加以慎重分析，作各种有益的帮助，如果采取轻视或粗鲁的态度，必犯脱离当地群众的严重错误。帮助当地群众培养当地干部，提拔当地干部，壮大游击队，变民变的游击区为广大的解放区，是我军南下的基本任务。对游击区与游击队的工作配合问题，处理得是否适当，对培养当地干部与壮大当地部队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这是检验我各党委工作的基本尺度之一。

(二) 南方各游击区的党和游击部队的同志，应向自己区域党内同志和当地人民有系统地说明目前政治形势和大军南进的意义，号召当地人民有力的执行配合任务，去实现南方各省的彻底解放。应该了解解放军与一批地方干部从北方来，多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对党的政策比较了解，对解放区的比较有经验⁽²⁾，因此在一般政策上，游击区的党应服从部队的党的领导，和多倾听南下同志的意见。游击部队在行动上应接受主力部队的指挥，更应了解我游击区，党和游击部队，自己在多年坚持游击战争中，除有其光荣的成绩外，还不可避免的在独立斗争中，带来各种缺点，自己面临中国革命全胜的新时期，自己应重新检讨自己，适当的改变自己，方能适应新形势和执行新任务，就是在长期斗争中被检验过的认为正确的部

分，亦应根据新的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作必要的正确的改进，才能适合人民的要求，对当前任务作有力的贡献。在此，各游击区的党应与部队的党于会师后，进行互相会报情况协商政策，并首先办训练班，将游击区党和干部进行短期轮训，研究中央文件，造成共同认识。同时游击区同志对人民解放军和南下地方工作同志的要求不可过高，他们数十万人中，每个人对党的政策了解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尤其情况生疏，斗争形势复杂，部队庞大，各种条件不具备，难免不产生各种毛病，我游击区的党要能正确分析这些现象的来源，站在党的正确立场给以必要的帮助。

（三）估计到大军南进后，敌人尚未完全消灭，斗争形势尚极其复杂，庞大部队的供应极其繁杂，地方党政的系统未完全建立，群众的发动尚在初期，我党对各阶级的社会政策，只有原则的决定，其具体执行办法则应根据各地实况去考虑订定。尤其在当地，谁是反动分子，谁是恶霸分子，谁应先办，谁应缓办，谁应宽大改造，谁应立即惩办等问题，在这些方面可能引起部队与地方、外来与本地的不一致，尤其是部队的庞大供应，容易产生制度不周、纪律不严的种种毛病。遇着此类关系双方团结必须求得一致的问题，应该掌握自我批评的武器，在一定组织内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手续去求得解决，不可意气用事，盲目冲动，损害团结。在处理原则上，双方分清优点与缺点、有意与无意、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个别与全体、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界限，从赞扬成绩去帮助改正缺点，从互通情报造成共同意志，经过对方直属上级去纠正缺点与错误，而避免越权的直接处理。既不可对双方错误采取消极指责的轻率态度，亦不可采取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此，我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党，自己站在领导地位，尤应以自我批

评的态度，主动的去团结当地党和当地同志，从军事会师进到思想会师，以至政策会师，对于团结全党去完成解放南方各省的任务是有其直接意义的。

此指示先发部队党和南下干部研究，在会师时由部队转发各游击区的党。

华 东 局

卯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林彪、罗荣桓。
- (2) 原文如此，应有缺字。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动 与今后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廖 承 志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宣告灭亡，人民民主革命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五四运动的三十周年和北平解放以后的第一次五四纪念的时候，我们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了。

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着全国各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这是全国青年的民主大团结。召开具有这样广泛代表性的全国青年的大会，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青年久已盼待的集会，它的实现应当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改变了全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青年生活的面貌。中国青年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胜利进军中，中国青年保持并发扬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光荣革命传统，英勇积极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解放斗争，并且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 这是廖承志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战士，约占全体解放军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他们在战斗中创造了成千成万的模范射击手，模范炮手，坦克手，爆炸英雄，战斗英雄。他们在各种军事、政治与技术学习上，在部队的民主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及其他各种建设性的运动中，经常是最活动的分子。

解放区的青年农民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解放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已成为区村人民政权的干部，而且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来源，和民兵、自卫队和支援前线的民工的主力。

青年工人的数量，在全体工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中国生产战线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们在大规模解放战争的供给和广大人民的需要上，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了很重要的贡献。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职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中国学生运动有光荣的历史传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着英勇斗争的学生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而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处境相反的学生们，是生活和学习在完全自由和进步的政治环境中，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大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除了上述年青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英勇奋斗以外，还有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职业者等其他广大阶层的爱国青年及青年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底下，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反对卖国、独裁、内战，拥护独立、民主、和平的庄严工作，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中国青年是努力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现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正在接近于

最后的完成，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正在开始，希望全国青年发扬过去的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执行以下三项基本任务：

一、拥护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 拥护人民民主的新国家

现在南京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但是还有残余势力需要肃清，这些反动残余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还企图死灰复燃，继续祸害人民。中国青年应当和中国人民在一起，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正确方针，继续积极参加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残余敌人，解放中国的全部国土，使全国人民和青年无例外地都能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面解放出来。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解放区的青年需要大量参加和支援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并积极参加和协助新区接管工作。暂时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青年，则须积极团结群众，努力保护经济文化机关及一切资财勿受破坏，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中国青年一方面需要积极参加消灭反动派残余的斗争，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为了建设新中国，应当在青年中间普遍地提倡新的爱国主义。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伟大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流血造成的。我们的国家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九百六十万方公里土地，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它现在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保证了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和青年后代更幸福的将来，因而成为世界上少数最进

步的国家之一。中国青年必须以无限忠诚，热爱这个可爱的祖国，积极献身于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建设，积极加强和改善我国人民的权利和地位，巩固我国的国防，保证我国的领土、主权、利益、荣誉的神圣不可侵犯，爱护我们国家的一切公共财富，尊重和遵守人民政府所制定的革命秩序和法律制度，向危害我们国家的生存和利益的一切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

中国青年的这种爱国主义，是与进步人类的国际主义相一致，而与民族侵略主义和排外主义不相容的。我们深信一切民族都应有独立自由的平等权利，各国人民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反对民族间的侵略、压迫和歧视。因此，我们不但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而且关心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关心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我们中国青年要积极参加世界青年和世界人民反对新战争阴谋、反对民族侵略、反对反民主政治的共同斗争。

二、加强生产建设工作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重要任务。中国青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伟大工作当中负有严重的责任，正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负有严重的责任一样。

一切参加国营工业或其他生产事业的青年工人、职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加强劳动纪律，改进生产技术预生产管理，充分发挥青年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达到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减低生产成本、加速产品流通之目的。在有益国民生计的私营工业或其他私营生

产事业中劳动的青年，也要在自己的正当权利获得保障的条件之下，积极增进生产。

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要提倡根据自愿两利原则的劳动互助组织，发展供销合作社，改进农作法，努力增产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产品。而在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方，还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的斗争。

总之，青年无论在什么生产岗位上都要采取积极态度，向着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向努力。青年应当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节衣缩食，以便积累经济建设的所必须的资本。

三、学习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青年的基本任务是学习。中国的一切爱国青年，今天处在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时代，处在全中国人民着手大规模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努力学习。首先是学习我们新中国立国原理的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中国一切爱国青年都应当学习新民主主义，因为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立国原理。中国的一切爱国青年都应当努力学习新中国的创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忠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原则精神，学习毛泽东的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我们在学习问题上，在思想的问题上，应当建立和在政治上同样的统一战线，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下的统一战线。

中国青年除了学习政治以外，为了建设繁荣的富强的新中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有必要的生产知识，并且必须努力钻研现代的科学知识，使这种科学知识服务于中国的生产建设，以便培养自己成为建设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专门家。

由于过去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发达，提高全国青年的文化水平，首先必须广泛展开青年的普及教育运动，争取在一定时期内消灭文盲，普遍地提高青年的文化程度。对于那些在穷乡僻壤埋头苦干，培育国民后代的广大农村小学教师的艰苦工作，我们更应给出最大的尊重和帮助。

同志们，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全国青年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斗前进。

如果没有全国青年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不分职业、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信仰、不分宗教信仰的一致团结，那么中国青年的力量就将受到分散和削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么中国青年就可能在前进的路途中迷失方向。

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中，已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这正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具体实现了全国青年民主大团结的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我们相信：它将能够广泛团结全中国青年和全世界的一切民主青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运动竭尽最大的贡献。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央军委关于城市驻军 不许住民房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各中央局，分局，总前委，前委，平津两市委：

(一) 平津的经验证明，在城市特别是较大城市的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分散在城内驻扎，确实是必要的。这更便于保障社会治安与秩序，肃清流散的残余的敌人，镇压反革命的特务活动。因之，在入城初期，不能要求卫戍部队只集中驻在郊区少数的几个兵营中。

(二) 但是，另一方面，平津的经验又证明，军队在城市中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当的，因城市不同于乡村，虽然我们部队的群众纪律，一般是很好的，也给了平津人民以良好的政治影响，但借住民房终给居民以诸多不利不便之处。譬如，城市里的房租，在房主的收入中和承租户的支出中都占有相当重的位置，部队借住了，或者是使房主减少了收入（这对小房产所有者是很大的损失），或者是使承租户缴纳了无名的负担。水电费的纠纷，也很难处理。门口设置岗哨，在部队是必须的，却因而使房东的亲友探望甚至不经常在家住宿的家属之来往遭受到留难。再如，屋壁上楔钉子，院子里牵绳子，也常使房东

* 这个通知经周恩来修改后发出。

不满，每日清晨的起床号，更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相径庭。又如，城市人民的生活一般是较高的，而战士看见房东吃鱼肉，吃零食，就不免当面表示惊讶或背后谈论，于是有的房东就反映一饮一食在精神上也感受威胁。还有的因对房东雇用的男女仆人进行阶级教育，而使房东惴惴不安，平津已有人函劝在上海的亲友解雇仆人，凡此种种，并不能怪部队纪律不好，而是由于城市的特点造成的，这证明部队在城市中借住或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当的。

(三) 因此，中央决定：

(甲) 在城市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应适当分散在市内驻扎，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帝国主义武装尚未撤退的兵营，另案办理），公共机关（机关应尽可能挤出房屋让部队住），庙宇，祠堂，公所及会馆等公共场所中，业已停课之学校亦可驻扎，必要时宁可以适当的代价租住整栋的旅馆，也不要租住民房。这样，在大中城市中，市区驻军的营房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还可以做到以营或一两个连为单位分散驻扎，更便于管理教育，遇事也便于集中调度，较之因借住民房而不得不以班排为单位要好得多。至于小城市，公共场所虽然不多，但小城市的市内驻军也不必多，也不必如何分散，不住民房还是可以办到的。

(乙) 城市解放后，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要接家眷来城居住。否则，势必借住或租住民房或占用公共房屋，设置私人公馆，私人占用汽车、占用家具者也势必增多，警卫增加困难，并将给人民以不良的影响。中央去年亥箭《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中，“非经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特许不得设立私人公馆”，“严格禁止一切霸占，争夺、移走、拆毁公共房产、家具、设备的行为”，“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及

“不容许有不守纪律及贪污和腐化的现象”等规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丙）解放军入城，群众的欢迎慰劳是应该的，可以有计划地组织若干次戏剧、电影以慰劳军队，必要的宴会也可以举行，但不得过事铺张，不要搞什么特殊规定。如规定澡堂、理发店、剧团、电影院开放若干天，免费慰劳解放军，以及半价优待等办法，都是不对的，实际违背了本军买卖公平的守则。又如北平解放后三个月内，请客太多，堂会数十次，则不仅浪费甚巨，也的确给人民以不良影响。群众反映说：“解放军真是好看戏！”这一现象，不应再在别地重复。

（四）平津两市驻军，除留防之少数卫戍部队外，现均已南开，应即进行一次普遍的群众纪律的检查，一方面向群众解释部队不得不分散驻扎的原因及分散驻扎对保护治安之实际效果，另方面赔偿房东的损失（如有损失而部队并未赔偿者），代缴部队所欠房租，对于房东所受的一些干扰尽量予以解释和道歉。这一工作，应由军管会或市政府会同部队政治部，根据部队住用民房的调查登记簿，而逐街逐户去进行，如部队政治机关已随军南下，无人办理，则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与华北军区政治部负责，务使由于部队住用民房而在人民群众中留下的不良影响完全挽回过来。现时留在平津之卫戍部队，则应立即依照三项甲目规定，重行调整驻屋，并由华北军区以调整结果报告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

辰鱼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军委关于占领奉化时 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等问题 给粟裕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¹⁾:

(一) 陈饶微电悉。

(二) 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 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去,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 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 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请刘张李⁽²⁾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军 委
辰 鱼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指张震，谭自龙、王建安、姬鹏飞，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
- （2）指张际春、李达。

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周 恩 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

* 这是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选。

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

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

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

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

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像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

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像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连四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

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

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不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像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

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

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黄华同 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 给南京市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辰齐电悉。

(一) 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 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 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中 央
辰 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央军委对南京市委关于卫戍部队 处理外侨问题守则报告的批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辰虞电告关于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守则全文悉，中央完全同意，除在南京施行外，望华东局通令各大城市卫戍部队一体遵行。⁽¹⁾

中央军委

辰元

附：南京市委关于卫戍部队处理 外侨问题守则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央并华东局：

兹制定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守则，以口头向连队传达实施。对外面则不以文字公布，统限二天传达完毕，跟即开始实施。兹将守则全文报告如下：

卫戍部队在执行勤务时处理外侨问题守则

第一，负责保护一切守法外侨及其财产（包括原外国派驻伪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领事馆、外侨住宅、医院、教堂、学校及工商事业等），防止匪徒及特务分子进行破坏。

第二，非经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警备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之指示或批准，我方任何人员：

（一）不得进入外国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外侨住所、教堂。

（二）不得占用外侨房屋。

（三）不得与外侨来往交际，特别绝对禁止与外国记者及外交人员谈话，并对房产权有怀疑或争执时，亦只许报告情况，不得擅自处理。

第三，如遇火警、匪警急需消防与捕盗时，卫戍部队及公安机关有执行之责任。为执行此项责任，得给予卫戍司令部或公安分局指派专人进入失事外侨住所，指导实行之。但严格限于上述责任范围。

第四，每日从晚十一时起，次晨五时止，为停止通行时间。在此时间，外侨不得在街道上行走，如有外出者，哨兵即劝其返回，如遇紧急事务（急病、分娩），则应一面派人护送，一面报告上级存查。如有其他特殊事故要求通行者，则应迅速报告司令部，批准后才得放行。

第五，外侨在市区范围以内（城圈以内）行走时，所有卫戍哨兵与风纪卫兵，均不得阻留或盘问，但如有要求至市区以外旅行者，则必须持有南京市府、公安局所发之旅行许可证，否则，上述哨兵及检查站有权制止其通过，劝其返回。

第六，准许外侨在该市区内，携带包裹来往。未奉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命令，不得阻留及检查。

第七，在我未登记汽车、发给汽车通行证以前，外侨汽车准其在市区内行驶，但不得驶出市区范围以外。各城门守卫遇有外侨坐汽车驶往城外时，有权制止，劝其返回市内（将来汽车通行证颁发后，无通行证的汽车不准通行）。（详细办法另行规定。）

第八，一切外侨均不得身着军服或带武器在街上行走，卫兵有权令其返回住所或制止其外出。

第九，外侨违反上述四、五、七、八条规定时，一般应予以劝告、警告，令其遵守。如仍有无理抗拒违法，而可不马上扣者，则哨兵应查明其姓名、国籍、住址、护照号码、汽车号码报告市公安局和警备司令部办理。只在劝阻无效与十分必要时，始可派人将其送交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办理。

第十，我警卫人员在执行上述一切勤务时，均须保持坚定严肃之态度，注意说明理由，劝告对方遵守。如其违反法令，须交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时，一律不得捆绑，并绝对禁止有伤害、打骂、侮辱等行为。在执行职务遇有疑难问题时，应随时与警备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外侨管理科商同办理。

以上守则，请中央核准指示。在未得批准以前，发作警备部队之参考。

南京市委

辰虞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中央军委在批复南京市委报告的同日，将报告转发给中原局、四野，华北局、军区，山东分局、军区，西北局，一野，并指示：“望将南京市委所拟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守则通令进入各大城市部队一体遵行。”

军委转发第四野战军关于入城部队 必须遵守的纪律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转西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及一、二、三野。

军 委

辰铤

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政：

我们即将进入武汉、南昌、长沙及江南各省诸城市，在进入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力戒进入锦沈时的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兹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各项指示，规定下列各项作为我军人城必须遵守的纪律，盼各部在所属指战员中事先进行教育，入城后须切实执行。

(一) 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

(二) 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

（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部队不得擅自捕人。

（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

（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

（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谢绝。

（七）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场所，对公共房屋建筑及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行出城，在城郊外择地关喂，禁止在市区内关喂，禁止在市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颁布驻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市外组织马场喂养。

（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须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

（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

假制度。

(十一) 整顿军容，提倡礼节。

(十二) 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此文件收到后将报尾报头略更改发到团)

林罗萧谭陶⁽¹⁾

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林彪、罗荣桓、萧劲光、谭政、陶铸。

毛泽东、朱德给林遵等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林遵将军、邵仑舰长、李宝英舰长、吴建安舰长、张家宝舰长、宋继宏舰长、易元方舰长、郭秉衡舰长、韩廷枫舰长、陈务笃舰长、杜澄深队长、张汝樞队长和第二舰队的全体员兵们：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刊印。

军委关于外国军舰 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给粟裕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刘张李⁽¹⁾：

皓未、号午两电⁽²⁾均悉。

(一) 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二) 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三) 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

(四) 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五) 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六）号午电说有二舰挂外国旗，请查明系挂何国旗，以便公布。嗣后，凡关外舰事件，应将详情查明具报。

军 委
号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2）指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未时和二十日午时粟裕、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电报。十九日电说，十八日下午有关舰三艘带国民党轮船六艘及风船等开出吴淞，今后何种船只可以炮击，请指示。二十日电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江之线有敌舰五艘，其中两艘挂外国旗，三艘无旗，向我阵地猛烈炮击，以掩护敌军对我阵地的出击。因五舰靠在一起，怕打错，已严令不准打。为此，给我阵地坚守增加极大困难，请示如何处理。

朱德关于组织 劳资双方发展生产问题 给邓子恢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子恢同志：

卯俭致中央电悉。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但各地在执行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上，曾经发生过并继续存在着若干偏向，偏向的表现有“左”的，也有右的，有的地方甚至“左”右两种偏向同时存在。“左”的表现，如分房屋、分店铺、过分提高工资和工资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及农业社会主义倾向等，自去春以来经中央多次批评纠正，现已大体解决了，但并未完全根绝。平津解放后，党政负责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私人工商业资本家冷淡不理，不向他们正面宣传解释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他们就惴惴不安，多所顾虑，对复工、复业抱敷衍态度，对发展生产不积极；对职工的过分要求不敢据实解释，因而发生了部分私营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国营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工人的工资，及东伙私自妥协把铺子分了的现像（天津分了几十家，北平也有）。又如在公营企业中，工人与企业管理干部的对立以及一般地反对旧职员等等。右的表现，如站在资本家方面，禁止工人罢工。淮南煤矿接管后，三个月来对职员是实行原职原薪，对工人则每月仅发

几十斤粮食的维持费，致引起工人怠工请愿；还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经理（我们派去的干部）徇私人股东之请，开除党员工人，原因是该工人同志曾揭发私人股东贪污舞弊（泊镇的例子）；洛阳市的工作方针曾提出以资本家是否发财为检查洛阳市工作的标准，《洛阳日报》不敢把毛主席的一月十四日的声明登在第一版；又如在发展生产上公私不分，工商不分，在宣传上重视资本家而忽视工人以及宣传工人感激资本家等等。

我在铁道部运输会议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两方面都要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既要照顾到工人生活，也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既要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群众，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也要利用原有的资本家的组织（如同业公会、商会等）向资本家进行宣传，解释我们党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消释资本家的顾虑，提高其复工、复业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实现恢复与发展生产。单动员一方面是不行的，光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不行，光工人积极劳动生产也不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条件所需要的，这与二中全会所指出的依靠工人阶级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路线是一致的。自然，我们所说的双方照顾是有重点有立场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争取团结工商资本家。至于说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与动员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的工作之先后次序，那是步骤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可依当地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但如照卯俭来电所称“先组织资方，或劳资同时组织，而不应该先组织劳方”，那就涉及原则问题了，那是错误

的。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或者是许子威同志听错了。

朱 德

辰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成立外文翻译机构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晋绥分局，华中局，华东局，山东分局，中组部，中宣部，外事组：

中央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及其人员的训练和调查的决定：

(甲) 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及其译员问题：

(一) 中央决定在中央及军委下设立俄文编译局，担任口译、笔译，并主持俄文人才之训练、调查与分配等项事宜，以师哲同志兼任局长。目前必须从中央各部门与各地征调若干有翻译能力及政治条件适合的党员参加编译局的工作。请东北局将东宣部翻译处的十余名笔译人员全部调给中央。并另从东北各地及旅大物色十个到十五个适合上述条件能担任俄文翻译的党员，于最短期内调来中央。责成华北局、华东局（及山东分局）、华中局、西北局（及晋绥分局），各于一月内挑选和推荐出合乎上述条件的三人至五人，将其简单履历和鉴定呈报中央，以便审查和调用。

(二) 中宣部应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筹设一个编译馆，暂归中宣部管理。内分各重要外国语文部，担任编译各部门一般所需用的重要书籍。为了配合工作，各部门应取得连系，定期

会报，协商并调整编译计划。而俄文部门的编译计划，应由中央俄文编译局协同中宣部负责审查，以期协调。

(三) 中央各部门的俄文翻译干部，应由各该部门负责审查，并推选其中优秀而政治条件适合并可以担任党内翻译工作者，送中央俄文编译局审查。中央编译局得征调其担任局内工作。

(四) 党、政、军、民各部门，如由于工作的直接需要而设置或将设置俄文译员者，应将其履历鉴定由党组负责同志审查列表送交中央俄文编译局登记备案。

(乙) 关于训练外文翻译人才问题：

(一) 中央责成各中央局设立俄文学校（例如哈尔滨、大连等地已开办的俄文学校），或在外国语学校中添设俄文部，并将筹备设立或已经设立的情况电告。

(二) 中央责成中宣部及外事组将北平原有的外事学校及华大俄文系合并成立一个外国语学校，暂归外事处管理，分俄语、英语两部，扩大学员到五百人至七百人。除原有学员外，应再从华大、革大考选已有外语基础的学生，加以补充。如不足额时，应再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处大、中学生中选送一部分来。一般俄文系的教育方针，应报告中央俄文编译局审查批准。

(三) 决定在中央俄文编译局下设立一俄文专修馆（较高级的），暂定名额五十人。从东北、华北各俄文学校中选调已有俄文一般基础者，以及由各地党推荐的懂得俄文的党员组成之，以资实习和深造。中央责成中组部迅速选调四或五名有管理能力的干部交俄文专修馆担任校务及教务工作。

(丙) 关于俄文干部的调查登记问题：

(一) 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负责调查登记学过

俄文的男女干部。调查表格由中组部制定发出。各地方应将每个人的登记表送二份交中组部和中央俄文编译局审查备案，以便必要时调动使用。

（二）中央并责成各主要市政府，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北平、天津、济南、开封、南京、杭州、武汉、上海等市政府，在其旧职员登记表上，应增添“熟悉何种外语及其程度”一项，以便必要时考选征调，担任一般的翻译工作。

中 央

辰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 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指示 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华中局，林罗谭⁽¹⁾：

兹将华东局辰寒给无锡市委的复电转给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如果你们同意此件，请转发武汉市委、湖北省委及湘赣两省委。关于武汉市委的工作，请要市委每数天报告一次。

中 央

辰马

附：华东局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

苏南区党委，转无锡市委，报中央：

管文蔚同志对无锡接收后十天（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八日）的工作报告，很好。你们对该市公家财产接收工作，即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告结束和清理阶段，所以，你们的注意力，即应把中心转到对于生产问题的处理。无锡是江南除上海外的最大工业城市，处理得好不好，对上海及其他城市均将发生很大的影响。而要把生产问题解决好，就必须根据毛主席指示，从劳资、公私、城乡、内外等四面八方去考虑问题，与妥善的解决问题。无锡的工资问题，业已提出，工人和资方均希望能做最后决定。最后决定，目前尚不可能，但作出适当的暂时的解决，甚为必要。否则，厂方、工人顾虑均大，很难复工生产。解决的方法，仍宜用双方和平协议，政府加以仲裁的方式。一般采用原来的工资标准，力求迅速开工。军管会只宜对原来标准中个别极不合理，急待改变而又比较容易改变者，加以适当的调整，切不可牵动太大太多，拖延时间太久，影响开工和生产。可以向双方说明，迅速开工，于劳资双方均属有利。许多问题可在开工之后，从长计较，合理解决。这样解释，是会为资方，也会为工人所接受的。同时，在规定工资标准时，还应照顾到公私企业大致相等。大工厂同小工厂的差额不要比过去增大，以免影响小工厂无法开业与解决工资问题。同时，对于恢复生产的各项困难，如燃料供应，原料来源，和产品推销诸问题，应鼓励资方多方设法解决。政府亦可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公私兼顾的条件下，予以协助（如煤炭供应）。你们已经注意到对于工人的组织和教育，这是很对的。但在教育中，要注意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上去说服工人，做到发挥党的劳资两利的方针，防止可能产生的“左”的倾向。但你们对于劳资关系中一些不合理的東西，应开始着手研究，然后，视条件许可的程度，在劳资双方的协议下，特别在今年发展的条件，逐步的使之达到合理的解决。这里，你们还应使我们同志和工人了解，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是办不到的。而资本家又是

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有积极性的。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对私人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这个限制政策，是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是既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诸方面加以限制，而又不得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太大太死的经济政策。这些原则，在二中全会决议中，已有明确规定，请你们注意研究。今天，无锡的资本家，正从多方面试探我们的态度。他们企图保持其原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他们在长远的岁月里，将要在各种形式下，同我们进行阶级斗争。你们对此有所警惕是对的。但是，你们切不可同他们的关系弄得很紧张，而应主动的同他们的代表人物接触，召开资本家的座谈会，详细解释我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用开诚坦率的态度，告诉他们，抛弃反动分子，以利于我们同他们的合作。在政治上，你们还应考虑，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形式（如各界代表会之类）下，容纳其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活动。对此，你们应有所准备，对荣德生、钱荪卿等资本家的态度，前电已有详细指示，望照该电执行。据说，在荣、钱的企业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对此，你们应注意调查。对于清理私人企业中的官僚资本部分，不要性急。在秩序已定，工厂已经复工之后，再去进行，也不为迟。清理的步骤和方法，应由你们在调查后拟出，报告我们批准，然后施行。总之，你们当前的重点，应放在如何使八百九十二家公私大小工厂开工生产。其他一切工作，均应环绕此一基本任务去进行。此外，你们报告中，还有两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对于导报、锡报、民报，应根据审查其一年报纸的结果，指明其为反动刊物，拒绝其复刊的要求。要善意的告诉

钱荪卿等，恢复这种反动刊物，对他们政治上有损无益。目前，各地均不宜允许资本家办报，但亦不可明白说出不允许资本家办报，请予注意。

（二）学校取消训导制是必要的。但应在各学校中宣布尊师爱生，严守校规，努力学习的方针。同时，请你们在一两个公立学校试行设立生活指导部（处）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山东、苏北业已实行），看试行结果如何，再决定是否普及或采用其他制度。又据新华社八日电讯，北平三大学，已成立校务委员会。这种组织，亦可在一两个公立学校予以试行。但须在一个时期之后，各项条件准备成熟的时候，才去试行。马上办，不会有好结果的。至于学校课程的改革，可照你们拟定的三个步骤，稳步的实行。

华东局

辰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指林彪、罗荣桓、谭政。

军委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 给总前委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¹⁾：

(一) 粟张养午电⁽²⁾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罗即令曾泽生军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六）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 委

辰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贺龙。

（2）指粟裕、张震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午时关于请示入闽部队何时出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中共中央关于通报平津 接收企业经验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

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中 央
辰 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军委关于预筹对策防备帝国主义 武装干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彭贺，刘邓，陈饶粟，林罗⁽¹⁾：

(一) 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

(二) 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三) 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²⁾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

(四) 以上各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

军 委

辰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

(2) 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

祝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新华社社论)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彩，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

* 这篇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

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部，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绝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

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

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中 央
辰世

附：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¹⁾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东北局：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在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现特将邹大鹏来信电告你们，望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²⁾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然后将东北局讨论的结果电告中央。

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

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中 央
辰 世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
- (2) 即张闻天。

建立有工作能力的 中央财政经济机构*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刘 少 奇

一、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由中国人民革命军

* 这是刘少奇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

事委员会以命令定之，其决议，由过半数到会委员之多数通过成立之，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停止或修改或废除其决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数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四、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下列各工作机关，在委员会及主任与副主任领导之下，分别地进行工作。

(一) 中央计划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审查与拟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计划。局内设统计处、供应处、国家资源调查登记处、地质勘察处等，并得按各财政经济部门逐步设立若干计划组。

(二) 中央财经人事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财经领导干部、技术专家及一般职员和工人的训练、登记与调动等事务。

(三) 中央技术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有关新的技术之发明、采用与推广等事务，并得按各项技术性质逐步建立若干技术组。

(四) 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私营企业之指导事务，并得按各项私营企业部门逐步设立若干事务处和设立华侨经济事务处。

(五) 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合作社之指导与协助事务，并得设立消费合作事务处、农业合作事务处、手工业合作事务处、水利合作事务处等。

(六) 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负责管理关于外资企业的事务。

(七) 秘书处，负责管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事务。

五、除开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机关而外，应即陆续建立下列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即以现

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

（一）中央财政处，负责管理有关税收、粮食、盐务、烟业、酒业、渔业及其他财政事务。

（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管理金融并进行其他银行业务。

（三）海关总署，负责管理全国海关并管理港口、码头及边境检查等事务。

（四）中央商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对内与对外贸易及实物配售等事务。

（五）中央铁道部，负责管理全国铁道之运输及铁道之修建事务。

（六）中央交通处，负责管理邮政、电讯、船运、航空、公路等事务。

（七）中央燃料处，负责管理有关煤炭、石油及电力等事务。

（八）中央金属处，负责管理有关钢铁及有色金属与机械制造等事务，并管理军事工业与造船工业。有关基本化学工业及建筑材料工业之事务，亦归金属处管理之。

（九）中央纺织处，负责管理有关棉、麻、毛、丝的纺织等事务。

（十）中央工业处，负责管理除纺织工业以外的有关其他各种轻工业之事务。

（十一）中央农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农业、畜牧、垦务及农业试验场、国家农场等事务。

（十二）中央林业处，负责管理有关森林之采伐与培植并管理有关造纸工业的事务。

（十三）中央水利处，负责管理有关巨大水利工程的事务。

六、前条各处之组织条例，另行拟定。

七、除建立上述各中央财经机构外，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在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立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其组织条例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拟定。

八、关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划分，国家企业之由中央直接经营或划归地方经营或委托地方经营等事，均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之。

九、重要国家企业或国家资源之出租给私人经营或开发，其年限相当长久者，其合同须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后，方为有效。

十、地方财政经济机关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执行以下各项任务：

- (一) 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指定之任务；
- (二) 管理当地财政工作和金融工作；
- (三) 恢复与发展当地人民经济；
- (四) 经营中央与上级机关划归地方或委托地方管理之国家企业；
- (五) 监督与协助由中央直接经营之当地国家企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聘请 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 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二十五日)

—

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

上海解放后，原拟请一两位党外人士任副市长，曾以此意告陈叔通、马叙伦，并提出史良、盛丕华，征询陈、马及其他人士意见。据反映，认为党外人士任副市长不必过早，对人选亦有斟酌，因此，乃改提聘请一批党外人士，如史良、黄炎培、章乃器、俞寰澄、盛丕华、包达三、陈叔通、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任上海市政府顾问，连颜惠庆、江庸、章士钊、张元济等都可包括在内。在原则上，民主人士对此多表同意，并觉得这样做，较一两个副市长为好，且更能协助政府影响各方，特别是易于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知识分子，惟具体人选，尚未与各方交换意见，你们对此意见及人选如何，有无增减，望速复。

中 央

已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两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二

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

中央已东电询关于聘请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事，迄今未得电复。现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网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均已赴沪，如你们无其他严重困难，请即将上述八人再加入原已在沪之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及将由港到沪的章士钊共十四人一律聘为顾问，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此事，在已东前，即已与他们谈过，临行前亦曾告以至沪后，请他们利用在沪期间联系各方多提意见，详情已托邓颖超同志面告。此十四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即须北上，望你们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其他各人，如马寅初将赴杭州，望电告谭震林、王建安，予以照料，并助其移家北上。许广平、沈体兰、邓裕志、章培、林汉达、吴耀宗、寿墨卿等事毕后仍将来平。黄炎培葬子、陈叔通葬兄，望给予帮助。

中 央

巳有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对日贸易问题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东北局：

关于对日贸易的辰有电悉。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以扩大新民主中国在日本人民中影响而加深日、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现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对日贸易。目前最大的障碍是麦克阿瑟及美国独占资本不容许日商、日船来华贸易，尤其不愿高价的美煤、盐为低价的中国煤、盐所代替，而失去其控制日本市场的独占力。故你们所考虑的，如为日船、日商不易来华，或东北口岸目前不允许日船、日商进口，则可以经过华商、英商或其他外商间接进行，出口货品亦可不标明输出何地。若仅仅因为顾虑中国政治原因，则此顾虑已不存在。你们除与华商、英商接洽外，仍可与日商直接接洽。万一日船不便至东北，亦可至秦皇岛卸货，以利我打通对日贸易和交通关系。如何，望再告。

中 央

已冬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并经毛泽东修改。

附：东北局关于对日贸易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并中财部：

英商行和洋行及一些中国商人愿意经平向日本做贸易，其办法是采用私人经营方式，向我们购买大豆、食盐、苦土输出日本，而从日本购入纺织器材、钢及棉花（美棉）。我们的意见：

（一）这些贸易只经中国商人或英商去做，不与日人直接贸易。同时不许日轮、日人到东北。

（二）做时仍须秘密。一切文件不能写明输出日本地方。

（三）大豆、食盐都可以输出，而输入只限于上述的必须器材。

是否可行，请电复。

东 北 局

辰有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 傅泾波赴美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

市委外辰世电悉。

(一) 青岛美军舰队确已退走，国民党匪军已东撤完，我军冬或江日可入青市。

(二) 司徒二周后去沪，可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但我应予以保护；如彼欲乘美运输机飞沪，即须规定该机降落上海飞机场后，不容再来南京，专门留沪等待司徒第二次赴沪时乘坐回国。

(三) 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

(四) 对美运输机事，可与司徒回国连在一起解决；如司徒不乘该机赴沪，可留在南京等司徒飞美。

(五)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

* 这个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六）黄华可向司徒或傅泾波透露个人看法，新政协可能在占领广州后召开，不要说很快召开的话。

中 央

已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陈 云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委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

* 这是陈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整个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大纲草案，我不一一介绍了，这里只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是组织机构问题。财经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¹⁾，下属十三个处、行、署、部、会⁽²⁾。有些事情还没有定。如盐务暂属财政，还有渔业、烟酒属哪里需要进一步考虑。工业部门分得比较多。在中国，过去曾经笼统叫过农工商部，后来分成交通部、实业部或工商部。现在除了铁道、交通之外，又分了燃料、金属、纺织及其他工业四个处。分得细的原因是在各有专职，这是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六局、十三处是否一天就建立起来？全国性计划是不是可以一天弄成？不成，要逐步地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工作则是要一步一步地做。

其次，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而大纲的最后，仍把地方经济放在必要的地位，各大区、各省及各大城市都有财经委员会，这岂非矛盾？我们的回答是，有矛盾，但因为现在是军事时期，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集中统一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比如火车现在已经统一管理。又如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事业不能集中或不能过分集中。最大

的问题是，三百多万军队有二百多万在前方，给养能不能由后方统一供给？不能。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比如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匹布做衣服，三百万人就要三百万匹布，只能由前方解决。这些事带有很大的地方性。野战军吃、穿、工作、打仗一起搞，这需要统一，但不能过分集中。这一段时间还不会很短。要等打完仗，交通恢复以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地解决。有些事中央现在管不了，只能让地方先管着。比如招商局，现在由陈毅他们管，中央一时管不到，先托他们管，所有权属中央，将来需要时，一个命令，全部由中央接过来就是了。

总之，这个财经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工作要慢慢地来，地方机构还保留相当的地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事务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和秘书处。

〔2〕指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业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和中央水利委员会。

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刘 少 奇

陈云同志方才讲到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以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是分散的。最初有几十个根据地，等于几十个国家，每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税收、银行、票子、工商业等。如五台山与太行山这两个地方，十多年都是各自为政，石家庄打下来了以后，两地做生意碰了头，但是票子不过铁路，彼此货物流通都要抽税。那时这边涨价，那边落价，有几千个工作人员在彼此斗争，而且双方都是共产党员。这问题不解决老百姓怨声载道。现在平津与东北不好做生意，就因为税收和票子的问题不统一。天津和上海与外洋都通了电信，但是和沈阳与石家庄却不通。在进出口方面，各地区彼此竞争。山东、华北、东北各地都与香港做生意，但却彼此竞争买西

* 这是刘少奇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药、军用器材；出口方面也是一样，大家都想出口，彼此压低了价钱。工业上也存在着割裂状态。例如山东缺少的东西，天津工厂却多得卖不掉；又如天津生产了很多电线，而东北却缺乏电线，彼此间是隔绝状态。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这就需要总的统帅机构。

本来想等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来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机构，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使从现在就着手进行，到联合政府成立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办理。如果把不可能或者不需要统一的，硬统在一起，事情就会搞糟。只能按照有需要而且有可能的，初步由中央接管，如把所有的都由中央管，那就不行。我们在管理上是多设部门。如纺织业，单是宋子文的中纺公司所有的人员，就比现在我们中央的任何一个部的人员都要多，再加上丝毛麻等私人纺织业，总共有几十万人，需要一个部门来管。五金方面，本溪、鞍山、石景山、太原等地现有的钢铁业已经不少，再加各地的兵工厂，集中起来也要一个部门管。燃料方面，煤、油据说甘肃方面规模已经不小，各地国营煤矿也相当多，再加上其他动力燃料，事情也很多，需要一个部门管。除财政外，商业对国内外贸易，生意很大，现有的贸易公司，任务重，所以商业另设一个部门管。中央政府多设几个部门，地方上也多设一些，省政府不仅有建设厅，还可以有农业厅、商业厅等等。目前，军事时期大体上成为过去，建设事业成为全国各党派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主要的事。因此需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并使之健全和加强起来，以便工作更有成效。

政策问题是全国各地统一。先掌握政策，进而管理一些事务。大部分事务由地方管，政策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提

出了四面八方政策，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总的方针是这样，但仅有这个还不够，要把这方针贯彻下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最近我到天津去了一次，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会上讲过，今天不妨再讲一下。

在天津时，我和大的厂长、经理接触过，也和工作干部谈过话，后来也召集过几十个人至一百多人的会，发现干部们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够；而产业界（也就是资本家）方面也有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多，例如天津的资本家不喜欢人家叫他们“资本家”，对他们的心情，连我在内，都不了解。天津的负责人很少与产业界接触，彼此隔阂不了解。

天津产业界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是对贸易局不放心，怀疑有了贸易局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做生意。他们认为贸易局和他们抢生意做，既统制了原料，又统制了市场。他们害怕统制。李烛尘先生要到山东临清去销盐，事前问我们好不好？我们的工作同志说：“好”！他就去了，但我们在那里的贸易公司，一看这人是来做生意的，是资本家，于是把盐价一跌，李就亏了本，回来一肚子火。他说，现在的乡村跟以前不同，你们在那里有组织，买卖不好做。所以他下了结论：有贸易公司不能做生意。唐山刚解放，我们贸易公司的同志是懂情况的，他们和启新洋灰厂订了半年合同，和华新纱厂订了八个月合同。起先资本家很高兴，因为刚解放就做开买卖，解决存货滞销问题。但到天津一解放，洋灰、纱都涨价，资本家觉得太吃亏，又不高兴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一方面是他们担心我们抢他们的生意。

另一个问题是税收。启新厂的洋灰卖给我们，按照合同价是四千元一吨卖的，但市价是一万三，政府去抽税，说市价是一万三，于是照一万三的价格抽税。华新纱厂也是这样，卖价

比市价低，抽税却照市价。他们对税收问题很担心，这一项搞不好，他们的积极性也提不起来。

最要紧的问题是劳资关系。我去天津这一时期，还相当紧张，这是由于工人自发行动的结果，在有我们工作人员的地方还好一些，因为这些人共产党员，懂得劳资两利的政策；没有工作人员的地方就差一些。工人知道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因此闹翻身：要提高工资，失业的工人要上工，在工作上不听指挥。解放前，小厂的工人生活一向很苦，除在厂里吃饭外，工资只合二十多斤米，现在要增加工资，有的竟提高到四五倍。有的已失业好几年的工人也要上工。工厂里工人学马克思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他们摸不着底，对失业工人要求上工以及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心里是不赞成，但嘴上又不敢说。只要是工人代表一到他们那里，他们心里就害怕。工人问资方的意见，他们总是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工人提出什么要求，资本家都赞成：不应上工的也上了工，不应加工资的也加了。工人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工会也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其实资本家心里并不愿意。这种不抵抗主义，是消极心理，打算反正垮台完事。

除了劳资关系之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李烛尘先生讲，毛主席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谈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时，只说：一是国家经济；二是合作经济；三是中小资本主义经济。他说，毛主席在这里只提到中小资本家，没有讲大资本家。他觉得自己是大资本家，因此没有他的份儿。有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算大，也是中等。他说：今天不大，明天就大。因此，担心他的发展前途。这个问题产业界很关心。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要在哪天哪年搞？怎样搞？这些问题他们感

到摸不着底，只看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仍觉得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摸不着底。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资本家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敢做生意。

天津解放后，有二三个月没人去理会产业界，有些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愿意和资本家接触；有些共产党员怕说自己立场不稳，故意避开他们，资本家就更害怕。恰巧，还有上面这些问题，资本家不太放心，尤其是比较大一些的资本家更不放心。有一次，新华社解答公私兼顾的问题，说对私人资本有四种限制，就是：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条件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并说不要限制得窒息至死。资本家一看，配合实际情形一想，更觉得不得了，窒息不至死大概也是活不了：税收政策如启新、华新征得过重，价格政策大概就像临清贸易公司压低价格和李烛尘先生抢生意，活动范围也就是这样，劳动条件不外是过高工资等等。他们认为在《天津日报》登载着新华社的这一答复，表明中央的政策是如此。我去时，已经有人准备收场，或者是吃完了算数。他们准备逃走，对隐藏的财产也早就安排好了。例如东亚毛织厂的一部分资金早已逃到香港。要他们把这些隐藏的资金投入生产，不让他们摸到我们的底是不行的。

我去，他们要摸我的底。他们说，你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我说：“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共产党员在工作时，先要把底给他，不要等他来摸。他不放心，工厂生产搞不好，工人失业，社会不安定。天津解放二三个月，我们不但没有消除同他们的隔阂，而且隔阂更加深了，不把这点搞通是不行的，是很大的危机。李烛尘先生卖盐的事，我说临清贸易公司的做法不好，要他再去销盐，保证不跌价。整个的原料市场共同分配。有些原料还要进口，如东亚公司希望要澳洲羊毛，而我们

的贸易公司不想进口，如果真不进口，他们的工厂只好不开。原料市场要适当的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我说资本家分不清，他们老是为分不清而打仗。但是我们可以分配一下，决不至于打仗。天津一家私营纱厂，收购的棉花比贸易公司的还要多，能保证几个月用不完。我说，你们别高兴，以后乡村里组织好，你们一点也收不着。原料还是大家分，彼此都不够，都分一点。至于税收政策及启新、华新两公司合同的事，我说，卖价比市价低却按市价抽税的做法不好，并说你们提出修改意见吧！第二天又让贸易公司的同志主动地找他们解决。目前税收是照国民党税率收的，收得相当好，收入八亿多元，开支只四亿，收入超出开销一倍多。我问他们，过去缴国民党的税不说重，现在为什么说重？他们说，国民党的税可以多缴，也可以少缴，国民党的人员贪污，给他们一些贿赂就可以少缴，你们的同志不贪污，少缴一点也不行。我说，税收可以改，国民党的税不合理，你们提出意见来。不过农民负担很重，要参军、缴公粮、出民伕、还要代耕。城里人只出一些钱，要对得起农民，负担要重一些，但不能重到赔本，赔本就是过重，过重就不行，还是勉为其难。至于工人不守厂规，我说，你们可以重拟一个厂规，叫工人看看，让政府批准，政府批准了，然后按章程办事。现在公司法因为《六法全书》废除也不存在。还有些公司因为有一些官僚资本而害怕又不敢直接了当地说，这些股份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到三十。因为北平自来水公司有百分之二十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接收，而引起他们的害怕。开滦煤矿有交通银行百分之二十的股票，也有些害怕。我说，公司法你们可以草拟一个，我们看一下，在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先颁布一个临时条例执行。

关于劳资两利问题。我说，有些工厂工资增加太多，这不

行，要与工人商量，把工厂经济公开，说明这样做要亏本，这是要求过高。有些要求是不适当，如要求资本家一定要用多少个工人等等。我要天津也拟一个处理劳资问题的临时办法。资本家感觉这种态度不错，至少是合作的，是照顾他们困难的。后来天津工人开代表大会，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工资过高不行。过高怎么办？降低，而且要自己降，不降不行，否则吃完了怎么办？！我是共产党的人，目前不但不主张给你们增加工资，而且有的还要降，你们一定不高兴。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高兴，我的话要说到，不说不够朋友。要不，到那时工厂关门，你们无论是找工会，或者是找人民政府都没有办法。有工人说，工会、政府都不管也不怕，自己可以开合作社。但是这方面我有几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不行。从大革命到江西闹土地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在太行山，工人自己搞合作社，结果还不是关门？土改时接收了地主工商业，变为合作社，也还是搞不好，结果还是把机器拆散了，破坏了生产力。所以后来就禁止工人、工会接收工厂，同时也不准厂方把工厂交给工人。总之，高工资不行。为了工人不失业，只好降低工资。工资少吃不饱，但可以吃个半饱，这总比失业好。那天我对工人的讲话，同时向全市广播，资本家都留心听，一听是真的，认为这就是底，有了底就算确实了。

在理论问题上，他们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剥削者和资本家名称问题。他们问这两个名词能不能改？我说，改也好，但是怎么改？他们想了一阵，还查了希腊字典，也没找出个适当的字。启新厂的周经理比较开明，他承认剥削，但他说由于剥削，一个启新厂发展了一个华新厂，后来又发展了一个大冶水泥厂。照发展生产看来，还应该办第四个厂，但是厂愈多，剥削也愈多，剥削是罪恶，罪恶也愈大，

将来的结果还不是买了个枪毙！总之，他觉得将来没有前途。李烛尘先生不承认剥削，说生产是社会的，主张三三制：员工红利占三分之一，公积金占三分之一，股息占三分之一，或是把股票分给工人。他是想逃避剥削者这个名词。这名词对他们是个大负担。我说，名词改也好，不改也好，改成好听的名词我也赞成，但剥削是客观现实。宋棨卿经理说他们公司没有资本家，东亚公司有一万股，经理是雇用的，所以他也要求参加工会。有一次，工人在开会，他这位经理跑去了，工人不好意思拒绝他，工会主席在会上宣布，经理是来宾，并表示欢迎。他一想：自己是经理怎么算是来宾，因此很伤心。他又问，只有几百元的股东算不算资本家？我说，社会生产当然没问题，一切生产是社会性的。只要有了商品经济，连小生产者的生产产品也都是社会生产。但问题是占有却属于私人的，如房屋、机器这些生产手段都是私人占有。社会主义是将这些私人占有的生产手段变为社会所有。现在你们占有了房屋、机器，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归你们所有，不管是赚了多少钱，分红是三分之一也好，还是四分之一也好，剥削是客观存在。不管是有一万股东或者是更多的股东，你是经理，是股东的总代表，对股东负责，有义务也有职责把股息分给股东，你还不是剥削者？问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剥削，而是那种社会制度决定了你不剥削别人就是被人剥削。你们剥削工人，四大家族⁽¹⁾和帝国主义又剥削你们。所以你们是双重身份。就因为你们反帝反封建，我们才可以和你们联合，所以你们也是革命的朋友。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我们把你们放在朋友中，没有放在敌人中。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周叔弢先生说剥削是罪恶，你们也说有罪。我说既有罪也有功。失业工人请求复工就是希望你们剥削一下，东业公司现在有一千多工人，如有两

千多好不好？好！工人好，社会也好，你们好，共产党也好，不要说两千，有两万多工人更好。周先生打算办第四个厂，如果能办五、六、七、八个厂更好。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你们是进步势力，才是革命的朋友，有功劳，但剥削还是剥削。共产党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有它一定的功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就明白地说资产阶级有它历史上的功绩，“资产阶级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只要有私人资本存在，即使三分之一算作红利还是剥削。我这么一讲，他们觉得也合理。

二是社会主义问题。首先对于限制政策，他们有好些人厌恶。我说，限制有什么不好？贸易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总要有些限制。如李先生要求我们限制临清盐不跌价，贸易公司的盐不跌价，你也要不跌价。又如北平的肥皂太多，要求政府指导，这还不是要限制肥皂厂发展。所以限制是保障生产。“公私兼顾”是限制政策。我们的口号是“先公后私”。双方照顾是相互限制。“劳资两利”是要两利。税收问题，是你们限我们一下，我们也要限你们一下。活动范围现在除投机资本及铁路外，并没有什么限制，连轮船你们也可以搞。现在是自由发展，将来要限制。今天因为肥皂厂太多要限制；假如明天毛织厂太多，是不是也要限制一下？！新华社所讲的对私人资本四项限制的意思也就是如此。毛主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文告是一九四七年写的，他在文告中只说到中小资产阶级，但并没有说不准中小资产阶级变大。你们说变大了就不行，这是你们自己加的。

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公开声明一定要搞。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走帝国主义的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假如你们找到

第三条更好的路，我们共产党一定拥护你们。走帝国主义的路，你们不赞成，那么你们也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现在是没有工业，专门搞工业，将来货物太多就成问题。货物太多也是两条路：一是关门，这条路工人不欢迎，人民不愿意，你们也不愿意；一是抢市场与原料，希特勒还抢不到市场，你们的本事大概比他要差一些。既然不想搞帝国主义，现在就要想办法，现在不想到那时就没有办法了。想黄河不流进渤海，到山东设闸不行，要从青海起就设闸，一开始就给以限制，最后才能使黄河不流入渤海。现在给你们一些限制，最后就可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这一讲，他们比较了解了。

他们又问我社会主义怎么搞？我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他们一定要我讲。我说，社会主义是要没收私人工厂的。马克思说这是革命，毛主席说这可以和平达到。要和平达到现在就要设闸，慢慢地去做。可是怎样和平法？很难讲。我给他们打了一个比方：如你们东亚毛织厂宋棐卿经理管得好，比我们进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生产力高，一个工人的生产力大于一个国家工厂工人的生产力，一个银行职员抵得上我们二三个，如果我们把国家工人生产力提到这么高，不也是进步？！你们技术上行，战术上行，但战略上不行，而我们正相反，这就应该向你们学习。如果经过二十年，一个东亚厂发展成八个，这够你搞的吧！也许二十年后这些厂收归国有，只要你不反对，你宋棐卿先生有本事，还请你当厂长。那时工厂更多，你本事大，八个工厂不够再加八个，

十六个厂你干不干？他说：那为什么不干？我说，干，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愿交给你干。他问：我的股东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股东来了。我说，这些产业有代价地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还退不完，号召一下，像乡村中有人献地那样，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四年也都可以。那时情形也不同，工厂多，职业多，不靠股息一样过活，而且资金多，股息也低。即使工厂不收归国有，生产过剩，也得关门，结果也还是交给国家。到那时，这样做才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也许这是一步步地搞，慢慢地分多少年走，反正用不着急，一切都可以迁就，只有“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牺牲。你们要摸底，这就是底。那时，大家觉得要收归国有就收，大家觉得要慢一些就慢一些。慢，你们就觉得不痛，不痛就不反对，不反对就对大家有利。有的人心里不愿意，只要口头上不反对，那也没有什么，只要没有反抗的行动就不要紧。对坚决反对而且有反抗行动的人，才送进监牢。所以我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

以上所谈的是两个原则问题，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如加入工会问题，资本家是不能加入的，工人开会，经理来了当作来宾，这很客气，很好。有人说工人讲话不好听。我说，你们是有身份的，今天工人也有身份，大家都有身份才好。过去你们骂工人，今天工人骂你们，当然这也不太好，我们也不赞成。但是你们自高自大，这也不行，要放下架子，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要讲平等，这点连美国式的民主也赞成。

关于劳资问题，我在职工会上就是这样说的：今天资方是朋友，要联合他们。但下面还有一句是：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他们害怕这句话。我就是这样讲的。我对他们说，劳资是

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不能调和，只能缓和。工人对你们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们也一样向工人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样才能“劳资两利”。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当的”，过火就不行。工人代表来，你们向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态度就不对，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而且斗争都是你们先开始斗的。宋斐卿的工厂里有一个女工，劳动很强，宋非常喜欢她。一次，这女工病了，送到医院里去，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厂里打算赶她走。女工写了篇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工厂里就不敢赶她。我说，这是斗争，是你向她斗争，她也向你斗争。这种有病的工人一二个厂里还可以养得住，如果有几十个人怎么办？但工人被赶也没法生活，不行。这是生死斗争。如果你们还像上面讲的那样对工人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将来工厂搞垮了，共产党不负责任。但斗争是要合法地进行，打、骂等不行。有一个厂工人要求在“五一”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厂方不敢拒绝，也不想发，就去问工会。总工会说：不要发，你发了，别的厂也要求发怎么办？总工会给他撑了腰。结果厂方对工人说：“我们本来想发，总工会不叫我们发。”这是狡猾的斗争，是不合法的。以后国家设劳动局，缓和一些斗争。

这么一讲，资本家由消极变为积极，隐藏的资金也拿出来了。天津国家工厂员工有七八万个，私营的还超过八万，私人企业不积极起来不行。一旦他们动起来，国家工厂一定有许多办他们不赢。天津大小工商业有四万家，这些私人企业在生产方面是无政府状态的，有它的破坏性，但不积极更不得了。资本家原来不放心共产党，但我们把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推翻的时候，他们是又惊又喜。我说，共产党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把大门的钥匙拿在手里，现在门打开了，你们好办工厂。现

在有些事资本家还摸不清。例如东亚公司就有北伐以前湖北督军王镇平的资本，他们还怕我们大搞。但我说，只要有利于国民生计的就不没收，你办总比我办好吧！

如果能解决困难，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把前途说清楚，资方就安定，而他们生产一积极，工人也安定，这是走向社会建设必要的条件。现在财政经济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弄好不行。一个天津有几万家工商业，连员工家属就有好几十万人，这许多人不安定，社会也没法安定，一个天津弄不好，整个中国也没办法。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注 释

- (1) 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中共中央关于使人民币在新解放区 占领阵地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一) 华东财委六月四日电及上海市委六月五日电均悉。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四亿元即已兑完。上海市场上流通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乃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完全垮台之下造成的。又据谭政、陶铸二日电武汉银元亦甚猖獗。这样在我们新解放区的金融上面就发生了新的情况：

(甲) 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乙) 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

* 这个指示是陈云起草的。

上述两点所产生的结果是：沪汉两地银元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估计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亦会有相同情况。因此，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五日电意见及华东财委四日电所提出的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六项办法⁽¹⁾。（另电转发各地）

（二）但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我们除同意上海市委及华东财委所提的六项办法外，尚有下列各点，请加研究，并提出意见：

（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

（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但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摊派公债。

（丁）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

（戊）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如果沪汉地区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之物价会促起老区更猛烈的物价上涨。此点亦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

中 央

六月八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华东财委提出的六项办法是：一、在报纸、座谈会及群众会上公布我们对银元的态度，进行思想动员，警告投机者。二、集中三千五百万银元，乘高价在黑市抛出，两三天内逐渐压低银元价格。三、京、沪、杭、芜各大中小城市市面禁止银元流通。四、禁令公布后，群众、军警立即全面出动，镇压银元贩子，对银元大投机家，择一给以严厉的处分。五、银元举行折实存款，并收兑银元。六、贸易处抛售各种实物（油盐、粮煤和工业品）吸收人民币，但又适当收购工业品，使物价不致过分下跌，仍能稳步上升。

中共中央关于布置抽调 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

依照目前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今年内除实现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九省外，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以上七省，除青、宁为小省外，粤、桂、川、滇、黔五省如第一步只占领其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则总共所需筹派干部约计三万八千人。根据中央宸陷所指示的筹派原则，兹作如下布置：

(一) 西北宁、青两省及甘肃部分地区，大约需要准备五千个干部。原来决定派往西南的三千老干部，除抽出一千（县级以上干部约二百人）给四川外，其余两千留西北本身调用。另从华北局抽调三千个经过初步训练的大中学生给西北。

(二) 川、黔两省大约需要一万六千个干部，主要由华东局负责照下述办法解决：（甲）现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冷楚队约三千老干部全部交二野。（乙）二野用在南京市的三千个干部可抽出一部去川、黔，具体数目由华东局商定。（丙）从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抽出一部分工人、职员及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连同（乙）项共应调足二千人（县级以上干部约三百人）。（丁）从京、沪一带招收训练六千个工人、职员及大中学

生成分的新干部。

其次，由各中央局负责解决一部分：山东分局抽调二百个县级以上的老干部，一千个新干部；华北局（包括中直）抽调五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四百人），一千个新干部；东北局抽调一百个县级以上老干部；西北局抽调一千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约二百）；华中局将现在中原的川干队三百余人抽回四川，其余不足之数由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

（三）粤、桂、滇三省约需干部一万七千人，由以下几方面负责筹派：（甲）原派华中之李楚离队两千九百人（两千二百老的和七百新的），现在不要分散，应全部用于上述三省；另由华中各省抽调七百老干部；武汉训练三千新干部；再从南下工作团的一万及华北局补充武光队的两千学生中抽调四千人。（乙）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丙）由东北局调派四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二百人）。华北局调派三百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一百人）。（丁）其余不足之数由四野部队干部中（包括两广纵队）抽调。

（四）各地在调派干部时，应尽可能抽选粤、桂、滇、川、黔各省籍的干部（不带孩子、身体较好的女干部亦应注意抽调）。凡熟悉各该省情形而又能抽出者，均应抽出派回。

（五）上次五万三千干部的抽调，各地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老区一般县区干部均已削弱，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因此，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并注意在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区域后，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大量召集训练培养并团结本地干部，以便逐渐推广占领区。

（六）对于工人、职员及大中学生的招收、训练工作，各

局应即着手加紧办理，争取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训练时间。

(七) 所有老干部一般的应着重从城市中或地委以上高级机关中征调，勿使县区干部再形削弱。并限于七月底征调齐全，分别集中在各中央局或分局进行训练，听候调用。

(八) 各中央局、分局接到本指示后，应即召集会议连同中央宸陷指示合并讨论，定出具体计划，并报告我们。

中 央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军委关于注意研究夺取台湾 问题给粟裕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粟张周⁽¹⁾、并告华东局：

(一) 元辰电悉。同意十兵团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二)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军 委

六月十四日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刊印。

注 释

(1) 指张震、周骏鸣。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

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

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群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

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么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兹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如下：

第一，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甲) 制法：

(一) 旗面为红地，长方形，横直为五比四。旗杆套用白色，宽为旗面横长的十六分之一。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螺旋纹，上置黄色矛头。

(二) 由旗面的中心点向上下划一垂直中线，向左右划一水平中线，将旗面分为四个面积相等的长方格。

(三) 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位于上方近旗杆之长方格内。

(四) 将该长方格上下划十六等分，左右划二十等分，在上下八比八、左右六比十四处，定一点为圆心，以四等分长度为半径作一圆，用直线将该圆周的五等分点联成一五角星，星的上角顶点在圆心垂直正上方。

（五）“八一”用汉字，每笔均系等边长条体。旗杆在左时，该二字置于五角星的右下方，并由左向右横写。旗杆在右时，则该二字应位于五角星的左下方，并由右向左横写。

（六）“八”字每笔长三等分，宽一等分，置于一小长方格内。该小长方格的上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七等分，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四等分，左边（如旗杆在右则为右边）为由五角星之右上角尖（或左上角尖）向下所作之垂直线，右边（或左边）距垂直中线向左（或右）四点五等分。“八”字两笔的外侧六个直角尖端应紧接该小长方格的相当各边，内侧两个直角尖端相距约半等分。“一”字长为四等分，宽为一等分，该字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五等分，右边（或左边）即在垂直中线上。

（乙）各级军旗尺寸如下：

（一）人民解放军总部 横一七〇公分 直一三六公分

（二）野战军（一级军区同）及兵团（二级军区同） 横一六五公分 直一三二公分

（三）军（三级军区同） 横一六〇公分 直一二八公分

（四）师（军分区同） 横一五五公分 直一二四公分

（五）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同） 横一五〇公分 直一二〇公分

第二，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甲）军徽用作帽花时，其制法及尺寸如下：

（一）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十五公厘（略作二公厘高之凸形）每个角均为三十六度，外镶一点五公厘宽之金黄色边。

（二）“八一”为宋体汉字，适当地直置于红星内。

(乙) 军徽用于臂章、奖状、文书、车、船、飞机及建筑等物时，则按照上述尺寸比例放大或缩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公历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刊印。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

根据上项原则，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一九四八年“五一”口号第五项之下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组成之。

- (1) 中国共产党；
-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3) 中国民主同盟；
- (4) 民主建国会；
- (5) 无党派民主人士；
- (6) 中国民主促进会；
- (7) 中国农工民主党；

- (8) 中国人民救国会；
- (9)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 (10)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 (11) 中国致公党；
-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
- (13) 中华全国总工会；
- (14) 解放区农民团体；
- (15) 产业界民主人士；
- (16) 文化界民主人士；
- (17) 民主教授；
- (18)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
- (19)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 (20)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 (21)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 (22) 国内少数民族；
- (23)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第二条 前条各单位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筹备代表为四人至七人，其确定名额按各单位情况协商定之。各单位筹备代表之人选，由各本单位提出，经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单位协商通过，其前条第五、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各单位之筹备代表，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其他各单位共同推定之。

第三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负责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之一切筹备事宜，其中心任务为：

- (1) 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和代表；
- (2) 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时间、地点及议程；
- (3) 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

(4) 制定共同纲领草案；

(5) 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第四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设常务委员二十一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由各单位协商推举之。

常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五人，由常务委员会选出，主持常务委员会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常务委员会及主任副主任进行工作，其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决定之。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下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其组织及人选由秘书长提请常务委员会决定之。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得按工作需要，设立各种小组，并由常务委员会指定各小组组长副组长。

第八条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开会须有参加单位半数以上之出席。表决时，每单位不论其人数多少，均为一权。一般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执行，但对有关基本方针之决议，如第三条第三、第四和第五各款，经多数通过仍有不同意者，有保留至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重新提出、或不签名、或退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之自由。

第九条 本条例经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实施。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与各国通邮通航 问题给上海市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

上海市委并华东局：

(一) 市委虞电悉。同意你们主张先从上海与华盛顿交换邮件包裹。但请你们研究通邮后可能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电告。

(二) 海口被封，海航暂停，请你们考虑照海航规律，我们暂以上海为国际空航起落点，向各国作不损害主权的开放，但不能在中国境内转航（即不能由上海再飞天津或其他城市），并且只做临时协定，不订长期合同。如此做法，有无流弊，外国航空公司是否愿来接洽，均望以你们考虑结果电告。

中 央

已 籀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 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定为下列四十五个单位，代表总额五百一十名。

(甲) 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

1. 中国共产党十六人
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十六人
3. 中国民主同盟十六人
4. 民主建国会十二人
5. 无党派民主人士十人
6. 中国民主促进会八人
7. 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人
8. 中国人民救国会十人
9.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十人
10.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八人
11. 中国致公党六人
12. 九三学社五人
13.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五人
14.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十人

(乙) 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

1. 西北解放区十五人
2. 华北解放区十五人
3. 华东解放区十五人
4. 东北解放区十五人
5. 华中解放区十五人
6. 华南解放区八人
7. 内蒙古自治区六人
8. 北平天津两直属市六人
9. 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七人

(丙) 军队代表六十人:

1. 人民解放军总部 (包含直属兵团及海、空军) 十二人
2.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人
3. 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人
4. 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人
5.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人
6. 华南人民解放军八人

(丁) 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人
2. 各解放区农民团体十六人
3.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十五人
4.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十二人
5.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九人
6. 全国工商界十五人
7. 上海各人民团体九人
8.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十五人
9. 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推举十五人
10. 全国教育界十五人

11. 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十五人
12.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推举十二人
13. 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十人
14. 国内少数民族十人
15.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十五人
16. 宗教界民主人士七人

二、前条所列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十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二人，不满十人者，得推候补代表一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三、除第一条所列之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

四、各单位代表名单除因特殊情形经常务委员会同意者外须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五、本规定之实施办法，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李 维 汉

第一小组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就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与各单位代表名额起草一个规定的办法，提到大会上

通过。

从去年冬季的时候，中共中央曾与到达东北的各位先生商议过一个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意见。在那个意见上，曾经是这样的设想，将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是三十九个，并且对每一个单位代表名额做了一个原则的拟定，即四至六名。这一个拟定，因为是在当时情况下提出的。提出以后，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广大的国土及许多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半年期间，许多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如去年的总工会，今年的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都召开了正式的会议；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在这个月也要召开（代表都到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已经成立了；科学工作者会议筹备会现在也已宣布成立了；社会科学和教育工作者会议正在这里酝酿发起；工商界联合会筹备会也可能在最近成立。这就是说，因为广大地区的解放，使许多全国性的团体有了成立的条件，所以就先后成立了，或者发起了，或者成立了筹备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名额应该重新考虑，就是应该比以前所拟定的单位要增多，名额也要增多，这样才能适应这个情况。

第一小组成立后，先后由各单位磋商，然后又拟出了一个草案，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全体组员一致通过了现在发下的这个草案。并且把这个草案送给各单位首席代表看过，又送给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各委员看过，得到了一致的协商。

草案第一项是规定单位同名额。总的单位是四十五个，代表总名额是五百一十人，里面包括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

第一项，关于单位的规定，要说明几件事：

党派单位方面增加了三个：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三个单位应该增加，周恩来同志在他报告筹备会组织条例的时候，已经说明了。

军队代表原是五个单位，现在增加了华南解放区（湖南、广西、广东的一部分，福建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地区的解放军在这几年做到了坚持游击战争，现在发展的很大，并建立了几个纵队，所以应该有代表。小组又提议增加北平、天津两个直属市的代表，因为将来北平、天津是首脑所在，应该有这两个地区的代表参加。原来拟议上，有文化界民主人士一个单位，现在因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就要召开，另外科学会筹备会已经成立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也要成立，所以将它化成三个单位。从前拟议中有妇女界民主人士这个单位，现在因为全国的妇女民主人士大多数都参加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所以小组认为妇女界民主人士这个单位不必要单独列入。由于以上之增减，所以就由三十九个单位变成了四十五个单位。

在小组工作的前后，曾经有代表提出了以下几个单位的问题：民社党革新派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单位列入，在原来拟议上是保留到筹备会。今年春季，中共中央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次研究与协商，认为民社党革新派在这几年的变化是经过一些曲折。经过这些曲折，经过几次分裂，现在的确在民社党革新派内部存在着民主分子，在这一个时期他们也是努力奋斗的。但是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到将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可以考虑个别邀请。还有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冯焕章先生在美国的时候领导的），这是一个海外团体，中国华侨在海外的民主团体很多（像南洋就很多），所以我们

小组大家一致向代表们提出这样的意见，即也作为个别邀请参加将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必作为一个单位。还有一个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这个团体据我们所知道的，里边的确是有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成分，特别是最近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对于这个团体，我们的意见也是不必作为一个单位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交筹备会常委会将来考虑，如有必要的话就个别邀请。

又提到工程师学会，因为现在的全国科学会中包括理、工、医、农四个主要科学部门，工程师学会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它的代表将来可以在全国科学会中产生，因此也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将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对于以上几个单位的问题，我们第一小组的意见，提出这样的处理。

此外，第一小组提议，除四十五个单位外，另设一个特邀请单位，为的吸收不能参与上述各单位的民主人士参加。这是关于单位与代表人数问题，我们考虑讨论的经过。

第二项，小组会提议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每个单位，可以规定提出候补代表，办法是：“其代表名额满十人或十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二人，其代表名额不足十人者，得推候补代表一人”。候补代表可以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

对于代表名额分配，是根据这样原则考虑的：考虑到将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规模，考虑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各单位的代表性。我们觉得应该在分配代表的时候强调“各单位的代表性”，而不强调“各单位的代表人数”。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原则，分配代表名额。

另外，我们也考虑到上述单位的相互关系，将来在全部代表中，可以由常务委员会考虑，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中间相互关系很多的，例如各党派方面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实际

在这里面还另外包含两个党。单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来讲是十六位代表，但是如果包含其他两个单位来讲，就是三十九位。民盟也是如此。民建与产业界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其性质相同，所以将来在分配代表名额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他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有团体与区域中也有交错关系，各人民团体与各解放区之间也有连带关系。所以在小组开会时，妇女联合会蔡畅同志提出一个希望，希望在全部代表中妇女代表能占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五。我们小组认为，她这个希望，如果从全部各单位的相互关系来看，各单位都考虑这一点的话，就可能实现。如果只是妇联，就很难做到。这种关系，在将来各单位推选代表时（候补代表都可考虑到），如果照顾整个的话，可以有某些调整。

第三项，是关于特别邀请单位将来怎样规定。我们小组会上曾考虑到是不是要在草案上明文规定特别邀请单位人数不要超过四十五个单位的代表总名额百分之五，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这样规定：“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及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现在大会不作具体规定为好，因为要考虑到将来要发生新的情况，今天没有设想邀请的，将来可能需要邀请，或者这时候设想将来要邀请的，将来也不一定邀请，所以现在若作一个具体规定，就不如授权常委会处理这些问题。

第四项，原来在我们小组上没有提出。在昨天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与各小组长的联席会上，认为应该加上这一项：各单位代表名单须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因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不会推得太迟，八九月就要开会。如果代表产生太迟，就不能参加会议了。所以提议各单位须在七月十五日以前把确定的代表名单向

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来。

第五项，这个规定虽然已经把主要的问题确定了，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是可能有许多细节，可能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所以应该作这样一个规定：“本规定的实施办法，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按照准备、人数等各种具体情况去考虑规定一些实施的办法，而在我们这个全体会议上不可能作更详细的规定。

第一小组向大会提出五项规定，请求大家讨论并通过。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
选编》（上）刊印。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 恩 来

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大家所从事的民主运动，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因此，有很多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能单枪匹马地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若形成一个组织，就要经过许多手续和挫折，那是很困难的。当然也有形成组织的，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这三个大的组织联系了许多组织，还有秘密组织。但是，也还有许多人一直是孤军奋斗的，比如今天在座的代表中就有：一直领导着一支文化大军的郭沫若先生，在国民党统治下受着严重压迫的马寅初先生、李达先生，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先生，在上海一直奋斗的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先生，等等。他们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奋斗的结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和允许在各党派以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参加旧政协。当然，由于当时跟国民党协商时不得不带有若干妥协性，所以在参加旧政协的人中

* 这是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也有不是为民主而奋斗的、由国民党方面邀请的几位“社会贤达”。这些人后来参加了伪国民大会，参加了伪国民政府。因此，大家一听到“社会贤达”这个名称就有不快之感，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就很痛恨这个名称。他在香港同各民主党派首先响应中共去年“五一”号召的时候，就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他是以参加民主运动的这样一个身份来领头响应的，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位这样的人参加了民主运动。在他们诸位到哈尔滨以后，中共跟他们电报磋商的时候，也觉得有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项为好。因为要承认这些不属于各民主党的先生们过去的确经过了长期奋斗，所以要请他们参加会议。当然，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一定要经过各方面的协商。

现在有一个分类问题，即把无党派民主人士摆在哪一类代表里为好的问题。就是说甲项里头是民主党派类的代表，把无党派也摆在党派里头，好像在文字逻辑上不大通，这就请大家来讨论。

回答文字逻辑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想到问题的本质。因为这一部分人士，也是长期参加民主政治活动的，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管是哪一个社会，总是大部分人反对一小部分反动派。这种反对反动派的一大群人的活动也就是政治活动。所以从广义上说，这就是一种党派性的活动，只不过有些民主人士没有党派的组织罢了。正确地写出来应该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当然，在座的诸位假使还要把它摆到其他类别里，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把政协委员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指党派性的；第二类是指区域性的，包括已解放了的地区和待解放的地区；第三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类是人民团体。从广义来说，第四类也还不仅是团体，比如海外华侨，

不一定是由团体选出的，而是由我们公推的。另外华侨还有地域的性质。不过如果把它摆在地域里面，好像我们的国家要发展到海外了，那就不好。所以还是把华侨摆在团体这一类为好。再如少数民族，凡是在已经解放的地区，现在已形成了政权组织或是自治区的，就摆在区域代表里面了。但是在没有被解放地区的少数民族团体和人士，就摆在团体或民主人士里面。这些分法是大体的分法，广义的分法。严格地说，每一类里面都可以再把它细分成多少小类，但这样做起来就比较不容易。目前这种分法是概括性的，是本着原来同各方面协议的精神来分的，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合适，请大家讨论。

关于特别邀请的代表就不同一些。这是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确定的。被邀请的人物当然总是在这一个时期有所表现的，如在人民解放大军胜利推进当中，对推翻反动政权、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等方面立过功的；或是目前我们认为需要特别邀请他来参加的一些人物。如：在上海主张和平、反对国民党内战，以后到石家庄谈判的颜惠庆先生、章士钊先生、江庸先生；对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功的傅作义将军、邓宝珊将军；这一次南京反动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到北平后极力赞成和平协商，最后赞成共同商定的和平条款即八条二十四款的张治中先生、邵力子先生，等等。这些人物都是考虑在邀请之列的。虽然这些先生并不属于过去的民主运动的人物，但是在这个时期中立了功，或有所表现，是值得我们邀请的。当然也不仅限于这几位。我们要从长计议，由常委会考虑协商，然后拿到全体会议上通过。所以，特邀的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面上好像可以作为一类，其实并不是一类。这些被邀请的人士，不一定是无党派的，如张治中先生、邵力子先生，你说他无党派行

吗？不能那么说。他们是另一种情况。将来邀请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情况，把他们摆在无党派是不合适的。整个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阵容是五百人左右，一部分特别邀请的人士增加到这个基本阵容里来，更可以增强团结性。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¹⁾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²⁾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 恩 来
一九四九、六、二十一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 (1) 指蒋介石。
- (2) 即邓颖超。

中共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的处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三十日)

—

南京市委并华东局：

市委已巧电⁽¹⁾悉。

(一) 司徒返美既在三四周后，可能仍将提出来平一行。陆志韦亦曾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

(二) 傅泾波提出有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持联络，应坚决回答没有，以堵塞其任何试探。傅泾波去美护照，即由南京市政府发给，样式托龚普生带上。

(三) 美机在离南京前可允其试飞一次，范围由军管会规定，其返美路线，亦宜规定之，并于事前通知我沿途部队以免误会。

中 央

已马

* 这两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二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已俭电⁽²⁾悉。

(一) 陆志韦给司徒信稿，曾由我同志交来一份，内容第一句只说见过周⁽³⁾，未提周告陆任何事。实际上六月十四五两日及其以前数日周均未遇见陆，更从未与陆谈司徒问题，如傅所携陆信为亲笔签字信，则陆为两面做法，故以假信给我。如傅所携陆信为抄件，则可能为傅故加数语，以抬高司徒身价。望告黄华再回忆陆信内容究如何，此间当将陆信译件另电告，以便对照后证明阴谋挑拨者究为陆抑为司徒及傅。

(二)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三)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保护，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会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中 央

已陷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南京市委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给中央并华东局的电报。电报报告了六月十八日傅泾波到外侨事务处与黄华谈话的内容：傅泾波称，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电报请示：一、傅泾波在谈话中没有再提司徒雷登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今后是否予以暗示，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二、傅泾波去美国护照是否由南京市政府发给。三、可否允许美国飞机离南京前试飞一次。

(2) 指中共南京市委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给中央并华东局的电报。电报说：六月二十七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访黄华，信的大意为：周恩来曾告陆志韦，毛泽东已宣布司徒雷登希望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之意。中共希望司徒雷登将燕京之行与交谈贸易及国际问题分开。黄华当即指出：为何中共方面得知司徒雷登欲北访燕京，系因月初其曾有过表示，但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其北上，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仍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泾波同意电告中共中央，但企图要中共方面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六月二十八日，黄华访司徒雷登及傅泾波时，告知中共中央“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说：因国会于七月底即将休会，时间上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虑决定。

(3) 指周恩来。

中共中央关于讨论 《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 《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两文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线委员会，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中的军师团委，地方上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

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执行情形望告。

中 央
六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附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短评）

毛主席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典礼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将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他们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均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阴谋，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暴露了出来。这是因为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公开的武装的斗争已经失败，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多地让位于隐蔽的斗争。在城市中，国民党匪帮在溃逃或被歼以前，便在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和帮助之下，预先有计划地布置好了潜伏的特务活动。解放以后，特务匪徒们便施放谣言，侦刺情报，组织

抢劫暗杀，扰乱社会治安；印制假钞，捣乱金融，歪曲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挑拨劳资纠纷，阻碍生产的迅速恢复；他们用纵火、爆炸和其他暗害方法，破坏国家的工厂、矿山、仓库及其各种设备和物资。沈阳的美国间谍案，北平国民党特务匪徒的纵火和暗杀暴行，以及中外破坏分子在上海所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捣乱工作，显示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匪帮，正在大规模地利用特务活动，对于人民民主统治进行反抗和破坏。在农村，尤其是解放不久的河南、安徽、湖北和江南广大农村，国民党匪帮正大批派遣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的恶霸分子，利用封建会门，组织土匪，烧杀淫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村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捣乱人民解放军后方。事实告诉我们：不彻底肃清这些特务匪徒，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毛主席所提出的另一重要任务，即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将不能顺利地实现。

当然，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匪帮要想以特务匪徒的捣乱破坏，来推翻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建立，那只是做梦。但如果我们轻视这些敌人，以为革命胜利，万事大吉，只要多喊几个“万岁”，就可安心睡觉，那就是极大的错误了。敌人虽然已经失败，但是还没有完全消灭。“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而且敌人越是接近死亡，便越是疯狂和残暴。如果我们不牢牢记住毛主席的告诫，放松警惕，那么我们会吃大亏，就会使人民民主祖国遭受许多可以避免的损失。过去若干地方特务匪徒之所以能够达到破坏的目的，正无一不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在政治上或多或少的麻痹所致。现在和将来，特别是目前新中国刚刚在建立的时机，敌人是一定会利用我们的困难，对人民的国家进行反抗和破坏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是否经常地保持戒

备状态，组织力量，和敌人的这种捣乱活动进行斗争。

无数的事实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教训，要求我们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和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各民主阶层的人民，高度警觉起来，共同展开除奸防特的斗争，扑灭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特务匪徒的阴谋活动，保卫人民的祖国。我们要采取坚决的而又谨慎的步骤，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来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捣乱。因此，一方面要克服骄傲自大，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捕风捉影，打草惊蛇。对于查获的特务匪徒，应按情节轻重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对那些被胁迫参加，真心悔过的分子，可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对那些作恶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发扬人民民主政权的威权，严加惩办，为民除害！

附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新华社短评）

最近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失火和被毁事件。以北平一地为例，不久以前电车厂曾被特务纵火焚毁电车五十余辆，五月二十五日又发生石景山钢铁厂化验室失火案，使国家财富遭受浩大损失。对于这样严重危害人民祖国的事件，决不应让它继续发生，而必须迅速地采取必要的步骤，予以根绝！

谁都知道，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的统治，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在人民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的时候，放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最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就是恢复

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勤劳努力，加上其他有利因素，这一近百年来许多优秀人士所怀抱的理想，是有把握在相当时期内实现的。但要建设工业，就必需有大量的资金。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从掠夺和剥削殖民地和其他原始积蓄的野蛮方法来取得它，只有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薄弱的产业基础，用双手辛勤地劳作，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因此，现有的国家财产，就是一柄铁锤，一个螺丝钉，对于我们都是十分宝贵的。如果我们不能严肃地负责保护自己人民祖国的财产，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将会受到绝大的困难。所以，对于所有一切国家财产，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地来爱护它。

检查各地工矿企业的被毁事件，主要地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匪帮和特务匪徒的破坏。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是从来不要祖国的，现在由于他们的统治已经灭亡，国家成为人民的了，便更加穷凶极恶地进行破坏和抢劫。他们知道，中国人民正在兢兢业业地从事恢复和发展生产，医治战争的创伤，建设国家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便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企图毁灭国家经济，使人民生活陷于绝境，从而动摇人民民主政权的统治。国民党匪帮在溃逃的时候，大肆洗劫和破坏许多城市和乡村；而在这些城市和乡村被解放后，又以预置的特务匪徒继续执行暗害勾当。北平电车厂电车的被纵火焚毁，便是特务匪徒们所做的千百种这种罪恶的暗害勾当之一。二是我们某些经济管理人员的对于国家财产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中间目前存在着一种极端有害的思想，就是仅仅知道贪污可耻，而对于自己玩忽职守、失于检点所招致的国家和人

民财产的巨大损失，则错误地认为偶然不慎，满不在乎。正因如此，所以在某些国家企业内部，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作风，管理组织和制度松弛，纪律弛废，防火安全设备不周，平时疏于防范检查，一旦发生事故，大则满足于检讨，小则根本不向上级报告。如果不向这种官僚主义恶习气作坚决的进攻，要想保护国家财产完全免于破坏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为了制止破坏，以便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经济，便必须：（一）在工人、职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中，经常地进行关于重视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使大家认识保护国家财产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在工厂企业内部开展反对浪费和破坏国家财产的思想斗争，坚决地打击那种对于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的错误态度。号召提高警惕，防止特务匪徒的破坏，组织工人纠察队，保卫工厂、矿山、森林、仓库。制订和实施奖惩办法，严明赏罚，保护国家财产者奖，损害国家财产者罚。（二）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经常地检查和改进工矿企业的管理、组织、制度、纪律、消防安全设备。如因怠于职守或管理不善，以致发生失火或其他灾害，其肇事者和主管人员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像这次华北人民政府和北平军管会在处理石景山钢铁厂化验室失火案中那样，严格追究责任，扣押追讯当事人，按情节轻重分别处治，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便不能严肃国家纪律，并教育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人员和广大职工，保障国家财产不受损害。（三）对于那些破坏国家工矿企业和人民财产的特务匪徒，务必缉获归案，对于首恶分子查有实据，便应施行严厉的镇压，使这辈宵小丑类不敢继续为非作恶。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北和川北部署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德怀同志：

二十六日电悉。(一)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南坊、通润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¹⁾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罗⁽²⁾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³⁾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

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给贺龙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

已感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附：彭德怀关于全歼胡、马军的 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

（一）十九兵团七月四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午齐开始向敌进攻。就现在敌人部署，青、宁两军集结于乾、永、邠、常宁镇、南坊镇、通润镇地区。胡、王部目前无变化。拟以十八兵团钳制王匪军，十九兵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匪主力，被歼后则以一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三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于十九兵团位置乾、礼、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二）二十五日开军师以上干部会，七月四日以军或兵团为单位开“七一”、“七七”纪念会，尽量动员居民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全歼胡、马匪军，克服困难，解放大西北。妥否，盼示。

彭 德 怀

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 指马步芳、马鸿逵。
- (2) 指林彪、罗荣桓。
- (3) 指刘伯承、邓小平。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

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入大同境界。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

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

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

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

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

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

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

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

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

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一九四九年六月)

刘 少 奇

一、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一部分地区已结束。没收官僚资本及改革土地制度一部分已完结，其余亦将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

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三、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大部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得多。但在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特权以后，我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地恢复和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应该怎样和采取什么路线去发展经济呢？

四、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

- (1) 国营经济；
- (2) 合作社经济；
- (3)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 (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 这是刘少奇写的党内报告的提纲。

(5) 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此外还有一些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

五、这五种经济成分中，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合作社经济今天还很少，但可以很快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少，但可能在一个颇大程度上去组织。国家经济则在接收全国官僚资本后，以及在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不过它可以使社会的经济命脉操在国家手中，而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

六、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将要决定中国将来的发展前途到底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抑或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

七、在前项基本矛盾的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而小商品经济及半自然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

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八、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如下：

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

九、我们从国民党政府及战犯手中可接收不少的大企业，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也将逐步收回或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剩下的私人资本的大企业，已经不多。铁路、银行、对外贸易、邮政、电报、大钢铁业、盐业、纸烟业和大部分矿山、轮船、纺织业等，将由国家经营或由国家监督经营。目前的问题是：（1）我们还没有制订完备的经济方针，还没有完备的经济计划；（2）我们的干部还不懂得管理经济，大批最好的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来学习经济；（3）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的经济机关，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国营经济常出现无

组织无政府状态，互相竞争，商人资本家则从中渔利。中央拟于最近发布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决议，建立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各省各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财政、工业、铁路、船运、邮电、农业、商业各部及国家总银行与各专业银行，并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建立国营、省营、县营、市营各企业间的正确关系。

十、我们在土地改革已完成的地区组织了许多劳动互助组。还拟普遍地组织消费合作社、农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及劳动互助组。要办学校训练干部，并建立全国性的合作社领导机关及合作银行。

十一、因为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有可能在颇大的范围采用，也很需要。其形式是租让、加工、定货等。现在已有少数加工、定货企业。

十二、依国家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发展的程度，适当地实行某些物品的配给制，以保证军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及学校学生的生活。对市场则采用调剂物价的政策，以与奸商作斗争。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以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

十三、很明显，苏联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有重大意义的。这种援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1）经验上的援助；

(2) 技术上的援助；(3) 资金上的援助。此外在物资方面似应实行某种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如果这种援助和互助是很大的，那就可能帮助中国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

十四、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是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家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反对上述两种倾向，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军委关于应极力争取程潜 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给林彪、 邓子恢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林邓，并王萧⁽¹⁾：

(一) 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²⁾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 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 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 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³⁾、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军 委

午支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王首道、萧劲光。

（2）指程潜一九四九年六月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湖南省工委派人将备忘录送到武汉，由王首道、萧劲光转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3）指蒋介石。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 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敬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一、中国的目前形势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已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底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的地区已有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二亿七千五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一千零四十三个，占全国二千个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五百五十九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在内，现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只有二十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三百九十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二百四十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

与机关学校，空军有七千五百人，海军七千七百人。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在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须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方能去占领。其中台湾，因为有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去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去占领新疆的最大的困难，是肃清与维持向新疆前进的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须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自可大为提早。

除开军事上的胜利而外，我们在政治上也已取得完全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面，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了。但由于中国的交通条件与自然条件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须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充分地加以估计了的，最近联共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现在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戒。但照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这种可能，而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扑灭与阻止中国革命，并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

对此已作了一些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是能给我们一些困难和损失的，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动全中国的人民及其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种干涉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应付得当的话，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是有可能不敢来尝试的。我们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实行武装干涉的口实，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增加困难。

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行封锁政策，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在开始实行。这能够给我们一些困难，特别在船舶和对外贸易方面将发生困难。但这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決定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则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期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管理与建设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八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

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二十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党员四十三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四十八人，中间人士四十三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十六人，在进步人士中有十五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在筹备委员会中另组织常务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同样可保障我党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将来参加新的政协会议的党派十四个，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地区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及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代表二百零六人，总共四十五个单位，五百一十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我们的了解如下：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专政的。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须要解释的。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及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所产生的。正如斯大林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

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們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今年二月安得列夫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方面也有指示要我们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一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指示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种伟大的进步，这是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在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十来个民主党派，它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其党员总共不到三万人，其中民主同盟有二万人，是比较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影响的。它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党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来，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在最近才断绝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只是勉强地和共产党一致。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

提出的一般纲领，它们都公开地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除开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而外，还没有最后地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欧洲国家所有的那种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比较有重要作用的，是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这些团体，有的已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发展会员中。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已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当能发生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开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并召开了妇女的、学生的、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的及各地方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及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迅速瓦解，其领导分子早已逃跑或消极了，其中较好的分子，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靠近我们。被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则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它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安得列夫同志今年二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员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一切城市中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在过去有很久的间断，今天还需要重新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不能进行

得很快。我们希望能有几个苏联有经验的同志去中国帮助这些工作。

三、关于外交问题

最近联共方面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受到失败以后，现在帝国主义正在用以下的方法来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与破坏中国革命；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四）用许多方法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接近，企图拉拢中共去与帝国主义国家靠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并且是有过经验的，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革命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方针已载入我们二中全会的决定。这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军队所到达的地方，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业已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与文化事业，依然存在，它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何种步骤和方法来加以处理？是值得考

虑的。

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几项原则来进行：

（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的情况，没有调查，据日本在一九三六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六国在华投资总额为十八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其中英国占十亿多，美国占二亿二千万，德国与意大利占二亿一千多万。铁路借款与政治借款占五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四亿五千多万，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三亿八千多万，经营工矿业的投资只有三亿六千多万。但在经过抗日战争以后，日本及德、意在华投资均被没收，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经济事业是：银行保险事业、进出口贸易事业、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有英国占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四百万吨）及上海与天津的英国烟厂和美国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工业，较占重要地位，其他事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事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但若干帝国主义者已将活动资金向外逃避，或采消极的观望的态度。在将来的何种时机并采用何种方法去处理帝国主义在

华的各项投资呢？没收呢？还是采取其他的方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决定。在目前，我们正忙于作战及其他工作，暂时还来不及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作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宣传文化事业，除开他们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与通讯社而外，据旧的调查材料所载，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有三十一所，神学院有三十二所，图书馆二十九所，文化团体二十六个，中学校三百二十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教会三千七百二十九所，宗教团体九十三个，医院一百四十七个，慈善机关五十三个。对外国原来的报纸杂志与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到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在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条件下继续办理，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堂的土地，则在教民同意之下予以没收分配。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待遇他们。这样执行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则到处向我们请求和钻营，企图取得我们事实上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作也没有作过的事。但这样作，各国侨民感觉不

方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地区的侨民约有十二万人，其中上海有六万五千多人，东北有五万四千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为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我们，或提出若干足以束缚我们手手的条件来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足以束缚我们手手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我们能够取得合法地位去进行国际活动呢？还是等一等，不急于去争取这些国家的承认，以便肃清内部，免得麻烦呢？在中国新政府成立以后，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是否能快些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不理我们的政策。

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后，予以承认。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关于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作了些解释，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面

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面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就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宣言。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的指示。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中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为增进与巩固两大民族的友谊而不懈地努力。

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

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不外以下三种：

（一）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

蒙古独立及苏联搬运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着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的时候，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关于苏联搬运机器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搬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用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作得对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

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空诸问题，我们希望能迅速地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

关于与东欧各新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

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与帮助，除开苏联派专家去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去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来苏联参与学习，派一些学生来苏联学习。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

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希望拜会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来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来拜会。他来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加以指示。

关于苏联贷予中国的三亿美元的借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项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以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 刘少奇

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私营企业中 劳资纠纷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市委，省委，区党委：

现在各地解决私营企业中劳资争议的办法，非常混乱。没有设立专管机关，没有规定一定的手续。甚至城市中的每个区委，街区政府，每个工作组，每个下层工会组织，都可以自由解决劳资纠纷。或者完全放任自流，让每个工厂、作坊、商店的职工，与每个企业主直接解决。以至互相影响，此落彼起，纠纷日益增多。这种处理劳资纠纷中的无政府状态，是造成解决这个在目前具有头等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发生各种偏向，特别是“左”倾冒险主义偏向的主要原因之一。结果，不仅使资本家害怕，消极，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发生不满，形成目前恢复发展生产中的重大障碍。因此，各地党委，特别是各大城市市委，必须迅速采取办法，纠正这一危险的现象。中央有下列提议：

(一) 一切有关劳资纠纷问题，均须集中到市一级机关，即市劳动局、市总工会、市工商局来统一解决。禁止区委、区街政府、下级工会组织，处理任何劳资纠纷。宣布解决劳资纠纷的口头的与书面的契约，必须经市劳动局批准备案后，方为有效。为此，必须将各区的得力干部，集中到市总工会与市劳

动局，来进行工作。必须由市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来担任总工会主席与劳动局长。

(二)有许多城市，至今尚未建立劳动局。一切劳资纠纷，都由工会来调解处理。这是严重的错误。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能代表工人说话，决不能站在劳资之间或劳资之上来调解仲裁劳资纠纷。否则，必然使工会脱离群众，模糊群众对工会的认识。现在有些地方（如济南）的工人说：“哪里有工会，那里的工人就倒霉”。这就是由于工会不是站在工人组织地位代表工人说话，而是站在政府地位去处理劳资纠纷，并强制工人减低他们的要求所造成的结果。如果工人提出过高要求时，工会是应当说服工人减低这些要求的。但是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说明这些过高要求对于工人群众实际上有害无利。在与工人群众商妥了这些要求之后，即应当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和协商。无法达到协议时，即提请劳动局以调解仲裁的办法来解决。工会代表，无论在协商时，或调解仲裁会议上，均应代表工人说话，而不应当站在中间立场或政府立场说话。因此，各大城市，必须迅速设立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劳动局，作为调解仲裁劳资争议的唯一机关。并正式规定解决劳资争议的手续为：

甲、劳资双方直接协商（即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本家或资本家组织的同业公会协商）；

乙、市劳动局调解仲裁；

丙、仲裁不服时得向法庭起诉。法庭判决，为最后程序，双方必须服从。

(三)解决劳资纠纷的方式，应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在现代化的企业中，可以由每个工厂企业的工会组织，直接与本企业的资本家谈判订立（如在同一城市中，有几个同一性质的

工厂、企业，而资本家又有联合组织者，最好还是由产业工会与资本家的组织订立，而不个别订立，以免高低不齐互相影响）。在旧式的小企业、商店、作坊中，必须由同一行业工人店员组成的工会与本行业资本家组成的同业公会订立。因为在同一城市中，同一行业，都有大致相同的习惯或行规，因而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就有基本相同的共同点。这种办法，可以做到使同一行业包括的许多企业、作坊或店铺所发生的问题，在一个集体合同当中得到基本解决。这样，才能使零碎分散的作坊、店铺中的劳资纠纷，做到有条理、有组织的解决，而且比较容易做到合理恰当，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差。如果不这样办，而让每个小企业、作坊、店铺的劳资纠纷都单独解决，必然造成混乱现象，难于掌握，以至互相影响，此落彼起，愈解决纠纷愈多，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偏向。

以上几点，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斟酌试办。并将试办之经验，随时报告我们。

中 共 中 央

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周 恩 来

各位代表：

让我首先向你们庆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成功，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新文艺大军在跟敌人作战上，曾经取得很多的胜利。我们打败过封建文艺，二十年来我们又打败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艺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在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方向下，我们建立了广泛的文艺战线。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决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这个大会。

对于文艺界大团结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在各方面坚持岗位艰苦奋斗的朋友们，不能不归功于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支持，但是尤其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没有军事战线上的胜利，那么我们今天这样七百多人的大团结大会合，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讲话的第一部分，我想向大家说说我们这三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情况和根源，以及文艺工作所应当由此得到的教训。

一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一九四六年的七月算起，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战绩，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三年以前，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四百三十万军队来进攻。那时候我们只有一百二十万的人民解放军，与敌人相差三百一十万之多。反动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主人在当时满以为一定可以打垮人民解放军。多少好心肠的朋友也曾经为我们担心。我们感谢这些朋友，但是我们坚定地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的时候，许多的新闻记者问我：“你们还回来不回来？”我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果然回南京了，不过进入南京的不是我们当时的代表团，而是胜利的人民解放军！

战争的第一个年头，敌人是处于进攻阶段，但是因为受到了我们的重大打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很快就变成了局部的进攻或重点的进攻。第二个年头，我们开始反攻，华北和华东的野战大军渡过黄河向南前进到长江北岸，同时东北的人民解放军也由北满向南满进攻。在战争的第三年，我们的进攻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经过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初的淮海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底的平津战役，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就从此基本上被消灭了。因此，在今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不可能组织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防线。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现在的三年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开始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九万人，这一百四十九万人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机关、学校和后勤部门，战斗的部队大约只占半数。我们人民解放军却从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今天的四百万人以上。巧得很，他们少了二百八十万，我们多了二百八十万。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的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着已经只剩八十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我们已经解放了两万七千九百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一千零六十一座城市，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两万一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八十。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以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这个情况，使我们相信人民解放战争的第四年，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

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的伤亡一共是一百四十三万人，而消灭的敌人是五百六十九万人，就是说我们伤亡一个人，消灭他们四个人。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三年中间，消灭了敌人正规编制的军队四百九十五个师，连非正规部队算在一起，消灭了敌人二千一百五十个团。俘虏的将级军官，加上上校级的师长，达到九百二十七人。三年中间缴获的武器，有各种炮四万四千多门，轻

重机枪二十五万多挺，长短枪二百多万支，飞机一百三十四架，军舰一百二十三只，坦克车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马十三万匹，步机枪子弹三万万七千多万发，炮弹三百一十一万发。我们就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

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人民解放军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

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

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提议我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以及所有解放军代表同志，你们应当利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热烈招待没有看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家到部队里去参观，给他们调查和写作的便利。

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不是孤立的。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得了土地，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两万万的农民将要进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这在农业的中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们把生产节约的粮食供给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只要哪个地方的战事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就掀起了生产热潮。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伟大的中国农民，特别要感谢老解放区的农民。尽管农民有他们的落后的方面，要待我们耐心地改造，然而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值得我们记录和宣扬的。所以我们希望已经习惯于乡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乡村工作，为他们服务；同时也欢迎没有到过农村的、没有习惯于农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去学习农民，与农民做朋友，以便于写下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不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尽管我们二十二年斗争的很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在农民和部队里面，但是我们的斗争是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着进行的。从政

治上说，是在工人阶级通过他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在乡村中间，我们也不能离开工人。大规模的战争首先不能离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是敌人输送给我们的，但弹药还需要我们自己的补充。我们依靠工人。我们把大的锅炉从矿山从机器厂用几千人抬到太行山上，抬到五台山上，抬到沂蒙山区，在山上建设了工厂，几千万的手榴弹，几百万的迫击炮弹，几十万的山野炮弹，便这样生产出来了。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兵工，我们在乡村中还发展了各种小规模轻工业，供给军需民用。今天我们进入大城市以后，情况更不同了。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

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一般精神劳动的特点之一是个人的劳动（当然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许多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在这一个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胜利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却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长大，曾经经历过错误和失败，但是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是正确的方面。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敌人，几千

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年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集中表现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的力量，战胜了中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同时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同志常常说，我们每一级的党委应该交几个文艺界的朋友，以便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目标上共同努力。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人民力量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影响和援助。不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的援助，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也给了中国人民以伟大援助。帝国主义阵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西方，把次要的力量放在东方，这对于中国革命就是一个首先重要的有利条件。苏联的存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新战争运动的存在，这一切力量的总和大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力量的总和，因而阻止了新世界战争的爆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武装干涉中国。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全国人民传播这个真理。我们要分清敌我，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打击战争贩子的叫嚣，揭穿他们的恐吓、挑拨和欺骗。这个庄严的工作，是中国民族利益所要求的，也是世界人民利益所要求的，这正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二 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想讲几个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

第一，团结问题。我们现在开的是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应该说，出席这个大会的七百五十三位代表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现在在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加上直属兵团，加上五大军区，参加文艺工作的，包括宣传队、歌咏队在内，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的数目。解放区的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数目，估计也有两万以上。两项合计有六万人左右。这就是解放区的四百多代表所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新文艺工作者的数目比较难算，大概总有一万人以上。这就是说，你们七百五十三位代表，代表着七万上下的新文艺部队，平均每一个人代表着一百个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旧艺人。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能领导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发扬这次大会的团结精神，并且希望大家经常地密切地联系这支广大的文艺军队，使你们真正不愧为他们的代表。

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一下我们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部队文艺工作者熟悉部队，部分地熟悉农村，但对工人和城市的情形就不熟悉。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熟悉农民，不完全熟悉部队，对城市情况也不熟悉。我们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总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

我们首先需要熟悉工人。现在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一般地都不熟悉工人，所以反映工人的作品还很少。我们希望能有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自己不能到工厂去的，也应该宣传这个号召，把它变成一个运动，推动成千成万的文艺工作者向这方向走去。

这几年有一部分同志已经开始熟悉了农民和兵士，兵士基本上是拿枪的农民。应该继续熟悉他们，并帮助不熟悉的人去熟悉。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成一片，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希望已经下过农村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自满。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近二十几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

第三，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现在还是不是普及第一呢？还是普及第一。解放区做了一些普及工作，但是离开普及的需要还很远。至于说现在产生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还很粗糙，需要改进，需要提高，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如因此而轻视普及工作，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新生的东

西哪有不粗糙不幼稚的？我们对于新生的东西不要责备过甚，对它要爱护帮助，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新生的事物常常大喊大叫，它要改造这个旧世界，这是一种革命气概。脱离人民的旧文艺已经是腐朽了，尽管外表如何好看，内部已经烂了，希望是属于新的方面。我们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虽然还不高，但它们确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新文艺在普及方面的生长和成就，即使是一些小的生长，小的成就。

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使我们高兴的，就是旧文艺界许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参加这个改造的工作，而且希望同新文艺界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应当用很大的热情来欢迎他们。旧社会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我们过去做了一些改造工作，但是成绩还很小。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实在说，现在这个工作刚才开始。有些人觉得旧文艺没有什么前途，以为它总是要消灭的，因此就发生不重视它，让它自生

自灭的心理。但是，今天的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它，听它，喜欢它，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实视为等闲吗？旧文艺会不会消灭呢？我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它是会消灭的，它又是有前途的。旧文艺里的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有前途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了。我们要这样看，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如果认为旧文艺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样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了；另外我们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样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时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改造旧文艺也跟创造新的普及文艺一样，开始也会是粗糙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粗糙就轻视它，因为你一轻视它，它就很难生长，很难壮大。这种改造工作无疑地将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希望一下子改造得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而不去紧张地努力。

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我们文艺界的朋友来自各方，譬如解放区的，就有一部分是从部队来的，他们是长期地在部队工作，另一部分是从解放区各地方组织来的，他们过去限于环境，工作也带局部性，现在聚会一堂，来商讨今后全国的文艺工作，那就不能不要求我们大家有全局观念。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那一个工作部门，或者只看见我们个人的工作环境，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解放事业，看到我们今天全国的文艺工作，我们的工作才能安排妥当。今天全国接近于完全解放，我们的后方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我们文艺工作

者要了解，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初期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尽可能要求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每一项工作都能很快发展，同时又要求有计划地适合全局的需要与可能，各部门中的分工安排就需要我们根据轻重缓急来定了。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开得确实不坏。但是如果以为它一切都美满，或者以为今后的工作一切都会美满，那么一接触实际，便会有很多地方、很多工作感到不满和失望。假若我们各部门的文艺工作者都有全局的想法，能够和今天的建设联系起来，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就会更快。比如我们的部队还要继续前进到南方、西北、西南，广大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就要向新区前进，去推广文艺的普及工作，和部队配合前进，解放尚未解放的两万万的人口，这是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向。因此尽管部队文艺工作者要求提高，也有可能一部分回来受训练，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甚至开始还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个人要求就要服从集体的利益。解放区地方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样，也可能从老解放区调到新区去工作，去组织那个地区的文艺部队，推广那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这也是文艺与政治的一种结合。

今天要把事情的困难估计多一些，在什么困难条件下都能工作，那样，将来好一点当然更好了。我这样说，就是为了大家精神上有准备。

最后一个问题，是组织问题。因为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

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这是群众团体方面。

同时，新政治协商会议将要产生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在这个政府机构之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个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因为这个部门是为我们广大人民及群众团体服务的，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同时又是由上而下的人民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文艺界也要关心这一方面的工作，也要推出代表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在部队里，有的一个野战军多到八千多人，有的很少。当然这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各自发展的结果。地方上也是这样，有的一个县有一个文工团，有的没有。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还会继续，但是城市和乡村，部队和地方，慢慢地调整是需要的。尤其是新区，我们要派出大批的人员去。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朋友，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在反动派的统治下有空隙就要钻进去，控制它一块，被压迫就藏起来。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的国家，要自己来安排。所以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

这是在文艺方面我想说的几件事情，提供诸位研究参考。

同志们！朋友们！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

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

在全国接近于最后胜利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七百多位代表能够有这样的大团结、大会师，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军委关于我军进占赣南的部署 给华南分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华南分局，方魏朱⁽¹⁾并告四野，三野：

午江电悉。(一)同意你们的部署。(二)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究竟何时可占赣州及赣南各县，现尚不能确定，大概九月或十月是可能的。(三)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请三野转知叶飞张鼎丞诸同志注意。(四)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力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援。(五)请三野令叶飞电台与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电台（现在梅县）接通联系，请四野准备于八月或九月间令接受进占赣南任务之我军与方方台接通联系。(六)方方、魏金水午江电即转发三野、四野知照。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军 委
午佳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朱曼平。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毛泽东

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的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们早就不相信它能办好铁路。在辛亥革命前就想修筑成渝铁路，并在辛亥那年闹过保路风潮，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条铁路国民党政府只修了很短的一小段。这就说明靠国民党政府要办好铁路是不可能的。我们跟它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恢复铁路和建设好铁路。过去，我们是无产阶级，什么“产”都没有，怎么能修建铁路呢？今天，我们个人没有“产”，但我们有了国家，有了群众，有了干部，有了工程师……，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

* 这是毛泽东对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二十二年以前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就到井冈山上，成立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人很少，枪也很少。开始时，大家都说不行，国内外敌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是“匪”。匪者非也，就是说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四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行不行呢？行得很。拿铁路来说，我们也要和国民党比一比，看谁把铁路办得好，是国民党办得好呢，还是我们办得好？这在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我相信，大概一年左右，特别是在东北，铁路事业就可以走上轨道了。将来我们再逐渐改进和发展，一定能在全国把铁路办得比国民党好。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但同时也要依靠各级领导，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我们两者都要依靠。

我们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了。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蒋介石有那么多军队、大炮，工人也比我们山沟里的工人多得多。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

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我姓毛，我只一个人，要当班长是不行的，要当司令更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我在这会议上向你们提出，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和重视群众，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 公报（第一号）

—— 消灭敌军兵力及缴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新华社北平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三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第一号公报——消灭敌军兵力及缴获总结如下：

（甲）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战绩

（一）歼敌营以上部队，正规军：一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三个兵团部，三个绥区司令部，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六十个军部，一百七十八个整师，九个师部，一百三十三个整团，一百一十九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万一千三百六十人，毙伤其四十七万六千三百五十人，合计一百九十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人。非正规军：三十五个整师，四个师部，一百一十五个整团，一百零二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人，毙伤其九万五千二百六十人，合计四十八万七

千九百一十人。

（二）敌军投诚部队，正规军：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七个整师，十个整团，八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人。非正规军：三个整师，二十八个整团，十九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八万一千四百一十人。另敌海军反正是舰艇三十二艘。

（三）敌军起义部队，正规军：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三个军部，十六个整师，五个整团，十一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人。非正规军：一个师部，十四个整团，四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一万六千零八十人。另起义飞机十九架，舰艇二十九艘。

（四）接受我军改编之敌军部队，正规军：一个战区总部，二个兵团部，十个军部，二十九个整师。共二十四万一千人。非正规军：三万人。

（五）以上四项合计，敌军共损失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六个兵团部，三个绥区司令部，二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七十七个军部，二百四十个整师，九个师部，一百四十八个整团，一百三十八个整营。以上除军以上指挥部独立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三百零三个师又二个团二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二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人。非正规军：三十八个整师，五个师部，一百五十七个整团，一百二十五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三百零七个团又一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人。总计敌军损失三百零五万人，内被我俘虏一百八十三万四千零一十人，被我毙伤五十七万一千

六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人，起义者十三万零六百人，接受改编者二十七万一千人。

（六）向我投诚及被俘毙敌高级军官七百一十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四名，内正规军一百零六名，非正规军二十八名；被俘虏五百六十二名，内正规军四百九十三名，非正规军六十九名；被击毙十四名，内正规军十三名，非正规军一名。

（七）缴获：大小炮三万八千一百六十六门，计榴弹炮四百一十九门，野炮四百零七门，山炮一千一百五十八门，加农炮二十七门，高射炮一百五十五门，平射炮七十三门，战防炮七百七十七门，步兵炮二百四十五门，机关炮一百四十二门，重迫击炮六百三十四门，轻迫击炮五千三百九十六门，六零炮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五门，五零小炮四千八百三十六门，火箭筒一千二百零一个，掷弹筒八千六百零四个，其他炮一百零七门，枪榴筒七千七百五十五个，火焰喷射器一百五十三具；各种机枪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挺，计重机枪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四挺，轻机枪七万六千二百九十七挺，手提冲锋机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五挺，高射机枪一百零九挺；各种枪支一百零七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支，计步马枪一百零一万九千七百九十四支，短枪五万三千一百三十三支，战防枪三百九十支；飞机一百二十一架（包括起义的十九架在内），舰艇八十九艘（包括起义、反正之六十一艘在内），坦克四百六十四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汽车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八辆，机车八百一十四辆，马匹六万六千一百三十八匹，电台一千六百六十部，报话机三百五十二部，电话机一万四千六百零五部；各种子弹二亿三千八百九十二万零一百发，各种炮弹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发，手榴弹二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二十枚，炸药一百一十万零二千二百七十斤。另击毁飞机三十一架，坦克七十九辆。

（乙）解放战争三年战绩

（一）消灭敌营以上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七个兵团部，三个绥区司令部，四个整编军部（内三个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一百零六个军部，三百三十六个整师，二十二个师部，三百三十八个整团，四百七十五个整营。除军以上指挥部独立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四百九十五个半师。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四百一十五万零六百五十人。非正规军：五十五个整师，六个师部，四百零五个整团，三百五十一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六百六十三团又三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万零七百五十人。总计共消灭敌军五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人，内俘虏三百四十六万四千零一十人，毙伤其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人，起义者十七万五千八百人，接受改编者二十七万一千人。

（二）向我投诚及被俘毙敌高级军官一千一百二十八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四名，内正规军一百零六名，非正规军二十八名；俘虏九百二十七名，内正规军七百二十八名，非正规军一百九十九名；击毙六十七名，内正规军四十五名，非正规军二十二名。

（三）缴获：大小炮六万零七百三十一门，枪榴筒一万零五百一十三个，火焰喷射器一百九十七具，各种机枪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六挺，各种枪支二百万零五千六百二十七支，飞机一百三十四架，舰艇一百二十三艘，坦克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汽车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辆，机车一千零一十三辆；各种子弹三亿七千九百四十万零八千四百发，各种

炮弹三百一十一万零一百二十发，手榴弹三百零四万四千七百四十枚，炸药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斤。另击毁飞机一百六十九架，坦克一百五十六辆。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 公报（第二号）

——解放国土面积、人口、城市及铁路统计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新华社北平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三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第二号公报——解放国土面积、人口、城市、铁路统计如下：

（一）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万零七千六百方公里；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七万七千方公里。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面积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八百方公里。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九十六万二千八百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点八七。

全国三十六个行省（以解放战争开始前旧区划为准，包括西藏地方在内）中，全省解放者有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兴安、吉林、辽北、安东、辽宁、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十七省，大部解放者有陕西、湖北、浙江等三省，一部解放者有绥远、宁夏、甘肃、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七省。

（二）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人口一亿一千一百一十六万人，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人口一亿四千三百二十万零七千人。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人口一亿三千六百零六万七千人。解放区现有人口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七万四千人，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七七。

（三）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县以上城市（以解放战争开始前敌人原有的为准，以下同）四百八十二座，重要港口及市镇七座；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县以上城市五百九十七座，重要港口及市镇十一座。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县以上城市四百六十四座，重要港口及市镇三座。解放区现有县以上城市一千零六十一座，重要港口及市镇十四座；解放区现有县以上城市，占全国县以上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一。

解放区现有一千零六十一座县以上城市中，内特别市九座（即北平、上海、青岛、南京、汉口、西安——兼省会、天津、沈阳——兼省会、哈尔滨），占全国原有十一座特别市的百分之八十一.八；省会二十一座（即北安、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海拉尔、吉林、四平街、安东、沈阳——特别市兼、承德、张家口、保定、济南、太原、西安——特别市兼、开封、合肥、镇江、杭州、南昌、武昌），占全国原有三十六座省会（包括一个地方首府——拉萨）的百分之五十八.三三；重要海港十二座（即安东、营口、葫芦岛、秦皇岛、塘沽、烟台、威海卫、青岛、连云港、吴淞、宁波、温州），占全国原有二十五座重要海港的百分之四十八。

（四）解放战争第三年全年解放铁路八千八百三十五公里，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铁路一万一千五百零三公里。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铁路一万零一百七十九公里。解放区现有铁

路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二公里的百分之八十点五三。解放区现已通车铁路为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五公里，占全解放区现有铁路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六。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绩总结 公报（第三号）

——敌我兵力消长及损失比较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新华社北平十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顷发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及解放战争三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战绩总结第三号公报——敌我兵力消长及损失比较如下：

（一）解放战争开始时，敌军全部兵力为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一百二十万人，敌我相较为三点五八比一。解放战争第一年度末，敌军全部兵力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一百九十五万人，敌我相较为一点九一比一。解放战争第二年度末，敌军全部兵力为三百六十五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二百八十万，敌我相较为一点三比一。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末，我军全部兵力为四百万人，敌军全部残余兵力为一百四十九万人，我与敌军相较为二点六八比一。

（二）解放战争第三年，我军负伤三十九万七千四百人，阵亡九万二千六百人，伤亡共计四十九万人；被俘二千六百

人，失踪十二万九千四百人，总计全年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六十二万二千人。

（三）解放战争第三年，共毙伤敌军五十七万一千六百一十人，我军伤亡四十九万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一六比一。解放战争第三年，共俘虏敌军一百八十三万四千零一十人，我军被俘二千六百人，敌我俘虏相较为七百零五点三八比一。解放战争第三年，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六十四万四千三百八十人，我军无此项损失。总计解放战争第三年中敌军共损失三百零五万人，我军共损失六十二万二千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四点九比一。

（四）解放战争三年，我军共负伤九十八万九千七百人，阵亡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人，伤亡共计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人，被俘一万零四百人，失踪十八万八千九百人，总计三年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

（五）解放战争三年，共毙伤敌军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我军伤亡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二四比一；解放战争三年，共俘虏敌军三百四十六万四千零一十人，我军被俘一万零四百人，敌我俘虏相较为三百三十三点零七比一；解放战争三年，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六十八万九千五百八十人，我军无此项损失。总计解放战争三年中，敌军共损失五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人，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三点九七比一。

（六）解放战争三年，我军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内，伤亡占百分之八十六点零九，被俘占百分之零点七三，失踪占百分之十三点一八；敌军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内，伤亡占百分之二

十七点零二，被俘占百分之六十点八六，向我投诚、起义及接受我改编者，共占百分之十二点一二。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军委关于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 追歼白崇禧部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

—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¹⁾：

十四日二十时电悉。

(一) 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

* 这两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

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军 委

午铤

二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陈饶粟⁽²⁾：

午铤电谅达，兹补充数点，请你们连同午铤电一并考虑电复。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

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³⁾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 委

午筱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 指邓子恢、萧克，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 (2) 指陈毅、饶漱石、粟裕。
- (3) 指马步芳、马鸿逵。

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

第一条 为根绝烟毒流害，保护人民健康，厉行禁烟禁毒，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烟毒，系指鸦片烟及吗啡、高根、海洛英（料面）、金丹或其化合质料等毒品。

第三条 严禁种植鸦片烟苗（罌粟），违者烟苗铲除并处罚之。

第四条 禁止私存鸦片烟土及其它毒品，违者烟毒没收并处罚之。

在本办法施行前农民私种鸦片所留存之烟土，应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之限期内，悉数交公，政府得视其具体情况予以一定之救济，逾期不交经检举查获者，依本条前项之规定处理之。

第五条 严禁烟毒之制造、买卖及贩运。违者，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没收，并严行惩办之。

在本办法施行前，从事前项违法营业者，应立即停止该项营业，并向所属地区之公安局或区人民政府报告登记，交出所存烟毒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并具结永远不作此违法营业，政府可予从宽处理，其不自行报告登记经检举查获者，依前项之规定处理之。

第六条 严禁烟毒之吸食及注射，违者，烟毒及吸食注射烟毒之器械用具没收，并分别处罚之。

在本办法施行前染有烟毒嗜好者，统限于三个月内向当地公安局或区人民政府报告登记，并具结限期戒除，其不依限自行报告登记或不依限戒除经检举查获者，依前项之规定处理之。

戒除期限由当地政府视染有烟毒嗜好者之年龄、身体及嗜烟嗜毒程度分别确定之。

第七条 严禁烟毒入口，违者，烟毒没收，并严行惩办之。

第八条 禁烟禁毒工作之执行，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并着重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协助办理，公安部门负责检查之。

烟毒较重之县市得设立戒烟所办理戒烟事宜。

第九条 凡科学上医药上所需之麻醉药品之原料，统由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核准配售，其成品之制造销售须经省以上卫生机关之检查化验批准。

第十条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华北人民政府随时修改之。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六年第四期刊印。

军委关于对程潜等宣布起义后的方针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

林邓萧赵⁽¹⁾：

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悉。

(一) 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²⁾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

(二) 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三) 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如何望复。

军委

十八日下午四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 （1）指邓子恢、萧克、赵尔陆。
- （2）指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

刘少奇、高岗、王稼祥 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会谈情况 给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

中央、毛主席：

(一) 在我们将书面报告及若干材料送给联共中央斯大林以后，午真晚十时联共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开会，我们及柯瓦洛夫参加，师哲翻译。到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可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甘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另列席索柯洛夫斯基，参谋总长，海军元帅。首由斯大林说明几个政治局委员已去休养，另有几个军人参加，因中国代表团报告中提到一些军事问题。斯大林首先问我们：海军中有无自己的军官？空军中有无自己的飞行员？各省有无省政府？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的政府是否服从将来的中央政府？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政府的主要人员？以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怎样？又问什么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当我们答复了上述各项问题之后，斯大林即展开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说明，并答解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问

题，最后在我们请求之下对目前国际形势亦有所说明。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会后，斯大林并问我们生活是否舒适，由所有到会人员和我们一起看电影，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影片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解释。

（二）在会议中组织了一个借款条约的共同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柯瓦洛夫参加，中共方面由我们三人参加，并决定借款条约由高岗同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因这样对联共在手续上较为适合，便于联共将条约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关于斯大林对我们报告中所提出及当时口头提出的各项问题之答复，综合报告如下：

A. 关于中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那些国家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支持下企图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蒋介石与美国的關係，不同于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的關係。中共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订一种对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使帝国主义廉价的商品不能在中国倾销，

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利的，使青年的国家工业也可逐渐发展起来，这是两利的。俄国十月革命时没收了几乎全部的私人资本家的企业，故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政策，在中国，目前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很困难的，而应实行关税保护政策。

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罢工会要发生，我们暂时不要扩大劳资斗争，但工人斗争可能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发生困难，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的继续。

B.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问题

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在我们答复中央政府的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的问题之后，斯大林说：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在我们答复各区域（例如东北）及各省服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权力批准和撤换各区域及各省选举的政府负责人之后，斯大林说：你们目前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的观点，是对的。其意就是说，在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条件之下，不要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但斯大林很注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裂现象之可能发生。又，我们在报告中没有提到买办资产阶级，斯大林问到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似乎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C 关于外交问题

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所说的几项外交原则，是对的。

这些原则就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斗争，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合作，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与各国特别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及企业，斯大林说：可以用劳动法，要各外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关于是否要争取各帝国主义国家早日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好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D.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关于中苏条约，他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关于中国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斯大林说，你们可以与东欧各国谈判，苏联可以帮助，但最好你们直接谈判。并说：捷克以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可以供给你们商品，帮助

你们，你们可以勇敢地和他们谈判。关于联共与中共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在报告中说中共服从联共决定，这使我们觉得奇怪，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密切两党的联系，是对的，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一种联系。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即可以来，如毛还不便来，苏联可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E. 其他问题

1. 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说：因为在新疆无着陆场，空运军队到新疆，还无办法，至于派战斗机帮助打马家⁽¹⁾骑兵，那很简单，可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开始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在看电影时，斯大林说：在二次大战中骑兵作用不大，因骑兵怕飞机，目标很大，很易被打散。

2. 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可要东北与大连苏联同志商量解决。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3. 我们曾要求在莫斯科办一中国大学，收学生一千人以下，为中国训练建设与管理人才，斯大林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4. 斯大林自己提出从外蒙库伦建筑铁路到张家口（因安得列夫在西柏坡时有人提出此议）问题，他说：这是好事，可以办。我们问：可否建立一条铁路由陕西经新疆到苏联？斯说：太长，不如先建立油管要便宜三倍。斯大林又说：你们如果有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其他植物油，我们都需

要。并说：你们要扩大棉田，提高棉产，为此，你们要逐渐使用农业机器，才好提高棉产。

5. 斯大林说：可以帮我们在旅顺办一海军学校，并帮我们建立海防。斯大林又问我们，苏联是否可派电影团到我们前线帮我们拍照？他们在电影技术上可帮我们。我们答复可以，并说曾有一电影团到林彪司令部。斯说：因他们在那里搞得不好，我们撤回来了。我们说请再派去，可以把关系搞好。斯说：他们拍照影片的内容，可完全依照你们的意见办。

（三）关于国际形势，在我们提出问题后，斯大林答复如下：对目前国际形势的估计，主要一点，就是会不会爆发战争？从国际间的各种条件看，即从经济条件，从美国对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对战争尚未准备好）来看，现在与苏联进行战争，对帝国主义者是不利的，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规律说，目前不应该有战争。但历史上有冒险家，有精神失常的人，所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仍是有的。我们对此有准备。目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不足，他们正在进行准备，他们并用原子弹来恐吓，但我们也在准备，我们比他们准备得更快些。

有的冒险家、精神失常的人宣传说：苏联军队要在美国登陆；另外一些人也就相信这种说法，所以可能产生冒险家的。例如美国的国防部长福来斯特尔，他虽然死去，也还可能产生这种人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除外的。

我们问：苏联与英美之间目前存在的各项重要问题是否可能获得妥协的解决？斯大林答复说：这是很难的。若干次要问题可能解决，而重要的问题则很难解决。待以后再看来。

我们现在对反动派是进行着孤立他们的政策，用各种群众团体、各种会议，在各国、同样也在美国，进行揭露和宣传斗争，其作用很大，以后还要继续这样作。

今天美国政府及其政策，是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美国有些人想与苏联搞好关系，但他们不当权。美国将来如有新的政府、新的政策，也许美苏关系可以改善的。

马歇尔计划已经破产，美国在德国的影响已缩小，自己污辱了自己，战争的可能性在那里已缩小。

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就打，他们使用原子弹，我们也使用原子弹。

美国人自己并不想打仗，总想用别人的手替他们打仗，他们也公开地这样说，但愿意替美国流血打仗的人并不多。

总之，我们既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

刘 高 王

午 巧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刊印。

注 释

- (1) 指马步芳、马鸿逵。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邓 小 平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 这是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华东局负责人信的节选。信中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口头指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张 闻 天

根据几个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我认为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大体已经结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二时期。

大体上说来，从八一五解放到全东北解放（实际时间可算到今年三月），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是东北私人资本从日帝的殖民地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的过渡时期。

伪满时期，东北私人资本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政治上是大汉奸大特务，在经济上是掌握大加工业、大配给店的大资本家大商人，在农村中往往又是大地主。这是伪满时期的一种汉奸资本。这一部分资本依靠日帝政治与经济的势力，与日帝资本结成一体，为非作恶。其资本较大，势力较大，但人数不多。另一部分是中小资本家，特别是小资本家，虽也依附于日帝资本为生，给日帝加工，做些零件小玩意，或执行配给任务，但经常受到日寇的压迫，特别在日寇实行经济统制（伪康德七年即一九四〇年）后，受到的打击很大，故对日寇不满，同汉奸资本亦有矛盾。这一部分资本数量较多，但力量

* 这是张闻天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报告。

很小，在日帝经济统治下，只能苟延残喘。

八一五解放，伪满殖民地经济体系被摧毁。过去依附于这一体系的汉奸资本，同时也受到了应受的惩处，没收的被没收了，破坏的被破坏了，有的为逃避目标，化整为零了。但中小资本家，却得到了解放。这三年余来，东北的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虽然经过了许多曲折，但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一般地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但应指出，在过去这一过渡时期内，私人资本主义是在一种比较不正常的条件下发展着的。主要的特点，就是这是战争时期。东北被分成许多块，南满几个最大的工业城市还在敌人手里。由于战时财政的入不敷出，物资的缺乏，故物价总是不断上涨，特别从一九四八年夏季起。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物价表现极不平衡。由国家没收过来的公营企业，这时正在恢复，生产量又低又少，还发挥不了调节市场的作用。国家对私资的发展，除土改后期的一个短时间外，一般是比较放任的。虽然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国家开始了对于私商的某些限制与管制，在经济上进行了一些平抑物价与反对投机倒把的措施，但作用不大。在这样条件下发展着的私资，大部分要利用物价的波动与不平衡来进行商业活动，那是很自然的。这部分商业资本，固然也解决了国家与人民的某些需要，但同时它却大大地发展了投机倒把的活动。商业利润是特别的高。商业资本从国家与人民手中发了很大的财。如果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的活动，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活动，那也是不算过分的。至于另一部分工业资本，则主要地为国家加工而获利，尤其以军工军需的加工为多。有的则为一时一地市场的需要，制造一些日用必需品出卖。工业的发展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游击性的，抓一把的，大多数是小型的。有原料、有销路，就生产开工；

没有就另想办法。看到投机有利，就去参加投机。为避免目标太大，避免税收负担，及为适应市场的迅速变化、力求资金周转的迅速与灵活起见，较大的工厂与商店，均走向分散而“化整为零”。小手工工厂与作坊，特别是行商、摊贩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发展起来了。各地工商业户数的增加，研究起来主要地也就是这种小商店、行商、摊贩及小手工工厂及作坊的数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促进了投机倒把的发展。显然，这是循着无政府的老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自发的运动。这种运动，到今年三月可以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当时在我们同志中间，曾经有过这样的错误思想，以为这就是发展工商业的主要方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小资本的要求在党内的反映。但东北局当时的方针（见去年九月高干会《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是全力恢复控制经济命脉的国营工业与商业。因为它懂得只有加强国营经济的力量，才能在经济上巩固我们的政治与军事的力量，反对私商的投机倒把，给私人资本主义以经济上的领导，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全东北解放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停止了。全东北和平统一了。东北大军的进关，使财政收支的平衡成为可能了。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大城市全部收复后国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与扩大，大量物资可用之于调节市场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的力量增强了。物价开始达到平衡，有的甚至下降了。国家在经济战线上开始取得了主动，加强了计划性。天津、上海的相继解放，使东北市场同关内市场联系起来。这些都对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的影响。商业投机困难了。军工军需的加工定货减少了。价廉物美

的东北大城市的本地工业品及关内来的工业品，进入东北内地市场来，同本地货竞争了。许多原料的来源，还不够发展着的国营企业的需要。物价、原料与市场的条件，都起着不利于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巨大变化。虽然大部分商业资本还在盲目地待机与挣扎，到处找空子钻，但一部分商业资本却看到了自己暗淡的前途，而想转入工业生产了。有的工厂与作坊，如像安东之棉织业、造纸业等，因缺乏原料而无法进行经常的生产；有的，如像安东的铁工业、丝织业等，则虽有原料，但没有市场，而不敢进行生产；有的虽有原料市场，但成本贵，不能同国家的、大企业的及外来的成品相竞争，也不敢进行生产。大部分私人工商业同过去比较起来，现在开始表现出了停滞与萧条的状态。有奖实物公债的推销，银根的紧缩，对他们商业活动的严格管制，又增加了对他们的压力。一切这些在私人资本家的头脑中，造成了惶惑与混乱。私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物价如何？原料如何？市场如何？国家意图如何？成为每一个资本家所要解答的严重课题了。

这些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加以解答。于是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从第一时期转入第二时期。带有极大自发性的比较“自由发展”着的私人资本已经面临歧路，他们现在如果不循着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所铺设的轨道走去，就不能求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了。显然，如果我们不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与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政策、运输政策、借贷政策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因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附属的有机部分，那今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全与正常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如此，我们也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积

极性，使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而服务。至于私人资本的一切越轨活动，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关于今后发展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方向与办法问题，我们必须从东北经济建设计划的全局着眼，加以根本解决。我们必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章。我认为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现在大体上已经具备。

为了给私人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方向与办法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我认为具体检讨一下过去我们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各个方面，是有必要的。

在三年余来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右摇摆。在我们开始进入东北时期，在党的总的领导方针上虽然是右的，但在城市内实行了反奸清算的地方，在打击汉奸资本时，有时也扩大了打击面，把不应该打击的某些中小资本家打击了（强调了东北私人资本的汉奸性）。在多少进行着工人运动的地方，也有个别增加工资过高的现象。虽然这种情况当时并不严重，甚至相反地，在解决当时财政困难问题上，在迅速争取工人贫民靠近我们上，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从私人资本那里抓一把的思想及片面的工人福利观点是有的。较大的私人资本的转移及其“化整为零”，同我们当时的这些作法，也是有些联系的。七七决议后，全党转入土改，对私人工商业一般采取了放任的与不侵犯的方针，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得到了若干发展。但到土改后期，农民进城没收清算工商业者的封建性，有些政府机关与部队从财政观点出发，从工商业方面抓了一把，街道斗争中的工人贫民，也从中侵犯了一部分工商业。这给了私人资本家，尤其是较大的私人资本家，一个比较严重的打击（在

安东当时受到影响的，占全部工商业户数的百分之十六，其中较大的私人工厂被没收的比例更大）。这是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时间短，纠正快，纠偏后私人资本又得到了恢复。以后物价的飞速上涨，促进了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商业方面的特殊繁荣。纠偏后，在干部思想中曾经发生过过分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忽视了发展公营企业的迫切需要，忽视了同私人资本家在商业上的投机倒把作斗争的必要，及片面强调了保护资本家而忽视了依靠工人的一些右的观点。在中央与东北局“纠偏必须防右”的方针下，这些右的观点迅速得到了纠正。自此之后，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一般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也仍然是有的，尤其在防右后的“左”的偏差。为了进一步发挥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纠正一切这类偏差，尤其是“左”的偏差，今天极为必要。

我认为目前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些“左”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一些方面。

第一，在公私兼顾方面。原来强调国家的利益及国营企业的利益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侵犯了正当的私人工商业，那就不对了。而这样侵犯私人工商业的事，还是不少的。特别是有些财经部门、财经机关，为了本部门或本机关的利益或便利，而损害了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这类事件是比较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最近所检查的本溪县三仁石灰窑的故事，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公私合办的企业内，这种只顾公方利益不顾私方利益的事也不少（关于这类的材料见另件）。

第二，在劳资两利方面。原来在城市工作中强调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对的，但如果由于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发生片面的

工人福利观点，因此损害了劳资两利的原则，那就不对了。而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见省委关于调整劳资关系决定草案）。

第三，在税收政策方面。（这个问题原来是公私两利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但这里特别提出是有必要的。）原来给工商业者以一定的税收负担以解决国家财政的收入，那是正确的。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商人投机倒把的活动，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为了税收，给工商业者的活动以过多的过分的干涉与限制，那就不对了。在一些同志中，尤其是在税收机关工作的同志中，培养税源的思想太少，而“杀鸡取卵”的思想有时甚至还有表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太少，而限制的思想却多了些。这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很不利的。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以上这些“左”的偏差，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在东北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程度认识不足。东北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重的悬殊，国营企业在工商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这一明显的事实，往往容易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私人资本无足轻重的思想。同时领导机关过去差不多集中全力于恢复与组织国营经济成为计划经济，因而对私营经济的注意不能不有所放松。过去物价波动时期，私人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的投机倒把活动，给我们困难很多，损失很大。这些明显的突出的事实，也容易使我们过分强调私人资本的投机倒把的破坏方面，而忽视了它在我们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下，可以发挥其积极建设的方面。这也就使我们容易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方面，而对积极扶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注意不够。其他如片面的国家观点，片面的财经观点，片面的群众观点，也常常容易侵犯到私人资本的利益。而这种观点，常常是较之右的观点更加难于克服的。在党内，“左”比

右要好”的残余思想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所以在干部中就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坚决贯彻中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营经济的建设多少有了一些头绪，私人资本又陷于这样的一种困难情况，党的领导机关更多地去注意于积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作，也是可能的与必要的了。

当然，在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也仍然是有的，而且在批判一些“左”的思想与做法中，右倾思想一定又会乘机抬头。但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哪里发生右倾思想，我们也就在那里加以纠正，不用害怕。为了正确贯彻中央、东北局关于私资的方针，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去克服党内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摇摆，是必要的。说“‘左’比右好”是错误的，说“左”比右难于克服些，因而“不妨右一点”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

以上看法，是否有当，请指示。

关于本省直属各市的材料，有的照原来报告，有的经研究室同志略加整理，现在一并附上，供你们参考。

关于调整劳资关系问题，我们写了一个决定草案，已寄上请批示。

此外，我们还想写一个关于公私兼顾问题的文件，待写好后，再寄上请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张闻天选集》刊印。

毛泽东关于争取卢汉起义问题 给周恩来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

据张表方⁽¹⁾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²⁾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 即张澜。

(2) 指蒋介石。

毛泽东关于举行平凉战役 及西进作战意见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德怀同志：

午电⁽¹⁾悉。打胡⁽²⁾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³⁾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⁴⁾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⁵⁾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订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

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 与王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 泽 东

午 梗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彭德怀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一)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约五万余人。(二)为解放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请向某方订购汽车一千至二千辆，供西北军用。(三)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退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十个军，二十六日开始攻击。

(2) 指胡宗南。

(3) 指马步芳、马鸿逵。

(4) 指苏联。

(5) 即刘少奇、王稼祥。

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朱 德

同志们：

自从去年八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和全国总工会成立以来，工会工作在各地都有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基本上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今天，召开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工会工作会议，其意义与任务是很大的。

(一) 首先，我们要认清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获得解放，工人们自己也深切体验到他们自己是解放了。他们已不是被统治阶级，而是统治阶级，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新民主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职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他们已不再受人剥削，已不是为资本家做工，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自己做工了。因为，国营企业是国家的，是人民的，首先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但这些企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只能依照以工人阶级为

* 这是朱德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规定的轨道运转。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在经济上要自觉地接受劳资两利的政策。这种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建设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此目的，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领导工会工作。否则，我们会陷入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的泥坑，我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正确地组织并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在现阶段，在政治上，工人阶级要联合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中国经济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正因为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服务。我们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之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向着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民生计的方向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记着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

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

（三）因此，工人阶级在国营企业中应该是面对着生产，学习经营，学习管理，提高政治，提高文化。国营企业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国营企业的行政管理干部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者之间完全不应该有矛盾。目前所存在的若干不协调的现象，其来源或者是由于工人中的经济主义倾向，或者是由于行政管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国营企业中的工会，对于这两种倾向，都应该看做工会内部一部分会员的思想倾向，批评教育纠正之。国营企业的工会，由于反映了落后工人的经济主义倾向，而和行政管理干部对立起来，固然是错误的；就是为反对行政管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而采取对立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干部应当重视工会工作，尽可能支持工会工作，提高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要知道新民主主义的管理生产与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对工人的强制压迫，我们是依靠工人的自觉。因此，管理民主化与行政干部的民主作风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必须把工会工作搞好，才更易于实现管理民主化，来动员全体职工的自觉劳动热忱，提高生产。总之，在国营企业中，代表国家管理生产的行政管理干部，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工会工作干部，都是工人阶级。他们的任务是一

致的，就是搞好生产。这是国家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

在私营企业中，是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工资、无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者的路线，是落后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也必须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并在生产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要实现劳资两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监督是不够的。资本家是有种种办法力求克扣工人、加重剥削的，要经过工人一定的适当的斗争，才能实现劳资两利。在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斗争中，工会应该是坚决代表工人的。

(四) 这是不是说，工会不应该争取工人阶级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与工人福利呢？不是的，党和工会，首先是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工人阶级之最低生活，并争取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但是，工人阶级生活之改善只有在发展生产中才有可能。现在，许多大中小城市已经解放了，我们除了保障工人最低生活而外，一般并不能使之有多少改善（当然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是根本改善了，解放了，自由了）。因为，第一，旧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其“繁荣”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经济的“繁荣”，是建筑在封建剥削基础上搜刮农民膏血的“繁荣”，要把这种城市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生产的城市，一般是要有一个相当过程，目前正处在转变的过渡时期。第二，十数年来的战争破坏，再加过去是革命的乡村包围反革命统治的城市，乡村封锁城市。现在城市解放了，要建立新的城

乡互助的城乡关系，要恢复多年来被破坏了的城乡经济联系，也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目前正处在这种转变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两大原因，目前许多新解放城市的工业生产，恢复和维持已深感困难，发展更谈不到。许多国营企业是在国家津贴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许多企业因为生产成本过高，根本不能与外货竞争，目前是在实施某种出入口统制的条件下继续生存着。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阶级的最低生活是要保证的，但是，除了保证工人的最低生活、说服教育工人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以外，如何还能提高待遇、增加工资呢？当然，有些地方，如东北，情况比较好些，工人生活也可以在可能范围内稍加改善。但是，也应注意，某些在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特殊利润，那并不是正常状态下的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这种特殊利润，应该以税收形式收归国家，用以支援战争，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绝不应该成为资本家的利润，也不应该用以增加工资改善部分工人的生活，使之过于突出。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中纺公司所实行的一套办法，使中纺工人的工资突出地高，那是收买部分工人，分化工人阶级团结的办法，我们绝不应该采取。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尽可能改善工人生活。事实上，生产发展了，人民的财富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工人生活也就随之提高了。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那是倒果为因的。不注意发展生产而斤斤于改善工人生活，那是自杀的政策。

总之，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为着支援当前尚未结束的解放战争，需要发展生产，为着建设新中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业。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

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中，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在国营企业中则更应该是团结全体职工，克服官僚主义，完成生产任务。

其次，工会还应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学校，它是学习管理生产的学校，也是工人阶级实施阶级教育的学校。

最后，工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重要支柱，是党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党的工业政策、工业计划与工资政策、劳资关系的政策，都是经过工会而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并由工人群众实现之。所以，在工会中工作的同志，要努力使工会成为党联系工人群众，在工业领域中、在工人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

今天我只讲这几点，供同志们在讨论中参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军委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 行动计划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¹⁾及方方：

各电均悉。(一) 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二) 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三) 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这个会议的时间应不迟于九月五日，请方方按时赶到赣州。林平⁽²⁾及其他什么人应到会，由方方决定。方方须提早结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束闽粤赣边区工作的处理。(四)江西省委对接收赣州及赣南各县的准备工作,须迅速完成。(五)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六)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七)以上请林邓萧赵将有关各点,通知陈赓、邓华及江西省委。

军 委

午敬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 指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
- (2) 即尹林平。

严厉取缔投机活动 保持物价平稳！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平津两地物价，自四月下旬发生的一次波动，经我国营贸易机关大力平抑后，五六两月份，各货价格一般是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但入七月以来，近二十余天的平津物价，又趋波动，而且上涨速度远较过去为甚，各货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半左右。以天津为例，七月二十四日与六月三十日比较，大米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小米与面粉皆上涨了两倍，玉米上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棉纱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五福布上涨了百分之一百零五，棉花上涨了百分之九十八，食油上涨了百分之一百四十，此外西药、电料等价格，上涨亦猛。北平各货价格上涨的比率，亦大致与天津相等。

构成此次平津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是受上海物价上涨的影响。上海自解放以来，各货价格一般皆高于平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施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因此在我人民解放军大举进军江南以前，江南广大地区人民即自动拒用伪“金圆券”，改用银元作交换的媒介。银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当我军解放上海及江南广大地区时，在经济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及时肃清银元投机，使我人民币得以很快占领城乡市场，以平稳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迅速恢

复。几月来经过我当地人民政府的各种有力措施，及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协助，在江南各大中城市中，目前已基本上肃清了银元的投机活动。但在广大的农村中，则由于我各种工作尚在初创，国营贸易、银行等经济机构，才开始建立，因之银元仍在市场上流通。遂使我人民币，集中流通于各主要城市，城乡物资交流困难，使上海等大中城市，暂时表现了通货集中和物资缺乏的现象。此外，近月来江南广大地区夏雨连绵，交通被阻，各地运往京沪的粮食等类物资大为减少，加以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等港口的封锁，使我对外贸易亦一时处于停滞状态。

基于上述情况，上海物价自六月下旬起复继续上涨。七月初平沪直达通车开始后，上海投机商人即大批携带现钞，来平津大量采购物资。开始主要是私购金银走私南运，其后即普遍囤积各种进口品及纱、布、粮食等。因之，也就造成了近月来平津物价由上海带头上涨的趋势。

其次，平津两市之投机资本，在市场上的投机倒把，兴风作浪，亦为此次平津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报近月来平津两市市场上，不但私人游资大为活跃，而且我某些公营商店、机关生产及合作社，亦随波逐浪，竞作投机囤积，致形成最近几天平津物价，不但大大超过于华北内地各城市（天津七月二十三日小米价格与石家庄同日比较约高一倍），而且高于上海。

再次，最近华北各地雨水较大，交通受阻；加以广大农民怕受水灾秋收减产，因之不愿继续出卖手中所存的农产品，亦对此次平津物价上涨，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

以上各点，即为此次平津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对稳定当前物价，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严厉取缔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尤应首先惩罚某些公营商店的投机活动。公营商店有协助政府平稳物价的责任，机关生产不准作买卖，不准投机倒把，我人民政府早有明令规定。但直到现在为止，有些单位仍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在此次平津物价波动中，部分公营商店，机关生产及合作社，不但不大力协助我国营贸易机关抛售物资平抑物价，相反的只顾其小集团少数私人的利益在市场上与投机私商暗相勾结，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抢购物资违法囤积，操纵物价。此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恶劣行为，是我人民民主政府的法纪所不能容许的。从思想上讲，纯粹是一种腐朽的可恶的资本主义投机思想。希望政府迅速进行检查，严厉制止公私商号的各种投机活动。

第二，上海的领导机关，最近已在大力平抑物价，并已收到成效。对上海平抑物价的工作，我华北广大人民必须照顾整体利益，积极支援，帮助上海及江南人民来克服这种暂时的困难。回忆平津初解放时，同样也曾发生过连续的物价波动。那时不但华北各地人民，且连华东、华中、东北与西北各解放区人民，均曾用大量物资来支援平津，使平津的物价得以恢复平稳。今天上海所处情况，正如平津初解放时。我们华北人民，也应当用大力来支援上海及江南新解放区，使上海的物价亦能恢复并保持平稳。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如果上海的物价不平稳，我华北及平津的物价断难单独保持平稳。所以主动调剂物资支援上海，实际上也就是保持平津物价平稳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我国营贸易机关，在此次稳定物价工作中，除严厉打击投机活动外，必须同时大量调剂物资，用经济的力量来恢复平津物价的平稳。对于上海涌来平津的游资，如果他们采购

物资运回上海，我们一般不应限制，但如进行投机囤积，则应同样予以惩处。同时且应争取主动，自动运送大量物资去供应上海、武汉各地市场。我们最近已运出了大量的煤炭和食盐等，去供应长江沿岸各大城市，这是主动调节各地物价，保持市场安定的最有效的措施，今后仍应继续进行。

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 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 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各中央局、分局：

(一) 凡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两个月至迟三个月后，即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 自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以后，为时已久，除太原、石家庄、西安等少数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项会议，这是不好的。各中央局、分局必须指示所属各城市党的组织，经过市政府，迅速召集此项会议，并以开会情形报告我们。

(三) 关于各老解放区，应当召开乡的、县的、省的及全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亦望遵照中央早已发出的决议从速办理，不要推延。党内干部中有一种不愿召开此类会议听受批评及建议的倾向，必须克服。

(四) 关于各解放区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一事，必须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一事配合举行，不可再推迟。

(五) 兹将北平市委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党的代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 央
午世

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及党的代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甲、过去我们还只是召开了一些带有代表会议性质的座谈会，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如土地、房屋问题等。尚未召开过正式的各界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现在我们决定于剑英同志南下前，由军管会、市政府联合召开一次全市各界代表会议。

(一) 在此次会议中，除扼要报告半年来的工作外，并拟报告与讨论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继续肃清潜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及对首要敌特分子的处理问题。

第二，关于进一步恢复与发展生产问题，包括今后国营企业的生产计划及对私人企业的指导方针和继续开展城乡贸易及劳资关系调整等问题。

第三，关于本市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和管理中的若干问题。

第四，若干税收问题。

会期预定三天。

（二）关于代表产生方法。因为现在北平的工会已有九万会员；学生会有五万会员；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已正式成立；大学教联已成立筹备会；妇女、农民都已有了若干组织。因此，我们决定除各党派代表和聘请的一部分代表外，各群众团体代表拟令其自行选派。产业界与商业界的代表拟由各行业代表推选。这样与群众的联系及代表性会更好些。以现在的工作基础和情况来估计会上不至有大困难。至于代表名额之具体分配及产生方法等，俟组织草案决定后另行报告。

乙、拟于各界代表会议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讨论当前的工作计划与党务工作，并报告讨论各界代表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搜集意见加以修改和补充。会期预定两天。

关于党的代表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

（一）根据党章规定提出各级党委代表名额如下：

1. 各区区委各推选代表五名，二十一个区共选代表一百零五名。

2. 市委直属机关分党委与总支，共选代表二十五名，计：直属党委推选代表三名。

市委机关总支三名。

铁路分党委推选代表二名。

长辛店铁路大厂分党委推选代表二名。

人民银行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贸易局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公安局分党委推选代表三名。

公安总队党委三名。

公安局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公安局二处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市委干训班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3. 各学校总支共选代表十七名，计：

学生党训班党委推选代表三名。

北京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清华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师范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燕京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辅仁大学总支推选代表一名。

育才中学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青年学习团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4. 各工厂总支共选代表十三名，计：

电信局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被服厂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人民印刷厂总支推选代表三名。

机器总厂总支推选代表二名。

电车公司总支二名。

(二) 根据北平市情况，领导系集中于市级。各项工作主要干部大部集中市级各机关，且多未参加各级党委。为了更便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市委所属各部委会、市政府系统各局外负责的党员干部共六十五人，拟由市委指定为代表参加会议。计：

1. 市委直属各部委共三十三名。

2. 市府二十三名。

3. 公安局九名。

（三）青年团市工委会推选代表五名（各工厂、各学校团的负责人，可由各单位包括）。

是否妥当，请批示。

北平市委

七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出版物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各局分局、平津宁沪汉市委宣传部并转各党报各新华书店：

根据专业分工原则，并为了出版物的版本划一，及避免内容错讹、版本分歧与浪费重复，兹规定：

一、党的文件，负责同志言论，干部读物等以书本或活页形式出版及对外发行，是解放社和新华书店的任务，今后这工作应经中央宣传部审查批准，统一由出版委员会及中央局一级的新华书店办理。各报社或其他部门，不宜兼做这一出版工作，对外印发。但遇下列情形可变通办理：

1. 在某地上述新华书店尚未建立，或虽已建立而无足够条件时，可暂由报社或其他机关兼理出版；
2. 学习机关因大量教学需要，可自行排印，但不对外发行；
3. 分区或中等城市，因中央局一级书店发行不到或发行不足，经区党委或市委批准，可由当地新华书店或其他部门翻印。

二、解放社及新华书店出版书籍，应不准私营书店未征得我方同意而擅自翻印，党的文件或负责同志言论在报纸发表以

后，出版权即属于解放社及新华书店，亦不准私营书店未经我党同意径自翻印。以上两点，可登报公告，但对翻印事件之处理，应着重劝告说服。

中共中央宣传部

未文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毛泽东转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的批语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同志们：

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情况 及其主要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一）平津解放后，遵照中央与华北局指示，采取大量招收（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差不多是来者不拒）与严肃改造

知识分子的方针，先后入学者达一万二千余人。成分很复杂，根据九千学生的统计，学生占百分之四十三，公教人员占百分之三十四，军警宪占百分之十二，工人占百分之四，农民占百分之一，商人占百分之四，其他占百分之二。全校学生的文化程度，大学生及高小生均占百分之十左右，中学生占百分之八十左右。青年（二十五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妇女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经过入学注册，主要是深入学习后的自动坦白，以及同学检举、市内党政保卫机关的通知，先后发现全校学生中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及曾任职警察、宪兵、专业特务破坏分子、叛徒、杀人凶犯及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等合计约达两千五百人，其中绝大多数系一般党团分子，特务系统工作者是少数（约百人左右）。自动缴出手枪三十二支（已收到二十三支），因之，革大虽然最基本的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场合，但同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亦是很复杂剧烈的。

一般学生与公教人员入学时的政治态度，多为保守的中间分子状态，极少数是进步的（四部两千四百学生中只有十一个党员、六个团员），一部分是落后与反动的。入学动机很不纯，一部八个班的统计，要求进步的占百分之十三点八，追求个人目的占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糊里糊涂的占百分之十七，别有企图的占百分之七，其他各部情况大体相同。以上就是本校学生的基本情况。

（二）经过三个月的思想教育（一部分入学校早的将近四个月，一部分入学较晚的不到两个月），成效很大，思想动态已起了基本变化，极大部分已经根本上确定了革命的人生观，改变了过去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现在靠拢我们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落后的与反动的约占百分

之十五左右（反动的是极少数的），学生已经是一边倒，不是进步就是落后或坚持反动，中间状态基本上已不存在，而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现在亦还在不断分化中，其结果，大多数学生的政治面貌，大体上是弄清楚了（但仍有小部分死角未突开，也有伪装进步、假造历史隐藏着的）。青年团员的发展已超过四千人，共产党员发展了二百人。学校宣布提前毕业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学生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工作，到工作岗位上去学习与锻炼，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热情。

（三）基于学生情况的特点与上级的启示，我们采取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为本校基本教育方针，把学校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来办事。故应以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为中心。既反对脱离思想实际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教育，也反对零碎的片断的忽视理论学习的经验主义的教育；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教育的直接目的，两者要密切结合，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实施。课程以少而精为原则，总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其中又以三个问题为主题，即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配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及政治形势、国际主义、党史党纲党章等学习。在系统地进行了以上教育之后，绝大多数学生陈旧的脑筋即已基本打开，改变了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步一步地靠拢了我们。经验证明：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要改造成分与思想都极为复杂的旧知识分子，必须把一切教育力量集中起来，环绕改造思想的中心任务。而改造思想的基本关键，就在于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不要分散力量，不要忙于去讲政策（政策教育最好放在工作部门中去讲），或平列许多政治课程，以免面面俱到、先后倒置、失去中心、多走弯路。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思想改造，除以理论教育与思想实际相结合来启发学生内在的思想斗争，从根本上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外，我们还着重了劳动的实际的锻炼与教育，由干部带头，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劳动，种菜、掏井、挖水沟、打扫楼院及厕所，并参加帮厨、修桥等劳动。利用“五一”劳动节，进行了尊重劳动人民的教育。从此掀起了普遍的劳动热潮，改变了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与对劳动人民的自高自大的错误观点，转而积极从事劳动，并开始了解劳动人民的可贵。大多数学生实际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是科学的真理，无论对青年学生或公教人员，印象均极深刻，而工人更受到极大的感动。每上一次劳动课，就引起了他们的诉苦，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经验证明：实际的劳动教育，在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学校、训练班中，都有设立的必要。这一点在教育方针上必须加以明确的规定。

（四）讲授是重要的教学方式。在讲授方法上，我校差不多完全是采用上大课形式，经常是七八千甚至一万多人听讲，分班讲授几乎没有过。在革命大学这样性质——以政治与思想教育为唯一中心的学校，共有一万二千多学生这样大的学校，而训练时间又只是三个月的情况，讲大课可以说是唯一适宜的形式。因为第一，全校共有五十多班，要同时请很多在理论上、政治上均有修养的负责同志和教员逐班讲授，事实上是办不到的；第二，由某些在理论上、政治上修养较好的少数负责同志或教员逐班轮授，在他们的时间上也是不允许的；第三，在上述两种办法行不通时，如不采取上大课办法，就只好由一些普通同志分班讲授，这在教学效果上说，显然是相差很多的。上大课，就可以解决这个好教员少而学生太多的矛盾。但是上大课也有它的缺陷，由于听讲人数太多，时间较长，特别

是学生的程度的参差不齐，必然会产生接受程度的差异。为了补救这种缺陷，我们又普遍运用了助教与班联课即跟班联合讲授的办法。这些助教就是马列学院的学生及本校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教员。这些助教的任务，就是根据上大课时所讲的内容，在班联课中向学生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帮助学生领会讲授内容。大课讲授和班联课助教的讲授相结合，就是我校讲授的基本办法。

但只靠教员由上而下的讲授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学生自己的学习组织，组织与推动学习。也就是说，必须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讲好是重要的，但还须着重地注意组织大多数同学，启发其积极性，提高其觉悟。只注意讲授，忽视学生群众的自觉活动是不对的，但在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时，也不要吧眼光注视到几个少数人，更不要只啃硬骨头，这样做也是不对的。经验证明：只要大多数同学觉悟、进步、团结起来了，就能带起落后，孤立反动分子。不要只看到几个少数反动分子，就把全班全组看成漆黑一团，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思想斗争，甚至害怕群众斗争，认为越斗争，少数人的问题越不好搞。就是因为这种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错误观点，造成了个别死角长期不能突破。在群众初步发动的基础上，应适时的组织学习代表会和代表小组，这是使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经常联系群众的最好的方式。凡是学代会组织起来的地方，同学们的情况反映就很及时，帮助领导上分析处理问题，可以防止小组长的独断专行，可以不断的发现与培养骨干。这种学习代表会可由班到部以至全校统统组织起来，效果甚好。广大的年青妇女，都应当适时的组织起来（学校成立了女生指导委员会）。这些先进青年和妇女，一旦觉悟与组织起来，他们在学习与工作中就能起很大作用。这次理论测验与思想总结

中，充分的发挥了青年团与妇女的积极推动作用。

学习一个段落即举行一次测验，采取民主评卷办法，由教务处统一出题，发统一的标准答案，以小组为单位，挑选中等典型试卷，作为评定的标准；实行自报公议、分析批评，然后再打分数（但反对争分数），同学们都认为公平满意。这是最生动最活泼的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办法，也是群众路线最集中的一种表现。这次搞思想总结，也是采取这种群众路线的办法来进行的。

（五）提倡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从每周生活检讨会开始，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学们逐渐善于使用这个武器，由日常生活的检讨提高到思想原则水平。过去同学们隐瞒历史成分和罪恶行为，在自我检讨过程中，逐渐自动坦白了，放下包袱。这次我们举行了半个月的理论测验与思想总结，实际上是整风的一个新形式。我们的经验是：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对于反动的落后的思想，作一番更深刻更切实的批评、揭发与清除，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已得成绩。思想的清算，必须遵守下列原则：一、理论测验与思想检查的实际相结合；二、自觉自愿，不追不逼；三、友爱互助，实事求是，分析批评；四、提高多数，带动少数。基本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民主评定。结果大多数人放下了包袱（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党派问题，只有少数是特务与严重的政治问题）。相当普遍的得到了改造与提高，剩下少数的垃圾堆，也就便于清理了。这一个经验，也证明过去整风审干的方针是正确的。只要采取严肃的方针，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自觉自愿的方法，辅之以互助友爱、分析批评，在运动中及时提出防“左”，就不致犯错误。在这次运动中，也曾有过个别“左”

的倾向，已随时加以纠正了；也有极个别的同学，在群众思想运动的高潮中胆战心惊，开小差，装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这些情况，有的是很难避免的。还有假装要跳水寻死的，这些现象是个别的，也值得我们加以检讨。

（六）此次一万二千多学生，其中绝大部分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改造与提高，是由于中央与华北局有明确的教育方针，我们有过去整风审干整党的经验，与许多负责同志（如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安子文、黄敬、冯文彬、艾思奇、杨献珍诸同志）亲自上课及全校党员、干部刻苦的努力所造成，而全国胜利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正确的教育方针与主观的努力仍是收效最大最快的决定的条件。我校干部理论水平不高，也缺少教育经验，但其中多数是长期作党的工作的，经过整风审干整党，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纯正朴素的工作作风，与群众生活能打成一片，能贯彻党的思想领导，因而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这在改造旧的知识分子中也是重要的经验。

（七）开始我们曾计划选择一批专门人才、大学教授、中学教员等加以比较长期的培养，成立一个高级班（一百六十余人）。这些人文化水平高是其长处，但社会经验复杂，思想比较落后，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思想比较困难。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失业分子，有许多伪造历史，要两面派手腕，个别搞特务活动，故在学习中不易展开思想斗争，进步很慢。在这次思想总结与鉴定后，班里还不断的发现了他们的政治问题，这证明单纯的按文化技术观点分班的办法是有毛病的。正确的方针，应当把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他们思想多不纯洁，有复杂的社会经验）分别编入文化较低、思想纯正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占优势班内，进行改造，这样的效果是会比较好一些。或者

是将这一批有专门技术的与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给以较长期的教育，其结果也会更好一些。这也是我们所得到的几点教训。

刘澜涛 胡锡奎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程潜等站在 我们方面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

(一) 林邓五日十二时电⁽¹⁾悉，处置甚好。

(二) 我军人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以便利用这种报纸，登载我们的消息及文件，分化程潜、陈明仁系统中的党、政、军，给进步分子以武器，教育和争取多数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

(三) 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即进行物色，并拟定名单电告。

(四) 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

（五）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惟暂不对外透露，看一看程潜及其一派人的表现如何，再作决定。

中 央
未 鱼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邓子恢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十二时给金明、唐天际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目前不要急切地进行对陈明仁的斗争，而以热烈的团结为主，便于今后商谈一切问题。政权要其逐步移交，名义上推迟一个月。岳麓山的控制和长沙部队的指挥关系，如目前不能立即解决，待见面后逐步解决亦可，但必须达到解决的目的。

毛泽东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 西北地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

德怀同志并贺习⁽¹⁾：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二）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

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

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 胡公冕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现在程潜、陈明仁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²⁾、桂、胡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 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 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 泽 东

午鱼⁽³⁾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⁴⁾，华东局及粟裕。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 指贺龙、习仲勋。
- (2) 指蒋介石。
- (3) “午鱼”，应为“未鱼”，即八月六日。
- (4) 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

中共中央关于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 给华中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要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八月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无可奈何的供状

——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新华社社论)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五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资料，其主要内容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

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见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谊的”目的，“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给了它的“军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记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内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出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绝支持反动统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说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谊。这种友谊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因为美国人民没有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必要，并且曾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许”的。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则“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谊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谊的一

方的愤慨和他方的谴责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吗？既然如此，难道规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日本侵略者不占领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黄河东岸和贵州南部），就会叫人们停止愤慨和谴责了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结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们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规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资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扩张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们的愤慨和谴责，愤慨和谴责的纪录难道不是已经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结果，艾奇逊写道：“我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贪得无厌的但是终于失败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者彻底地打败和打倒，帝国主义者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废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吗？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野心仍然是没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

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逊在一个月以前，在七月六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输送它现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经济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继续干涉和侵略中国，继续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逊已经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发表专门的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资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与整个远东之局势，咨商将有助于各该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维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没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顾问，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该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该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难道不

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美国白皮书在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布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荒谬的恶毒污蔑，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内和平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与此同时，则竭力冲淡国民党的罪恶，并将美国侵略者在白日梦中所描绘的比国民党有用些的某种新工具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这些奇谈简直是幼

稚到不值一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相，就已经被许多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包括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物，报告给美国人民了。艾奇逊断言，“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艾奇逊在这里的头脑，似乎还有些清醒之处。但是他接着断言，世界忽然大变了，这些严肃的抵抗者们自己忽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了；过一会儿（大概是一分钟），中国人民又忽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而是“显然地认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国家性”了；倒是美国政府所努力帮助其恢复“主权”的国民党，被公认为“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指明这个外国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帝国主义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这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艾奇逊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中国内战双方的“军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供给的。那么，关于谁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问题，究竟是因失败而昏迷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得清楚些呢？还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立场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些？毫无疑问，艾奇逊尽管自己欣赏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决不能使世界信服，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于万一。

美国白皮书也攻击了国民党，其目的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美国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观态度。但是白皮书是为什么而攻击国民党的呢？这是侵略者对于他的走狗的攻击，犹如日本侵略

者对于汪精卫的攻击。正如艾奇逊所说，攻击了国民党的魏德迈的报告，仍然是“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满，因为国民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国主义援助归于无效，致使帝国主义利益归于灭亡。严格地说，美国侵略者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国民党的反动无一不因美国政府“援助与鼓励”而加深，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样滔天大祸的；第二，国民党的腐败是随着它的反动而来的，并且这种腐败至少也因美国的榜样而加深。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在本月十日说得对：“美政府指责中国（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美国派来中国之人员，其贪污程度比诸中国官僚亦无不及。如战后之‘善后救济’事宜及近年之‘经济合作’等工作过程中，美籍人员之贪污舞弊事实诚不可胜数。”螃蟹责备它的儿子横行，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丑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镜子里的尊容难看，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艾奇逊说：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力量是弱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确，可是必须补充说，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以及任何国家的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们的暂时的猖獗的基础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准确些说，

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国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此，美国政府仍然要在中国国内外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人民的庄严美丽的祖国，来捣乱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来捣乱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国事变中真正得到了教训的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我们相信我们的曾经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强的，因为我们的力量生根在中国人民中间，同时也生根在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中间。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能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

根据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

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人民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

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

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目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

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毛 泽 东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

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

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

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毛泽东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北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 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

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

(一) 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

(二) 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

(三) 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

(四) 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

(五) 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

(六) 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

(七) 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中 央

八月十九日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附：太原市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

太原市各界代表会第五次会，定未号召开。根据后几次会，尚有如下一点经验。即每次会后，应派人到各工厂、学校、街道，检查、帮助代表传达。我们在检查中，发现不少代表创造各种方法进行传达。但也有少数代表，参加会后并不进行传达，也不收集群众意见。相反，在检查时，还假说“已经传达过了”。经过检查、帮助，并让传达工作做得好的代表在会上作典型报告。这样，一些不积极的代表，亦开始积极起来。此一工作，每次会后都应进行。但要与会议内容结合。例如，四次会的中心是市场管理白洋及卫生方面的问题。检查和帮助的对象，应着重在各区街的代表。此外，有的单位的负责同志是军事代表，对各界代表会的意义认识不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在解答代表所提问题和建议时，不够负责严肃。前者已将其中特别突出者，用市委名义发了通报，后者用市府名义（因解答问题，主要是市府各局）发了通知。经过这样做，已开始得到纠正。现正准备第五次各界代表会后，普遍进行改选代表。详情后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须集中 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等问题 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彭张，并贺习⁽¹⁾：

各电均悉。(一)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二) 同意在定西或兰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贺龙同志如能于九月十五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九月十日开幕，二十日闭幕，贺于十五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借仲勋一道去兰州附近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三) 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要。(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兰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兰州。

中 央
未 梗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 指张宗逊，贺龙、习仲勋。

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董 必 武

一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那时看胜利形势的发展，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所以当时想象的新政协是小规模的，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草拟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发出之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成和拥护，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上海、平津及其他各地，陆续来到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来解放区的人更多了。今年六月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有二十三个单位参加，代表一百三十四人，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筹备会已通过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的，计有四十五个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学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中的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各种宗教的代表等；此外还有

* 这是董必武对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的讲话。

特别邀请的代表。计党派代表一四二人，区域代表一〇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代表二〇六人，四十五个单位共出代表五百一十人。筹备会并且决定十个代表以上的单位有两个候补代表，十个代表以下的单位有一个候补代表。前者计三十三个单位，后者十二个单位，这样又增加了七十多人列席会议。特别邀请的代表，尚未最后确定，大体估计，当不会超过七十人。如此计算，新政协代表将在六百人以上，七百人以内。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的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具有某一方面代表性的人物都可包罗在内，代表数目是很庞大的；质量也是相当整齐的。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由本单位提出后，还要在筹备会中由大家协商。大体上讲质量是好的。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会议，并且有执行机构和日常办事的机构；所以它的组织法草案中规定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时，设立全国委员会；主持经常会务的是全国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在地方视需要经过协商也可以成立地方委员会。

人民政协的职权，概括言之，可说是极大而且很特殊。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表现在它可以制定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一纲领

有宪法的性质；它可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它可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说它特殊，因为它的全体会议在选出全国委员会后，它和国家政权机构就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组织。它还要保证执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及其自身的决议，这是中国革命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

二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中国新的政权机构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特别是在县以上的政权机构中，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并且有职有权。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第八段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九段又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

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里把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三个敌人说得清清楚楚。我引证以上的文件，就是想说明现在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党的中央已把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规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那末，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

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

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及民主爱国人士，这些人士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而自己不去行动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是搞些什么的；有在革命高涨时他轰轰烈烈地干，很积极，而当革命低潮时便表现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觉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参加革命阵营的。

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成的反动统治，消灭干净。

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对于一切民主人士是要有原则地有步骤地去争取他们。所谓原则，目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凡赞成这三反的人，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所谓有步骤，丝毫不是丧失革命立场，而是把我们革命观点中最基本的及最一般的原则提出来，凡同意这种原则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像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不用战争用和平谈判解决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现在长沙也解放了。这是很好的，人民少受些痛苦，地方少受些破坏，花较小的代价，争取了胜利。开始时固然有些麻烦，不痛快。但干革命事业有时干得很痛快，也有时干得不很痛快。革命不一定是为了干得痛快，只要能达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目的便好。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发出以后，赞成这个号召的各党派，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我党的领导，

对和平的幻想，对英美的依赖，对苏联的怀疑等等问题很多。随着军事的胜利，我党中央政策的正确，各党派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字于他们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件，我军迅速渡江，在沪、港抱和平幻想的人也都觉悟了。毛主席“七一”文告发表后，他们对英美和对苏联的认识都和以前不同了。美帝国主义“白皮书”发表之后，各党派、各民主人士都表明态度，说自己与美帝国主义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无关。现在我党的政治主张，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公开提出反对的意见。从旧的、因袭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到接受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即使是个别的观点，也等于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因此争取团结是要有步骤的。对于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要耐心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给他们以工作岗位，甚至有些为人民事业立过功的人位置还会比我们高些；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特别受优待。如以前发表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文件，有我党和其他党派列名；而我党只有毛主席一人署名为首，其后列各民主党派领袖的名字。难道说我党中央书记处各书记同志的声望地位比不上其他党派领袖吗？毫无疑问是比得上的。但他们没有列名。又如这次政协会议代表，我党许多领导同志没有提名参加，因政协规定代表一定要出席，而许多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出席也就不能提名；还有更多的同志可以当代表，因为代表名额的限制和工作关系没有提名作代表；有些同志出在某一单位可以当代表，而出在另一单位，却只能当候补代表；在党内，还有些同志的革命资历不深，因所属单位（如人民团体）不同，需要他当代表，而资历较深不属于那种单位的却不能当代表。这些事例，如果不从整个革命形势来看，单从个人资格地位出发去看，那是想不通的。又如许多民主人士被招待

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有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特别受优待，住较漂亮的房子，吃特灶，我们许多同志干了多年革命工作，住的吃的都很蹩脚。这事例一样只有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全盘利益来考虑，才能想得通。

我们的同志有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从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舒服。这些话初听好像有点道理，实际是极错误的。说这样话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无条件的。不讲条件而担负革命的任务，革命才是光荣，不革命自然没有那种光荣，反革命更是光荣的反面，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罪恶。早革命则早享受光荣的称号，迟革命则享受光荣的称号也就因之而迟。革命胜利之前有困难，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说绝对没有困难。没有民主人士陆续参加革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把革命的光荣降低到与不革命，甚至与反革命相比，这样错误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单纯计较地位和享受，这是把革命的观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要改变社会制度，个人生活的提高，一般说要在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才能达到。如果单从个人出发去想问题，我们的脑筋想个人问题的时间费得多，想社会问题的时间就费得少了，这会障碍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妨碍革命工作的推进。这一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来与民主人士相处是很困难的。

人民解放军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争，很快便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还不是彻底的胜利，还需要巩固这个胜利。我军所到达的大城市，明显的官僚资本都被没收了。官僚

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势力至少也得要三年至五年，才能解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在我们势力范围内，我们已做到了。三反的任务，仅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宣告结束，所以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都要联合起来继续干，我们联系得愈广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这些错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领受过去的教训。对于民主人士必须给以适当的物质上的优待。不然，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他们做不到，就不来直接参加革命，就减弱了革命阵营的势力。这是政治影响、政治力量的问题，不能够用一、二、三、四的数目字来计算的。

就经济建设方面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私人资本主义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要小，但它有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伴随着，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间断地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虽不强大，在国民经济中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在现时国家政权中，不能没有他们的位置。做社会革命工作，决不能拿一个生活标准的简单模型去衡量，合乎我们模型的才要，不合的便不要，尺度应该放宽些。也不能说我们和民主人士分开工作，各搞一套。只有争取民主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正确、坚定的方针。不争取民主人士和我们合作，即不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就违背了党的方针。

今天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它经过共产党来实现它的领导。现在我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都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偶然的。领导而能得到被领导者的拥护，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第二要照顾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才能使他们感觉有骨有肉，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第三还要有我党同志的忘我精神，坚决行动，以身作则，争取胜利。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 对于反革命分子投入革命阵营的态度

过去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是欢迎的。今天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明天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也是欢迎的。我们争取这些人便能减少革命的阻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把反革命集团孤立到最小的一点，因而更便于肃清它。

从阶级感情出发，对反革命分子屠杀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完全对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反革命立场的时候（这当然要有具体事实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是我们花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的），我们除批判他过去的错误以外，就要进而团结他们，才是符合于革命利益和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一点，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然好些问题便想不通。有些过去屠杀很多人的反革命者，今天他悔悟了，他愿意参加到革命阵营里来，已经为人民立了功，我们怎能拒绝他们呢？又如傅作义先生、程潜先生等，都和我们打过大仗，这当然不好。但北平和长沙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他们立了功，人民愿意他们这样干，他们这样干了；这些人可能在今后的政府中获得较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追究过去，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让他们获得适当

的工作岗位，我们便没有道理，人民将不原谅我们，我们的圈子便会缩到很小。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因为他们今天参加革命的光荣，就涂掉他们过去反革命的事实，过去的事实，让历史去评判，用不着我们去追究了；对待他们应当和对待一直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有基本的区别。对待他们要宽大，对待坚决反革命的分子就要严厉。

四 对民主人士的态度

团结民主人士，是人民革命的需要。但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是一定有若干距离的；这些距离表现在政治主张上、生活习惯上、工作作风上及思想意识上。因此，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不只是一定要团结，而且要有批评有斗争，才团结得更好。

分析一下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哪些距离是可以接近，哪些距离是不容易接近的呢？

政治上的距离，是较易接近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符合于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他们也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他们也时有被压迫的感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对他们是压迫的，只要他们愿意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我们首先要争取这一点；这一点不能接近，便不能合作。工作作风的接近，就要慢些。生活习惯方面某种程度的接近并非全无可能，同样要慢慢来。思想意识方面的接近，有些要更慢，有些简直不可能。本来政治主张也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意识是更广泛，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等等在内，这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不同，产生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思想意识。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求得和

他们相同，在另一问题或另一点上他们和我们有分歧。有些问题甚至他们毕生也不能和我们一致的，这倒不必勉强要求一致。认识了这些距离，我们在团结他们时，对他们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

只有批评与斗争才能推进团结，才能使团结巩固起来。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这一原则要我党同志适当灵活地运用，无论如何，不能把党内斗争方式拿来呆板地应用。我们和民主人士阶级立场根本上是不同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和他们在一定时期政治上的一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在政权机构中，既要与许多民主人士合作，就应该有适当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如在上面领导，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他才能做的事情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听，我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的。在政协筹备会以前，我们和民主人士谈了许多问题，如对中间路线及土改问题等；经过详细的三番五次的解释以后，他们大体上赞同我们的意见了。其中可能还有个别人士对个别问题不很了然和释然，抱沉默的态度；一般的总算解决了。我们要善于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懂的道理，甚至于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以消化。这样做工作是相当麻烦的，但是革命就要不怕麻烦。我们对于同级的人，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要考虑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尺度，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于下级，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不要抹杀他们的意见；对的我们

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释。

对于民主人士，我们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是不好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迁就他们，随声附和也是不好的。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与斗争。慢慢改造他们，不要着急。要诚恳坦白，谨慎谦虚。出发点是团结，最终的目的也是团结。是否有团结不了的人？个别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用了一切团结的方法，还团结不了他，那他也就慢慢地孤立起来了。他孤立了还不觉悟，那就只好由他去了。

五 党内团结

华北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从过去的经验，我想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党员首先要团结，才能做到和民主人士的团结。过去我们政府工作中党员间是有不团结的现象的，特别是负一部门领导责任的党员间有些不团结的现象。这种不团结并不是因为有原则主张不同，而是因为工作作风的不一致。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作风趋于一致呢？某种程度的一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工作作风不是不可改变的，不好的作风只要大家指出来，谁也不会去维护它；好的作风谁也不能说不好，我们共产党员是服从真理的。问题要摆在桌面上来谈，开会来谈，不要背后随便讲，而开会时不讲，或是阳奉阴违，都是不好的。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这里顺便讲一下态度问题，同志中间相互批评，不应把态度问题当成为原则问题，因为甲说乙的态度不好，乙也可说甲的态度不好，互相间在党内研讨一下，彼此改正就是了。但态度问题有时是原则问题，例如领导工作者态度不好，以致不能很好地推动工作，或在群众工作上，影响了与群众的联系，这

样态度问题便成为原则问题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只有党内团结，才能更好地团结民主人士。各部门同志要很好地检查党内团结问题。

根据法律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

未敬电悉。

(一) 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

（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1）}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

（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中 央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指示要求新老解放区各县每月或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次二至三天开完。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遮掩掩，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一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

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

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

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¹⁾。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以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当时，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个决议。一九四九年情报局又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对这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示态度。关于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在同南共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时曾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友谊”，还是侵略？*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毛泽东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军委关于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 较利我军作战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林邓萧赵⁽¹⁾：

三十日电⁽²⁾悉。(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军 委

申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注 释

(1) 指邓子恢、萧克、赵尔陆。

(2) 指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白崇禧已改变在湘西寻我作战的计划。宋希濂已令所部出发，向石门、澧县、常德进攻，但该敌仍有中途改变计划的可能，而无论该敌是否前进，我军均拟歼该敌。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律师制度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

上海市委并告华东局，各中央局及分局：

市委关于处理旧律师问题电收到。我们对律师问题有下列意见：

(一) 旧律师不能继续执行业务的原因是：

(甲) 他们所学所用的反动的六法全书已经明令废除；

(乙) 随着整个国民党国家制度及司法制度的腐化堕落，中国旧律师制度已形成为欧美资本主义的敲诈习气加上中国封建时代的讼棍作风之混合体，因而旧律师中贪污腐化者多，廉洁奉公者少；

(丙) 人民法院实行为人民服务的诉讼程序及审判方法，使绝大多数当事人感觉到无出资雇用私律师的必要。

(二) 资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统治时代均采用私律师为主公设辩护人为辅的制度，私律师主要地是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及其他有产阶级服务的工具；他们的所谓公设辩护人名义上是为请不起私律师的穷苦当事人或找不到私律师的政治犯、刑事犯而设，实际上他们不仅是骗人的幌子，而且很多时候是害人的媒介。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我们拟采取公律师为主私律师为辅的律师制度；即在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各级人民法院——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及高级的人民法院中

设置适当数量的公律师，为广大人民的诉讼与非讼事件服务；同时，允许某些经过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合格发给营业执照的律师去执行私律师的业务，以供某些愿意和能够出资的人雇用。但这些律师的业务活动及收费数目等均须遵守司法行政机关之规定。

（三）除作恶多端、贪污腐化、声名狼藉或反革命分子须加以处分或着令改业外，所有旧律师愿在人民民主国家继续执行律师业务者，须一律重新进人民政府所办之政法学校或司法训练班或新法学研究机关受训，以便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学习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法令及司法制度与司法作风；同时，对国民党的和一切欧美日本的反动的旧的社会观、国家观与法律观，进行彻底的批判；对旧的反人民的司法制度与司法作风，进行系统的清算。受训期满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合格者，发给允许执行律师业务的执照。任何不愿受训以改变自己思想与作风的旧律师，均不得执行公律师或私律师的业务。

（四）为培养新法学干部及改造旧司法人员，中央已在北平设立政法大学及新法学研究院；惟因物质条件限制，每期不能招收很多人员。请考虑可否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改造旧司法人员及培养新法学干部的司法训练班或政法学校等？你们对此问题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中 央
申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 中国的领土——西藏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新华社社论)

七月八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这一个阴谋事变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国主义在一八六〇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锡金）。一八八七年和一九〇四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中国人民对于美、英、印侵略者的侵略活动早已予以密切注意，而且深深地记取了他们这种与中华民族为敌的罪行。

英、印反动派为了吞并西藏，竟敢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

据”。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民族加入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民族发生兄弟的关系，已有悠久的历史。西藏民族与汉族及中国境内其他各民族的友谊，曾经受过英、印侵略者和汉藏两族反动分子的损害。但是西藏的爱国人民正在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扶助少数民族的政策，乃是西藏人民的救星。中国的任何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的分裂，必将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奴隶，西藏人民是决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他们在一八八七年和一九〇四年两次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次英、印侵略者唆使西藏地方当局，以“反共”作为借口，发动变乱，企图混水摸鱼，更是极端冒险的蠢事。不错，国民党反动派是应该从中国土地上驱逐和消灭的，但这是中国人民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与任何外国无干，与任何反共分子无干。中国人民已经在很大部分的土地上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而且不久的将来，就会在全部国土内把他们扫荡得干干净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全中国人民都公认和信赖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在今天，谁要反对中国共产党，谁要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谁就要冒和国民党一样被扫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少数民族的自治，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的，凡是知道内蒙解放区和甘肃已解放的回民区情形的人，已经不再有怀疑了。外国侵略者在西藏散布反共的谣言，借以欺骗恐吓西藏当局，其目的是想使他们陷于极端危险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四百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即不但解放汉族人民，而且解放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

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多数汉族人民和内蒙古人民，正在解放着回族人民，并即将解放藏族和西北、西南、华南其他各族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穷困悲惨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他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的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关于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给饶漱石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

饶漱石同志：

陈云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

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以上各点，请以你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申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召开 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 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末世电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 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 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四) 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 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六) 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中心。

（七）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

（八）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九）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此电请转发各市、各县，各军、师。

中 央

九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

周 恩 来

现在我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人选的协商情况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向到会的代表做一个报告。

为什么要做报告呢？因为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开会前，使大家对上面说的几方面的情况有一个全貌的了解，以便能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和研究。到开会的时候才把只有少数人了解的东西或者是临时提出的意见拿出来让大家来讨论决定，这是旧民主主义议会中议事的办法。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

第一，关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人选问题。

首先，应该说明政协这个名称有一个改变。原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的报告。

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修改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

从新政协发起到现在，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五一”口号，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磋商国是，并决定如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很快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在上海、北平和海外的各人民团体、华侨人士的响应，使我们很高兴，于是便邀请各单位参加并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我们所设想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没有想到像今天有这么广大的解放地区和在交通这样便利的情况下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这是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的缘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崩溃了。在全国革命战争中，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全国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已经改观了。

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对它不得不更加谨慎。为了扩大政协的代表性，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能够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种谨慎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以目前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的要求为主要根据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得很清楚，参加会议成员的条件应该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我们邀请代表就根据这个政治标准。

我们既然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中当然不能包括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即反对新民主主义而拥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全国人民，而为全国人民所信托。这就是确定代表时的严肃性。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政权是属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的。此外，政协代表中还包括从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并投向革命阵营的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确定代表人选时的广泛性和灵活性。

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重点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民主党派，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我们还承认解放军的代表权，因为人民解放军不单是军事组织，又是政治组织，不仅是普通军队，而且是工作队。他们消灭敌人，从事政治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因此，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首先是农民。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解放军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除此以外，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包括华南解放军的代表。

有了重点，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外，还有妇女代表、青年代表、学生代表、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如自由职业者代表。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¹⁾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同情人民事业，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如福建萨镇冰先生，张难先先生。也有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会议，如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轸将军，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艺术而服务的人物，我们也邀请了，如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几位先生。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

总之，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和敌后根据地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而起义的朋友，保护国家器材有功的朋友，使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力量的大会。

在协商当中，除了政治根据外，我们还要从组织方面说几个问题。（一）党派的标准。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号召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

按照这个标准决定的。其中有三个单位，一是九三学社，一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需要做些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号召。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除了这十四个党派外，我们认为有些组织要分别研究对待。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曾在伪立法院进行过斗争，我们就一方面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另一方面把个别人列入特邀单位。又如民社党革新派，我们劝他们加入民盟。当然这样做还要看这两个组织自己的意见。和这类似的其他个别人，也被邀请参加，如汪世铭先生。（二）个人参加的，我们注意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三）各单位有自己的标准。我们要求各代表看名单时，不要连起来比较看，应该看其代表的单位在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何。青年学生的代表，虽然不能与其他代表来比，但他们在中国学生当中却有代表性。还有一些情况，有些人在这一个单位可能是正式代表，但在另一单位却是候补代表。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差别只是个表决权的问题，但是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四）代表名单的产生是经过各方面反复协商的。这样能使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尊重。（五）参加的代表，一般的都请他们到会，不要只是列名，否则就不能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原则上能够来的才确定他为代表，不能来的就不提名。不过也有个别特殊情形经过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可以列名而不来的，如年纪过高的萨镇冰

先生。现在的名单一共是六百五十五人，特别邀请的名单中或者还可能增加若干人，将来代表的总数，可能超过六百六十人，当然也可能就是六百六十人。

即将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确表示了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从代表性这一点来说，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代表性。但是仍有许多有代表性的人，像彭德怀同志等，因为他们不能来，所以没有邀请。至于个别的遗漏，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们觉得筹备会常委会对于这一工作，一般地说已经尽了责任。

第二，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这个草案已经在几天前送达各位代表。现在讲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大革命运动，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即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最近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才形成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组织。可以说这是一百多年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假如没有一百多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积累，尤其是三十多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便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济济一堂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次总结。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那时中国共产党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孙中山先生合作了。不幸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走上反动的道路，造成了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深入农村，发动了土地革命。后来中

国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多次号召组织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所以在革命的后三个阶段内，统一战线没有能够发展成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但这一政策始终贯彻于四个阶段，直到现在革命战争快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召开这个会。肯定地说，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所主张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它绝对不同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让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可是大家都熟悉这一组织形式，所以今天我们沿用了这个名称，而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既然是这样一个组织，就不应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而应该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个长期性的组织。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赞成的。

政协组织所包含的成分，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也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奋斗的目标。凡是同意这个目标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我们都欢迎他们的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团结起来，并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最近召开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后将设立全国委员会，领导实行全体会议的决议。另外在全国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和省会，根据需要设立地方委员会。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我们

要通过这个组织来进行地方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的范围太大，不容易经常召集，所以只好拟定三年召开一次。至于地方委员会，可以适当多开一些。

在全国各地方未能实行普选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地方委员会分别执行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现在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便是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便是同中央人民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一切大政方针，都先要经过全国委员会协议，然后建议政府施行。等到将来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情况及人民进步的程度，才可能把普选由个别地方逐渐推广到全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才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它仍将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国家大政方针，仍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地方委员会的情形也是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建设新中国，必须经过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努力，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一切人民力量，来完成这一伟大使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只打算写出人民政协的组织任务和任务，而不在工作方法方面详细列举，以免束缚工作的进行。希望各单位对这个草案讨论后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来决定。

第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这个组织法草案首先表明国家的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现在只须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国名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既然国名重新定了，是重新纪元呢，还是采用公元纪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没有讲到，这将在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决定。

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时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有四亿人以上；少数民族有蒙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夷族⁽²⁾、高山族等，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当然，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首先是汉

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如英帝国主义对西藏及新疆南部的阴谋，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及海南岛的阴谋。不错，这些地方是有少数民族的，但是他们一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清朝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满族以外的民族进行欺骗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继续了这样的政策，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深了这样的政策。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政策，把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防止帝国主义的挑拨分化。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的汉、蒙二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政策的成功。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一次民族方面的代表的确是比较少，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原因是有些少数民族的地方还没有得到解放，不容易找到代表来。内蒙古是解放了的，它便有了双重的代表，少数民族方面的代表和区域代表。

关于政权制度方面，大家已经同意采用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

和会议名称的区别就在这里。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关于普选，本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许多不是普遍选举的现象，例如根据阶级、民族、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性别等给普选加以种种限制。这种选举我们不要，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关于直接选举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直接选举目前实在不容易办到。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的形势和要求。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依照目前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也是做不到的，许多地方只能用举手或投豆的方式。由于有上述种种的情况，我们只能强调提出普选一点，其他各项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单就普选一点，三年后能不能真正做到，还是一个难题。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逐步由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普选。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分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而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因为它不是事前协商，只是便于剥削阶级政党间互相争夺，互相妥协，共同分赃的制度。他们幕后分侵略殖民地的赃，分剥削本国劳动人民所得的赃，争夺不休。而我们却是长期合作，不是彼此互相交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曹锟、段祺瑞等都搞过议会制、总统制等方式，结果换来了封

建买办的专政。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座的陈叔通老先生、沈钧儒老先生，都曾亲自体验过。到了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国才找到一条好路，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又不同了，那时，大家为民主拼命奔走，也仅仅得出了一个伪宪法，真正的民主是没有的。这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的经验教训。

现在，根据我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系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它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而对工作的经常指导，又是集中在由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主席身上。主席下面的组织，首先是政务院，其他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

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这个数目看起来很不少。清朝只有六个部，后来又分为八九个部，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也只有八九个部，但每个部下面却设有许多机关，有些机关连部长也管不了，直接由最高当局来指挥，造成官场上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现象。这种情形，我们新中国是不允许的，所以政务院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事实上苏联今天有六十个部，比我们更多，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模仿苏联，一切还是由本身的需要出发。

政务院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这四个委员会是：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下辖五个部门，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辖十六个部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辖六个部门。另外还有外交部，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情报总署，是直属政务院的。一共是三十个单位，重点在于财政经济，其次是文化教育。这样做法会不会降低工作效率呢？根据

过去解放区政权建设的经验来说，是不会的，而且还可以把工作推行得既快又好。政务院下面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监察制度，监察行政部门，如公务人员是否执行了政府的决议和政策，是否有贪污腐化等情形。

军事方面，我们估计国内解放战争还要打一年左右，才能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反动派。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继续存在，同时将来也要领导巩固国防的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这不用多做解释。

至于地方的统一制度，目前因为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它的组织如何，只好留给将来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现在报告已经完了，请诸位根据这三个文件，多加考虑，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来共同商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刊印。

注 释

(1) 指宋庆龄。

(2) 即彝族。

军委关于开好赣州会议及进军 华南部署给叶剑英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叶方陈邓诸同志，并告林邓⁽¹⁾：

(一) 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 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 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²⁾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邓⁽³⁾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军 委

申齐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注 释

- (1) 指陈赓、邓华，林彪、邓子恢。
- (2) 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
- (3) 指刘伯承、邓小平。

军委关于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 给林彪、邓子恢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

林邓：

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军 委

九月九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毛泽东等关于 和平解放新疆的文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

德怀同志：

申齐一时电悉，答复如下：（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二）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三）由我们做准备的事项是汽车三四百辆，银洋五十万元及单独在新疆用的人民币，这些是可以办到的，你们申支电要四千辆汽车，则是办不到的。（四）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他谈新疆尚有六万军队，数万党政后勤，共约十万人左右。我们认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

* 本篇二是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作了修改。

会，统辖西北五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你可借王震去迪化主持一时期，尔后可往来于陕甘新之间，以上方案大体上是否可行，请考虑电复。（五）我们和友方⁽¹⁾的民航协定，业已在大体上商好，他们帮我建立新甘陕三省间的运输毫无问题，三十架运输机，估计可以办到，但我们认为两个军步兵及炮兵的主力，均须步行及车运，要待占领迪化及迪化机场由我控制以后，方可要苏机帮我们运干部、粮食、被服及一部分兵力，而在占领迪化以前，估计可以帮我们运送双方谈判代表及重要人员。（六）翻译人员可要邓力群在新疆准备。

毛泽东

申亥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的
《新疆工作文献选编》刊印。

二

力群并告彭张⁽²⁾：

十一日晚十二时电悉。

（一）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仍回伊犁，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犁之间。

（二）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书记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

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如陶自己愿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与友方商榷，问他们能否派飞机送陶或其代表往兰。

（三）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

（四）你与陶、包见面后情况望随时电告。

中 央

申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三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二十五日电悉。（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四百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三十架至五十架运输机。（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

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³⁾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包尔汉省政府是汉人十名，维族等十五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三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五卷刊印。

四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

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 泽 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刊印。

注 释

- (1) 指苏联。
- (2) 指张宗逊。
- (3) 指贺龙。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是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

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一技之长而不

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孤立中国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进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

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

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

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毛泽东、朱德复董其武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乎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

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够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 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委，各野战军前委，平津两市委：

（一）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二万七千余人，引起很大波动。北平和平解决后，遣散傅⁽¹⁾部军官一万七千人，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现在仍须由我负担解决。所有这些经验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需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

（二）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然会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

（三）对已解放城市，如京、沪、汉、长沙、兰州等，及将解放城市，如广州、重庆、迪化、台湾等，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但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

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四）一切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特别是企业机构，均须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闲杂人员及庞大的机关应加以精简。但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薪水低的可少打折扣）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优先录用。

以上各点，望即遵照执行。

中 央
申 马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九年第五期
刊印。

注 释

（1）指傅作义。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现在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始终反对统一战线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而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推翻双十协议和政协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报告的摘要。

决议，最后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次内战教育了人民，使广大人民逐渐地走到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

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第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

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将加强工作以防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我们大家则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打击反动分子的各种阴谋。

第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是军事制度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特点不仅是勇敢机智善于作战，而且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并帮助人民劳动。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

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第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做的；哪些是已经做了的、哪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

第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草案中规定了必须强调的几项，其他没有规定的并非不作，因为在草案第五章中已经都概括地提到了。

第七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问题。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第八是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问题。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

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是人民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草拟的。本组组长、副组长和组员一共二十五人，参加筹备会的二十三个单位，除了文化界民主人士以外，均有代表参加，民盟、民进和民主教授三单位且均有两位代表参加。六月十八日举行第一次小组全体会，会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因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点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七人成立提纲起草委员会，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七月八日本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根据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目前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政务院与各部会间应否设立联络指导机关，政务院下面部会数目的多寡，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 and 隶属关系等问题，逐一讨论，基

* 这是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仍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并推定了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五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先后开会三次，并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乃于八月十七日召开本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新政协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会。八月二十六日第四次常务委员会指定了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和本人对初步草案再研究修改一次。九月十三日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作文字修改后，在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去讨论。

关于这个组织法草案的总纲，我有以下说明：

第一，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第二，国家的属性问题：第四小组的全体组员都觉得这一点应该明确地写在政府组织法之内。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今天人民民主专政中阶级间的关系讲清楚。“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质，这是大家所同意的。经

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这两本书的解释，经过他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今年六月十五日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典礼上的报告以及七月一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的多次解释，并经过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各民主党派在纲领和宣言中的表示，都确定了我们国家的这个特质。

第三，政府组织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具体的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民主集中原则的提出，正是针对着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欧美资产阶级故意把他们专政的政府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机体，使之互相矛盾，互相制约，以便于他们操纵政权。旧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中当权的一部分人容许另一部分的少数人，所谓反对派，在会议讲台上说空话，而当权者则紧握着行政权柄，干有利于本身统治的事情。这是剥削阶级在广大人民面前玩弄手腕、分取赃私，干出来的一种骗人的民主制度。司法是最精巧的统治工具，同样是为当权的阶级服务的。我们不要资产阶级骗人的那一套。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

第五，本法草案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各国宪法多规定为国家元首的职权。我们觉得本法草案的规定，更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

第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关于政务院的名称，原来有人主张用国务院，但国务院包括军事，不太合适；有人主张用行政委员会，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委员会，最高行政机关下还有指导性的委员会一级，其下还有各种委员会，这样名称容易混淆。至于部长会议或部会长会议也不合乎我们的实际，在我们的最高行政机关中，部长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所以最后我们仍采用了政务院的名称。

对本法草案的第一章，我要说明的，就是以上六点。

关于第二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我想作下列三点说明：

第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而不设主席团，也不设常务委员会。苏联采行联邦制，有十六个共和国，每一共和国在中央有一位副主席，所以自然组成了主席团。我们没有这个事实，也就不必仿行此制。至于日常事务，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之秘书长领导办公厅人员经常处理。

第二，对第七条政务院总理的名称，在第四小组的会议中曾有所讨论，大多数组员认为如称院长易与法院院长、科学院院长混淆，大家尤其不赞成我们新的行政首长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行政院长用同一个名称，所以草案中采用了政务院总理的名称。

第三，第七条有“批准任免”的字样，因为有的行政区和省市的人民政府，其主席、副主席如果是选举出来的，则中央人民政府只批准其任命。后面第十五条也仿此。

关于第三章政务院，我想作以下四点说明：

第一，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主任，这就是说，部长和主任委员不一定是政务委员。我们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会、院、署、行，如果它们的首长都是政务委员，再加

不任部长的政务委员，则政务委员人数太多，政务会议也就不易开好。

第二，关于联系与指导性的委员会，如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是否列一级的问题，在第四小组的讨论中，曾经有三种意见：（一）算作一级，像现在组织法上所写的那样。（二）不算一级，不发号施令。（三）不规定是否算一级，由事实发展去决定。现在政务院下有三十个部门，如果每周开一次政务会议，一个部门的工作，每月无法轮到讨论一次。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故肯定把它列为一级，以便联系和指导与其工作有关的各部门工作。这样，各部门的工作是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隶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

第三，人民监察委员会是监察行政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的，与检察署不同。有人主张它应隶属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地位高些，职权也较大；也有人主张它隶属政务院，比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更好些，因为与行政机关接近，熟悉实际情况，更便于执行职务，而且人民监察委员会所起作用之大小，实际上要看主持者是否负责及此机构是否被重视而定。我们同意后一主张，所以起草时就把监察委员会列在政务院下。

第四，政务院下设的专管行政部门共有三十个，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应转向建设，不能不多设几个部门去管财政经济工作。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部门没有列为政务院专管行政部门，如合作事业，如盐务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在草案第二十二条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于政务院的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有了这样有弹性的条文，政府便好办事了。

最后我想对组织系统表简单说几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虽然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之后，后者即为行使全国最高政权的机关，所以组织系统表中用虚线表示其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闭会后的全国委员会对政府仅提出建议案，故亦以虚线表示之。

政务院下，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地位较高，故在图中的部位亦较高。政治法律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门以黄色实线表示之；财政经济委员会所指导的部、行、署以红色实线表示之；文化教育委员会所指导的部、院、署则以绿色实线表示之。政务院对三个指导性的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以及各部、会、署、院、行均有直接指挥之权，以黑色实线表示之。外交部对情报总署，财政部对人民银行，贸易部对海关总署有监督指导之权，亦以黑色实线表示之。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已印发了，请各代表先生审查后付之公决。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董必武选集》刊印。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这个会议，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之下，中国人民日益坚强地团结起来，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继八年抗日战争打倒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仅仅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就已经基本上打倒了由美帝国主义所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期，并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推进向全国的彻底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所召开的包括全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全国人民早已渴望着召开这样的一个真正由人民自己做主人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都鲜明地记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所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以中国人民为可欺，撕毁了它们在人民面前亲手所签订的一切协定，发动反革命的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召集了分裂的独裁的伪“国大”，妄想为所欲为。但在一九四八年的五月一日，正当伪“国大”完结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愿望，发出了对时局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立即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国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胜利地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地召开了人民自己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

从三年前的那个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到今天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划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短短三年间的历史事实，最后一次证明了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穷凶极恶，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人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而建立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的历史，把这个真理证明得如此生动而丰富，使中国人民普遍地经过自己的经验认识了这个真理。这就保证了反动派的旧中国必然永远灭亡，而人民的新中国必然永远胜利。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制度，必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能够保障中国人民

民主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有了这个国家制度，我们就有力量随时击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在中国企图复辟的阴谋。这个国家的政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对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残余势力实行专政的政权。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是经过了近一百年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牺牲奋斗而来的，特别是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英勇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战而来的。中国人民为了寻求和创造这样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已经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代价，因此中国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积极参加到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各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坚决地一边倒，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击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任何的挑衅，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为彻底完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并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的未来而继续奋斗前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极为重大的，但是，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是一定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中国人民以空前英勇的姿态站起来，成为有高度文明的新社会新国家的光荣的主人。

根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中国人民政协）为会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旨在经过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肃清公开的及暗藏的反革命残余力量，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并发展人民的经济事业及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国防，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以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章 参加单位及代表

第二条 凡赞成本组织法第一条之规定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协；个人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议邀请者，亦得参加

中国人民政协的全体会议，并得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三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由上届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定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协商定之。

第四条 凡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各参加单位及代表均有信守及实行的义务。

凡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党派或人民团体，对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如有不同意时，除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负责遵行不得违反外，其有不同意见得保留之，以待下届会议提出讨论；如对重要决议根本不同意时，有声请退出中国人民政协的自由。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或代表或全国委员会委员，如有违反中国人民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或重要决议而情节严重者，得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委员会视其情节严重的程度，分别予以警告，撤换代表，撤销委员资格或撤销参加单位等处分。由全国委员会所给予的处分，如被处分者不服，得向下届全体会议提出申诉。

第三章 全体会议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召集之。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职权如下：

- 一、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
- 二、制定或修改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

三、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甲、制定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乙、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丙、就有关全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或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

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五、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须有参加代表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主席团，由全体会议选举之。主席团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设秘书长一人，由全体会议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主席团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得设各种委员会，其组织办法另定之。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议事规则，由主席团制定之。

第四章 全国委员会

第十三条 在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全国委员会。其职权如下：

一、保证实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及全国委员会的决议；

二、协商并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案；

三、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及国家建设的工作；

四、协商并提出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的联合候选名单；

五、协商并决定下届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参加单位、名额及代表人选，并召集之；

六、指导地方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七、协商并处理其他有关中国人民政协内部合作的事宜。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由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之；其名额由每届全体会议临时规定之。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每半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之。常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之。设副秘书长若干人，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选任之。在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条例，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地方委员会

第十八条 在中心城市、重要地区及省会，经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决议，得设立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为该地方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协商并保证实行决议的机关。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组织法经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后施行。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

第三条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第四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第五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以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及检察机关。

第二章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员五十六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一人组成之。

第七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行使下列的职权：

- 一、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颁布法令，并监督其执行。
- 二、规定国家的施政方针。
- 三、废除或修改政务院与国家的法律、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 四、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
- 五、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
- 六、批准或修改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 七、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
- 八、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九、任免下列各项政府人员：

甲、任免政务院的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各部的部长、副部长，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各署的署长、副署长及银行的行长、副行长。

乙、依据政务院的提议，任免或批准任免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

丙、任免驻外国的大使、公使和全权代表。

丁、任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总参谋长、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

戊、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

十、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第九条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秘书长，协助主席执行职务。

第十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两个月举行一次，由主席负责召集。主席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请求，或政务院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须有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十一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办公厅，并根据需要，得设其他附属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三章 政 务 院

第十三条 政务院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总理一人，副总理若干人，秘书长一人，政务委员若干人组成之。政务委员得兼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各部的部长。

第十四条 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

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五条 政务院根据并为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规定的施政方针，行使下列职权：

一、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二、废除或修改各委、部、会、院、署、行和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务院的决议、命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

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议案。

四、联系、统一并指导各委、部、会、院、署、行及所属其他机关的相互关系，内部组织和一般工作。

五、领导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

六、任免或批准任免第七条第九款乙项规定以外的各县市以上的主要行政人员。

第十六条 政务院总理主持政务院全院事宜。政务院副总理和秘书长协助总理执行职务。

第十七条 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周举行一次，由总理负责召集。总理根据需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政务委员的请求，得提前或延期召开会议。政务院的会议，须有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政务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政务院的决议和命令，以总理单独签署行之，或由总理签署外并由有关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首长副署行之。

第十八条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下列各部、会、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家行政事宜：

内务部；

外交部；
情报总署；
公安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
贸易部；
海关总署；
重工业部；
燃料工业部；
纺织工业部；
食品工业部；
轻工业部（不属上述四部门之工业）；
铁道部；
邮电部；
交通部；
农业部；
林垦部；
水利部；
劳动部；
文化部；
教育部；
科学院；
新闻总署；
出版总署；
卫生部；
司法部；
法制委员会；

民族事务委员会；

华侨事务委员会。

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

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院、新闻总署和出版总署的工作。

为进行工作，各负指导责任的委员会得对其所属各部、会、院、署、行和下级机关，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

第十九条 各部、会、院、署、行，在自己的权限内，得颁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其执行。

第二十条 政务院设秘书厅，办理日常事务，并管理文书档案和印铸等事宜。

第二十一条 政务院及各委、部、会、院、署、行、厅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或批准之。

第二十二条 各委、部、会、院、署、行、厅，于必要时，得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增加，减少，或合并之。

第四章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第二十三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

第二十四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五条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其管理和指挥系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五章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第六章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及解释权

第三十一条 本组织法的修改权，属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组织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 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案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一、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二、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

三、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
选编》(上)刊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序 言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

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努力巩固和加强人民武装力量，使其能够有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第二章 政权机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

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

第十四条 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

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五条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政府委员会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下级人民政府均由上

级人民政府加委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第十六条 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

第十七条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第十九条 在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第三章 军事制度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第二十一条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

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第二十五条 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

第四章 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

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第三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

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一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

第三十五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

第三十六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

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銀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四十条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

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

第四十五条 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第四十七条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第四十八条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

第四十九条 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

第六章 民族政策

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

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 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刊印。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

* 这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其中“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一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协力，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

强的新中国。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

冷 溶 李 捷 边彦军 庾 平 费虹寰
郝首栋 王玉强 沈雁昕 曹前发 吕小蓟
王纪一 左智勇 杨 光 吕 臻 朱 薇
唐 蕊 祝志伟 胡鹏飞 单劲松 付 闪
朱舒坤 李凤龙

参加部分篇目审核和资料工作的有：

廖心文 熊华源 唐洲雁 龙平平 万建武
王 萍 马京波

中央档案馆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

杨冬权 李明华 许卿卿 王绍忠 贺德海
许 虹 焦东华 孔繁玲 陈小枚 郎迎洁
王晓峰 郝和国 纪国伟 胡 红 田 伟
王淑芳 钟素兰 贺秀红 殷月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073-3271-1

I. ①建…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文件
-汇编-1921~1949 IV. ①D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317 号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编 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责任编辑/马云飞 张文和 王玉强
封面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010-66513569 63097018 66183303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华艺排版公司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1176.25 印张 13500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3271-1 定价: 2800.00 元 (全 26 册)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ISBN 978-7-5073-3271-1



9 787507 332711 >

定价：2800.00元（全26册）

